

意大利 工会運動簡史

坎戴洛羅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

5624

4743

203

定價 0.46 元

1-124
1977

意大利工会運動簡史

坎戴洛羅著

胡國城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Д. Канделоро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ИТАЛИИ

Перевод с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В. Н. Валентинова и Ю. С. Писаре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根據苏联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俄文版轉譯。原著以意大利文出版。原作者是 Giorgio Candeloro, 原著名稱是 IL MOVIMENTO SINDACALE IN ITALIA, 意大利社會文化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出版。

意大利工会運動簡史

[意]坎羅洛羅著

胡國城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173·850×1168¹/₃₂·4¹/₄印張·101,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 定價：(6)0.46元

俄譯本序言	3
第一章 起源	7
一 从互助会到有組織的反抗	7
二 工人組織和社会主義	14
第二章 無產階級的進攻和資產階級的反動	19
一 社会党的成立和勞動介紹所的形成	19
二 社会衝突和工会鬥爭	24
三 爲結社自由而鬥爭	29
第三章 喬里齊統治時期	33
一 新的形勢。工会鬥爭和工会組織的發展	33
二 一九〇四年總罷工和工会中派別的鬥爭	40
三 總工会的成立。工会改良主義和無政府工团主義	46
四 天主教工团主義	55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形勢	58
第四章 世界大戰和戰後的革命危機	62
一 中立時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工会運動	62
二 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工變運動和政治領導危機	64
三 爭取建立工廠委員會運動。葛蘭西和“新秩序”	69
四 从佔領企業到共產党的成立	74
第五章 反法西斯主義鬥爭時期	79
一 自由工会的消滅	79
二 地下工会的鬥爭	88
第六章 从法西斯主義的崩潰到意大利總工会 佛羅倫薩大會	96

一	意大利北部的罷工和羅馬協約	96
二	意大利總工会的初期活動。那不勒斯大會	100
三	从那不勒斯大會到佛羅倫薩大會	103
四	佛羅倫薩大會	108
第七章	爲勞動、自由与和平而鬥爭的三年	112
一	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分裂工会運動的圖謀	112
二	熱內亞大會	121
三	羅馬的全國經濟會議和米蘭的工会大會	126

俄譯本序言

“意大利工会運動簡史”一書是年青的意大利進步政論家和歷史學家喬爾治·坎戴洛羅所著。這本書是試圖概括論述意大利勞動人民工会鬥爭和工会組織發展史實的第一部著作，迄今還沒有第二本。這本書的敘述從十九世紀中葉工会鬥爭萌芽開始直到現代。今天意大利工会運動規模浩大，團結一致，它已成為捍衛工人階級、勞動者、全體人民的民主果實和自由的偉大堡壘，它已成為了為美好前途、和平和國家獨立而鬥爭的偉大武器。

在意大利工会運動問題史料的現狀下，這本通俗簡史的作者不準備、同時也不可能全面地闡述工会運動史所有的階段。他只擬扼要地敘述工会運動的主要階段，他所揀選的工会運動鬥爭史中的事實和事件是那些曾在國家的實際生活中留下最深刻的痕跡的事實和事件，它們曾教育勞動人民克服困難，和在從初期又弱又小的工人互助會到目前強大的總工會這條漫長的道路取得勝利。

作者在這樣的範圍內達到了自己的目標並給予讀者不少有益的教導。他的簡史的價值主要在於：雖然有些篇幅敘述得簡略些，但他對實現意大利工会統一的鬥爭給予了一幅真實的畫面，並指出統一工会的活動如何從工人階級為工資、為改善出賣勞動力條件的經濟鬥爭的範圍逐步提高到成熟的、自覺的水平，即為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符合一切勞動人民利益的，也就是說符合國家民族利益的經濟政策而奮鬥。

意大利工会運動的這些特徵是意大利共產黨政策的成果之

一。在过去三十年中，意大利共产党致力於“爭取工人階級、一切勞動人民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統一的鬥爭，這個鬥爭逐年意大利取得越來越大的成就，而這些成就是十分巨大的，已經使今天的意大利國內形勢不同於歐洲其他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勢”（陶里亞蒂）。

在評價坎戴洛羅的簡史時，應該考慮到在意大利不僅尚未有勞動人民工會鬥爭和工會組織的歷史著作，即連近百年來工人運動史的一般的基本讀物也未出現，更談不上在這個方面的馬克思主義著述。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的文件、紀事史料和資料，有的曾分別刊載在幾個定期的刊物上，有的根本沒有發表過；法西斯統治時期以後所保存下來的文卷檔案還遠沒有研究和探討；少數的論著也僅涉及個別的局限的時期，並不能提供連貫的歷史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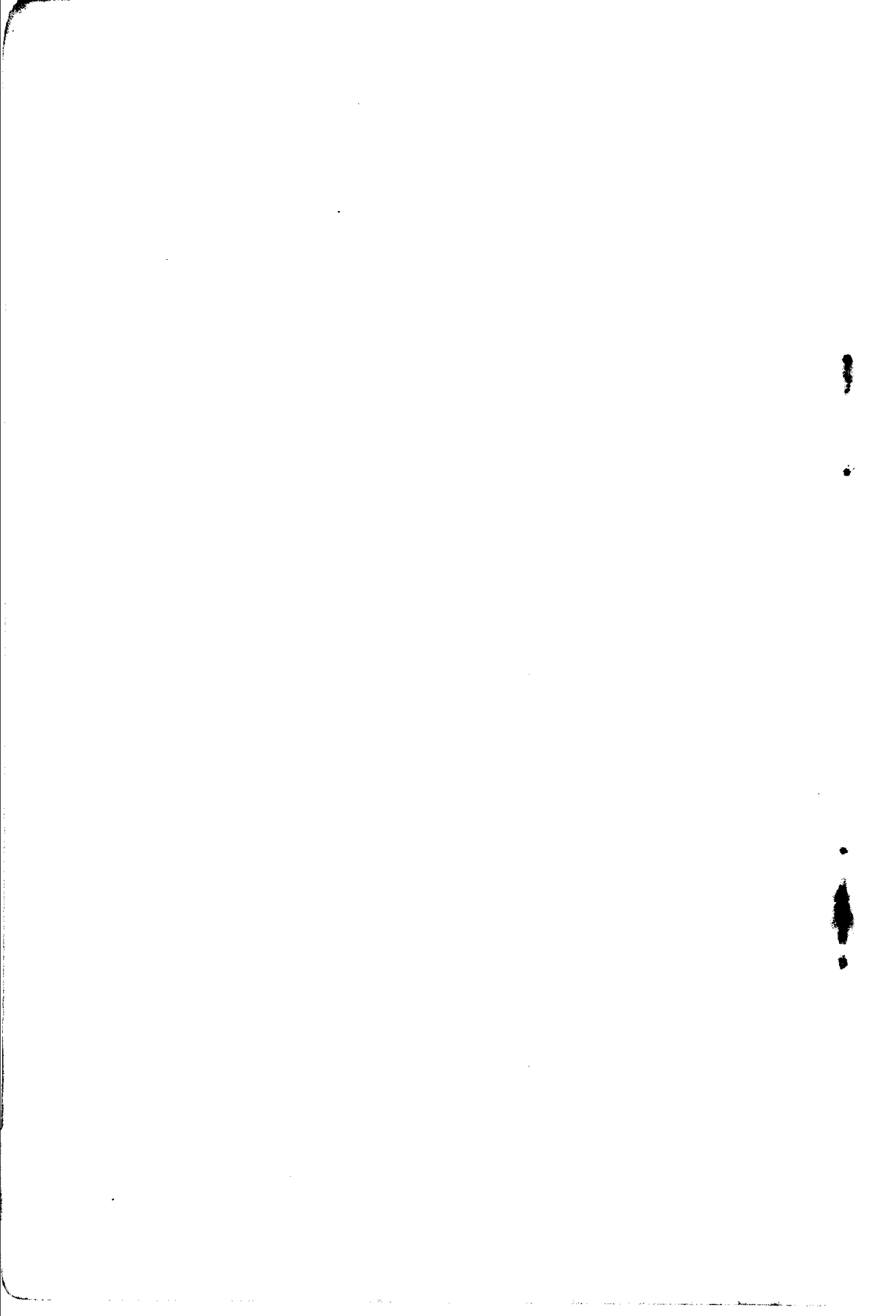
坎戴洛羅的簡史發表以後，認真嘗試研究過去三十年來工人運動幾個基本方面的第一部著作相繼問世。這就是“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的經歷和鬥爭”，這部論文和文件集（俄譯本已由莫斯科外國書籍出版局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由帕·陶里亞蒂主編的這本文集雖然不是專門論述工人運動史問題的，可是毫無疑問，它對所有關心帝國主義時代意大利勞動人民鬥爭的人們能給予莫大的幫助。

坎戴洛羅的簡史十分正確地闡明了意大利工會運動發展的總趨勢，可是它仍有重大缺點：作者在闡述勞動人民工會鬥爭的事實、工會組織的生活以及工會運動中思潮的鬥爭時，沒有同所談時期的歷史性事件、意大利社會經濟的總情況以及意大利工人政党的具體歷史聯繫起來。

作者寫到一九五〇年為止。在以後的時期中，意大利總工會提出的“勞動計劃”成為反對美國的所謂經濟援助政策鬥爭的旗幟。這種經濟援助政策事實上是窒殺民族工業和農業的政策、為和人民背道而馳的經濟軍事化及把意大利捲入大西洋公

約战争体系服務。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那不勒斯舉行的意大利總工会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意大利勞動人民工会統一運動發展的新時期作了一個總結。這個時期勞動人民為提高生活水平的頑強鬥爭已經比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和為挽救國家經濟、使生產擺脫週期性危機和蕭條以及把國家從軍備競爭的高压下解放出來等鬥爭結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說，這個鬥爭成了為和平、為發展和平生產以利全國的鬥爭，同時也是為保衛民主果實和自由的鬥爭。

阿·維希涅夫斯基



第一章 起 源

一 从互助会到有組織的反抗

意大利工会運動的興起和最初的發展主要是一种以互助爲目的的團結運動。最初一批的意大利勞動人民的組織就是互助会，會員中往往不僅團結了工人，而且有手工業者。互助会開始出現於上世紀的前半葉，一八四〇年以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主要是在倫巴第、皮蒙特和杜斯坎尼。在許多年代內，互助会是工人唯一的組織形式。

意大利工人運動的開始成長比當時歐洲其他較爲先進的國家，如英、法、德等國遲緩得多。原因是意大利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較遲，在黎沙治孟多時代^①，意大利是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只有少數的現代化工業企業，而它們差不多全都集中在倫巴第、皮蒙特和里古利亞的一些個別地區。至於農業則大都仍保持着中世紀的特性，僅在巴達盆地^②的少數地區有過渡到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農業的趨勢。當時在意大利，無產階級尚未形成爲一個階級，工人和手工業者之間很少有區別，即連工人和農民之間亦難分清界限。工業企業往往在農業地區產生，因而勞動力也是從農民中募集而來。因此，渴望改善自身乞丐般生活的農民們，不分男女，都受僱於工廠作一些長期性工作。

在意大利，首先獲得發展的是紡織工業。

① 黎沙治孟多時代——是爲意大利的統一和民族獨立而鬥爭的時期（一八二一——一八七〇年），最後以意大利建立了統一的國家而結束。——俄文版編者

② 巴達盆地——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俄文版編者

一八三一年以後，絲織工業在皮蒙特開始迅速發展。从十八世紀末葉到一八四〇年，這個工業部門的工人人數由一萬九千人增加到四萬三千人，而同一時期的生絲產量也由二十五萬公斤增加到六十萬公斤。亞麻、大麻和羊毛加工工業比絲織工業和農村有着更密切的聯繫。根據巴勃加羅所著“現代工業興起史”一書的材料，在一年的一百五十天農閒時期中，有三十萬農民在家中紡製粗織品。倫巴第的棉織工業和金屬加工業也迅速開始成長。一八五〇年，倫巴第已經擁有二十八個那時認為新式裝備的紡紗工廠，一年中能加工三萬公担棉花。幾乎在同一時期，米蘭和熱內亞附近的薩皮達倫興起了首批機器製造工業，其中有的在以後成長為布雷達康采恩和安沙爾多康采恩。

儘管這個時期工人組織的活動是幼稚的和具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時意大利工人已具有高度的戰鬥精神。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僅激起了工人和手工業者爭取自由和獨立的英勇鬥爭，而且，隨之而來的是在意大利全國到處湧現社會性的發動。在南部展開了均分國家土地的農民運動，許多城市中發生了反對物價上漲的行動；在米蘭、都靈和熱內亞，各種不同行業的工人（印刷工人、裁縫工、皮鞋工、搬運工人）爆發了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在這時候，有人初次組織工人聯盟，以便對僱主進行有組織的反抗。不過這種做法照例沒有導向建立工會形式的永久性組織。互助會繼續成為工人基本的和較為穩定的組織。僅在印刷工人中間有人試圖建立向企業主作鬥爭的永久性工人組織。一八四八年五月七日，在印刷工人維欽佐·斯泰范諾涅的倡議下，四十個工人在都靈成立了排字工人協會，它的宗旨是不准降低工資，因為在這以前不久企業主達到了降低工資的目的。這個同樣以互助和相互學習為目的的協會可以稱為意大利工人的第一個工會組織。按照它的範例，一八五二年在熱內亞，一八六〇年在米蘭以及後來在其他大城市，相繼成立了類似的印刷工人協會。

一八四九年以後，工人協會主要出現在皮蒙特，由於憲章①

仍舊有效，這裏是意大利唯一允許一定程度結社和集會自由的國家，在加富爾^②內閣時，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比意大利其他地區來得迅速。皮蒙特工人組織之間建立了聯繫，並自一八五三年起，開始召開定期的代表大會，一八六一年以後，這種代表大會進一步接受全意大利工人協會的代表們參加^③。

皮蒙特工人組織的領導機關中雖然有帶着家長式作風的溫和分子，但和里古利亞的工人協會一樣，當時他們已經受到瑪志尼^④的影響，並力圖將其活動範圍擴大到單純的互助的範圍以外。

早在一八六〇年以前，下述的這一切問題都會極迫切地提交工人協會代表大會討論，這些問題是：國民教育、住宅問題、組織合作社（在工人協會的發起下，一八五四年在都靈成立了第一個消費合作社）、保障勞動殘廢者和老年工人的生活、反對延長工作日（一般的工作日是十三到十四小時，但有時竟達到十六小時）的鬥爭、使用女工和童工。

工人協會所處理的問題範圍日益擴大，不可避免地引導它

-
- ① 指阿爾勃特憲章——它是撒丁（庇蒙）王國的憲法，由於一八四八年革命高潮的結果，卡爾—阿爾勃特皇帝（薩伏依朝）被迫給予的。意大利統一以後，這個憲法被保留，到法西斯主義執政前一直有效。——俄文版編者
 - ② 平查·卡米洛·加富爾（一八一〇——一八六一年）——著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家，黎沙治孟多時代意大利統一運動自由主義派的領袖，主張“自上而下”、在薩伏依朝保護下，圍繞庇蒙王國而統一意大利的擁護者。——俄文版編者
 - ③ 關於工人代表大會及一般的第一期意大利工人運動史，參閱格·馬納庫達：“論意大利工人運動的起源”，載“社會”雜誌，一九四七年，第一號，第三七——五七頁；格·馬納庫達：“一八五三——一八九一年工人代表大會和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載“復興”雜誌，一九四九年，第八——九、十一、十二號的附錄中。
 - ④ 朱塞佩·瑪志尼（一八〇五——一八七二年）——最有聲望的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意大利十九世紀民族解放運動民主主義派的領袖。——俄文版編者

們走上了有組織的反抗僱主，雖然溫和的領導者反對如此做。主要是那些按產業分類組成的工人協會力圖走向有組織的反抗，而按地區分類組成的工人協會的活動則仍保持着互助性質。按產業類型分類的協會在米蘭特別衆多；一八六〇年米蘭曾發生了一系列的罷工。一八六〇年十月在米蘭舉行的工人協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討論了組成工人協會的組織原則問題，這次大會不僅有皮蒙特工人協會的代表，並有倫巴第、艾米里亞和杜斯坎尼的代表參加。代表大會贊成按照地區分類組成協會，可是按產業分類組成的協會仍不斷獲得發展，並經常擴大自己的活動進行有組織的反抗僱主。米蘭代表大會關於罷工問題的決議也是否定的。代表大會指責當時經常舉行的叫作“星期一的罷工”。而這種罷工是表示勞動人民抗議僱主在星期六將工作日延長以及反對取消星期日的休息。

另一重要問題同時也開始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工人協會是否應該關懷政治和提出政治上的要求，例如要求普選權？溫和派回答這個問題是否定的，而瑪志尼的擁護者的回答則是肯定的。在米蘭的代表大會上，溫和派佔居了優勢，但在一八六一年九月的佛羅倫薩代表大會上，瑪志尼的擁護者取得了勝利。可是新的政策方針並沒有使工人協會領導大大改變其對待有組織的反抗企業主問題的態度。因此，佛羅倫薩代表大會雖然宣稱工資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但同時認為“一切罷工和任何暴力的使用是對工人有害的”，並建議主要採取雙方調解的方法。然而代表大會仍要求“廢除刑法法典中規定懲罰組織工人聯盟的條款”。

代表大會所指的是撒丁王國一八五九年實施的刑法法典的第三八五條和第三八六條，這個法典的效力在意大利統一後會普及到全國各地。這兩條款禁止“旨在不公正地縮減工人工資的僱主之間的任何協議”和“旨在停頓和妨礙工作以及毫無理由根據的要求提高勞動報酬的工人之間的任何協議”。這兩條款

仿效着一八一〇年的法國刑法法典，而這個法典又是根據臭名昭彰的一七九一年的沙佩法^①的精神而訂定的。實際上，這兩條款意味着禁止罷工和嚴格地限制工人聯盟的自由，但同時却允許僱主採取同盟歇業的手段。由於這些直到一八九〇年依然有效的條款的的存在，企業主事實上並不需要通過聯合行動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能毫不費力地操縱勞動力市場。可是對付工人的那些限制却禁止工人聯合，也就是剝奪了勞動人民的唯一能保障他們不受僱主苛待的手段。此外，上面所提到的關於提出“理由”的條款的解釋權完全屬於法院，而法院的解釋對勞動人民很少有利。

可是，工人們不顧法律上的禁令、逮捕和法院的制裁，繼續頑強地鬥爭着。意大利在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的十年中平均每年發生罷工十三起。越來越多的互助會變成爲積極反抗僱主的組織，於是它們遭到解散及其領導人的被捕。在這個時期的罷工中，值得提出來的是一八六〇年七月都靈磚瓦工力爭縮短工作日到十二小時的罷工和一八六四年貝拉城的製呢工人要求改進工廠規章的罷工。這個約有三千製呢工人參加的罷工的結果是把問題移交給仲裁法庭審理，而仲裁人的職務是由自由主義的政治活動家和法學家帕斯庫列·斯坦尼斯拉奧·曼齊尼擔任的。結果確立了雙方都接受的新規章，這事實上是意大利工會運動史中第一個集體合同。

到一八七〇年^②，工人勞動條件依然異常艱苦。一個工作日達十二小時至十六小時。在倫巴第，成年工人工資平均每日爲二里拉。在科摩和米蘭兩省，絲綢工業和紡紗工業中的女童工的每日工資在九十生的斯摩到一個半里拉之間。在貝拉省，男工每日平均工資爲一點九里拉，女工——一點二里拉，未

① 沙佩法是一七九一年法國立憲會議所通過，它在嚴峻的懲罰威脅下禁止工人組織和罷工鬥爭。——俄文版編者

② 意大利完成重新統一的一年。——俄文版編者

成年工人——五十三生的斯摩。而當時一公斤麵包的價格却在四十到五十生的斯摩之間。法律沒有規定保護女工童工、保障勞動者喪失勞動能力後的生活以及在企業中實施任何保健措施。農村的勞動條件更為惡劣。農業工人和臨時僱農每日平均工資是一里拉。絕大多數農村勞動者吃黑麵包，而有些地區的農民只能吃一頓無鹽的薄湯^①。結果到处蔓延糙皮病。

新的派系——無政府主義逐漸在工人運動中得到發展。擁護它的人們自稱為“國際主義者”。大家知道，第一國際在意大利的第一批支部就是由無政府主義者所控制的，他們擁護巴枯寧建立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而反對在倫敦由馬克思領導的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巴枯寧本人在一八六四年訪問了意大利，後來經常長期住在意大利^②。一八六七年，在那不勒斯成立了第一個第一國際意大利支部，以後在其他地區，主要是在羅馬尼約，相繼成立了一批支部。隨着巴枯寧分子的出現，瑪志尼的擁護者喪失其原有的影響。瑪志尼對巴黎公社所採取的敵對態度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和巴枯寧論爭的結果促進了巴枯寧分子的成功。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在羅馬舉行的工人協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瑪志尼影響下的工人協會和巴枯寧派之間發生了裂痕。巴枯寧派在一八七二年八月，在利米尼召開了自己的代表大會，會上成立了“國際勞動者意大利聯合會”。

這個新組織的產生正当全國罷工運動高漲之際：一八七一年發生了罷工二十六起，一八七二年——六十四起，一八七三年——一〇三起。無政府主義者和瑪志尼擁護者關於罷工問題的決策是不相同的。利米尼代表大會認為：“罷工對工人很少益

① 薄湯是用玉蜀黍粉或栗子粉做成的一種薄湯。——俄文版編者

② 關於共產國際在意大利的活動和巴枯寧的作用，參閱馬納庫達：“一八五三——一八九一年工人代表大會和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一文中所引用的書信，阿·馬拉畢尼：“社會主義者初期的鬥爭”，載“復興”雜誌，一九四九年羅馬版，第一五——五七頁。

处，不过對於在勞資鬥爭中培养工人的團結一致的精神倒是十分有利的。”一八七三年三月無政府主義者在波倫亞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新討論了罷工問題。大会認為極有必要“把涉及勞資關係的任何反抗形式的問題提交全支部討論”。此外，大会認為必須建立按產業分類的支部和联合会。一八七四年三月參加“兄弟会”的工人協會在羅馬舉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瑪志尼派也研究了罷工問題，不过大多數代表反对採用他們的方法。那時，階級鬥爭和工人運動早已大大向前推進，因此，瑪志尼派的主張已經陳舊過時了。

無政府主義者雖然承認在反对資本家的經濟鬥爭中，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是必要的。但是他們不了解階級鬥爭的政治實質，因為他們的活動是依據烏托邦思想為出發點，即認為社會革命是可以通过謀叛者的突然暴動而實現。这种立場使工人階級的經濟組織和它的政治組織之間的界限混淆起來。在意大利社會黨和首批勞動介紹所建立以前，這個特性一直是意大利工會運動的特徵。在意大利工人運動从瑪志尼所傳播的“兄弟会”思想中解放出來和互助會轉變成為有組織地反抗僱主的聯盟的時期中，無政府主義很流行，它是敌視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派系，它否定黨的領導作用，完全依靠工人運動的自發性，因此它的傳播就不能不妨碍新生長的工人組織的發展。儘管工人們在鬥爭中表現了堅毅和勇敢，整個說來，工會運動增長得異常緩慢，並且沒有明確地意識到自己的目標、力量和任務。

較為突出的是不論巴枯寧分子或是瑪志尼的擁護者对當時工會組織發展最壯大的部門——印刷工人聯盟都沒有很大的影响。一八七二年十二月，排字工人協會在羅馬舉行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意大利印刷工人工會，以後，在一八九三年又成為意大利印書工人联合会；这是意大利第一個按產業部門分類的全國性联合会^①；這個联合会最初只有排字工人，但不久機器印刷工人也加入了。一八七四年，這個联合会開始出版“印刷工

人報”；一八七八年，它已擁有協會二十七個和會員二二六八八人，其中有排字工人，機器印刷工人和學徒。同時，這幾年發生了印刷工人最初的大規模的行動，例如：一八八〇年在米蘭的罷工。印刷工人在組織方面雖然比其他職業走在前面，但正是這種情況助長了一定程度的關門主義和行會主義的特性，它們的影響雖隨着時間的消逝而逐漸減弱，但始終沒有完全消除。

二 工人組織和社會主義

七十年代末期，意大利工人運動中產生了新的派系。一八七四年在波倫亞和一八七七年在聖盧波（本尼凡托省）組織暴動失敗以後，巴枯寧主義的“同盟”的影響大為縮小。在倫巴第興起了當時稱為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新“進化”派。領導這個派系的是羅第出版的“平民報”的編輯恩利科·平亞米尼^①。這個派系是由一批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這個派系整個存在時期中始終對第一國際總委員會保持忠實的人所組織的。與此同時，在巴勒摩“窮人報”的周圍也成立了類似的團體。一八七九年，羅馬尼約州無政府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的首腦安德烈·科斯塔加入了這個新派系。當時這個派系又稱為“合法主義”，因為它不承認巴枯寧主義者謀叛的鬥爭方法和他們的拒絕參加議會選舉。當時，主要是在倫巴第和羅馬尼約，所謂“勞動子弟”^②的團體有了發展。工人運動中開始感到有利於進一步發展工人運動的新思潮和產生了必須成立社會黨的思想。

那時，許多工人協會仍繼續遵循瑪志尼的方針，雖然階級鬥

① 在意大利工會運動中，聯合會就是各地任何一個產業部門勞動者聯盟的全國性組織的名稱。——俄文版編者

② 恩利科·平亞米尼（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年）——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加里波特的戰友，以後是工人運動家，洛迪城（米蘭附近）的社會主義派系報紙“平民報”的出版人，曾和恩格斯保持聯繫，但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俄文版編者

③ 社會主義思潮的一些最初的工人組織是這樣稱呼的。——俄文版編者

爭的日常實際經驗已經要求它們轉向更堅決的行動。此外，特別在倫巴第，領導許多互助會和合作社的急進民主主義派領袖們的影響十分大。例如，在米蘭，急進主義者領導着所謂“工人會”的組織，它包括了若干工人協會。總而言之，這個時期的工人運動在極大程度上是處於資產階級最急進一派的影响下。他們企圖利用工人運動反對保守主義者，同時又力圖削弱萌芽不久的社會主義運動。这就激起了工人階級、尤其是它的最先進的階層劇烈地憎恨資產階級分子方面的保護。這些努力的結果是：一八八二年在米蘭成立了純粹由工人組成的意大利工黨，它和任何其他黨派團體，不論是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新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都沒有联系。工黨在一定程度上把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急進主義者的保護下解放出來，但是它自己却沒有超越近視的行會主義和手工業主義。工黨沒有社會主義綱領，只限於要求一般的民主自由和改善工人經濟狀況的改良。工黨在組織上，與其說像一個政黨，不如說像一個工會組織。它的第一個綱領規定，它的目的是支持工人舉行罷工，以及“在協議的基礎上建立地方性的反抗同盟，這種協議要反映它們的團結一致和保障它們各自的獨立性，但不妨礙在將來建立統一的工人同盟”。在次年，即一八八三年，“勞動子弟”同盟開始建立，並建立許多支部（請不要跟前述的支部混淆起來）。正是在米蘭及倫巴第其他工業中心分佈的這些同盟成為意大利工黨的核心。

意大利工黨迅速發展。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它合併了團結一批獨立的互助會的倫巴第工人同盟。在一八八六年的選舉中它獲得了一萬七千零九十一票，可是它的候選人一個也沒有當選。黨的報紙“工人聯盟”銷行很廣。儘管黨的活動家遭到鎮壓和審判，黨仍繼續組織工人的罷工和發動。整個說來，它的活動提高了產業無產階級為增加工資而鬥爭的戰鬥精神，但是由於它的政治立場的曖昧不明和缺乏明確的社會主義方針以及它的活動範圍幾乎只限於工業中心的倫巴第這一狀況，使得工黨在一八

七七年——一八九〇年就喪失了自己的影响。

在同時，我們上面所談到的稱爲社會主義者的另一派系成長和鞏固了。社會黨還沒有出現，不過米蘭早已存在着社會主義者同盟，而卡米洛·布拉姆保里尼^①在艾米里亞進行着宣傳工作，在羅馬尼約出現了越來越多以科斯塔爲首的“勞動子弟”小組。這些派系和工黨的滙合，以後也導向社會黨的形。但要建立社會黨必須一方面首先克服意大利工黨的宗派主義，另一方面又必須克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殘餘。意大利工人運動只有和先進的社會主義理論，即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才有可能成功地解決這個任務。也只有在那種情況下，最後才能使無產階級的二種階級組織形式——工會和黨劃清界限，而在这以前，在意大利，它們被混淆起來。

在那種複雜的思想上和組織上進行劃清界限的過程中，意大利階級鬥爭急劇地加深了；廣大的勞動羣衆行動了起來；罷工的次數，從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一年的時期中曾由五十八次減少到四十四次，但到一八八六年即增加到九十六次，而到一八九〇年已達到一百三十九次。人民羣衆積極性的高漲，是由於國內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必然伴隨而來的經濟危機以及一八八八年克里斯比^②關稅政策所引起的麵包價格的上漲。

這個時期最值得注意的新現象是在有着尖銳的社會衝突的農村建立了反抗地主的組織。在過去，在七十年代中，農村勞動人民也曾有過罷工，主要是在下倫巴第，但這只是偶然的發動，而沒有促成反抗組織的建立。直到一八八〇年以後，巴達盆地

① 卡米洛·布拉姆保里尼(一八五九——一九三〇年)——意大利最早的社會主義活動家之一，後來成爲改良主義者。——俄文版編者

② 佛蘭契斯哥·克里斯比(一八一八——一九〇一年)——十九世紀中葉後期的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從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六年(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年曾中斷過)曾擔任首相。金融資本利益的代表人，實行最反動的國內政策和在非洲實行廣泛的殖民政策。——俄文版編者

農業工人的罷工才成爲經常的現象。這種發動的規模一天比一天浩大，對意大利工人運動發生了巨大影響。這種發動次數增加的原因是，隨着資本主義農場的發展在巴達盆地有了大批農業無產階級羣衆。大批農業工人被強迫從固定的僱傭工人的地位轉到按日計工的僱農的地位，對分制在許多地區瓦解了，勞動力由落後地區源源走入比較發達的地區，僱農湧向大力進行土壤改良的省份，——由於這種原因，同土地沒有固定關係的僱傭工人集中了下來，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可以隨時走上進行有組織的鬥爭的道路①。

首先着手建立反抗大地主組織的是孟都亞省的農業無產階級。在七十年代，孟都亞省的小農受到大資本主義農場的排擠而破產的過程特別劇烈，而且當地僱傭工人的生活條件異常艱苦，他們只有臨時性的工作並成千上萬的死於糙皮病。一八八四年，在這個地區成立了兩個強大的組織：孟都亞省農民互助會和意大利勞動者同志會總會。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五年爆發了巨大的罷工和一系列的發動。在這以後，隨着而來的是這兩個組織被解散和二百個農業無產者被逮捕。一八八六年，他們在威尼斯法院受審，罪名是組織“犯罪的團體”。不過，這次被告被宣告無罪。在以後幾年中，孟都亞省的工會運動再度興起，合作社運動也隨之有了廣泛的發展。

在這以前，波河流域的農業無產者曾在波勒辛（羅維戈省）進行過發動，但是這些發動的組織性較差。當時，農業工人的罷工和騷動還發生在斐拉拉區與巴勒摩和勒佐的平原地帶以及羅馬尼約等區域。在這些地區首批反抗大地主的同盟和第一批合作社成立了。一八九〇年，農業工人中的工會運動中心完全轉移到艾米里亞。當時和下倫巴第一樣，艾米里亞大多數農業企

① 關於意大利大批農村無產階級的發生參閱埃·賽列尼：“意大利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八六〇——一九〇〇年），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第三二四——三五九頁。

業未經營畜牧業，僱着有限的但比較固定的僱傭工人，情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穩定。但問題在於在艾米里亞，特別是在波河下游，大規模的土壤改良工作根本改變了過去的社會關係。因此，這些地方就產生了農業無產階級運動的最有組織的形式和迅速地提高了它的戰鬥精神。“集中在艾米里亞平原的無產階級羣衆的堅定性、戰鬥精神和團結一致使他們成爲意大利農業無產者的先鋒隊伍和整個意大利農業和社會進步的主要推進者之一。”^①正是在這些地區，受警察支持的農場主進行的鎮壓特別殘酷。一八九〇年五月，意大利警察在槍殺康采里齊（拉維那省）種稻農場的罷工工人後，即着手對農業工人進行長期的、可恥的一系列血腥鎮壓。

^① 參閱埃·賽列尼：“意大利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八六〇——一九〇〇年），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第三五三頁。

第二章 無產階級的進攻和 資產階級的反動

一 社会党的成立和勞動介紹所的形成

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对意大利工人運動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兩個重大的事件幾乎在同時發生，即社会党的成立和第一個勞動介紹所的形成。在一八九一年八月米蘭的全國工人大会上即曾着手準備成立社会党。但大家知道，它是在一八九二年八月熱內亞代表大会上才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一方面同無政府主義者進行了最後的決裂，另一方面，使米蘭社会主義者同盟和意大利工党合併成爲一個統一的政治組織——意大利工人党（一八九三年改名爲意大利工人社会党，到一八九五年又改名爲意大利社会党）。羅馬尼約地區以安德列·科斯塔爲首的組織不久也歸併入這個政治組織。儘管這個新的政党缺乏明確的理論方針和党内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各种傾向，这在以後會嚴重地妨碍了党的發展，可是，在意大利工人運動史上，熱內亞代表大会開拓了一個真正新的時期。一個包括全意大利無產階級的組織破天荒第一次成立了，並吸引工人階級參加了國家的政治生活。

但是，在熱內亞代表大会以後的一個時期，工会組織和政党之間仍舊缺乏明確的界限。新政党和以前的工党一樣，仍不过是各個聯合會的聯盟，而不進行吸收個別的黨員；同時，聯合會本身大都帶着產業部門性質。然而熱內亞代表大会所通過的綱領中已經提到劃清兩種鬥爭的界限：一種鬥爭是“勞動介紹所和其他手工業者聯合會所領導的直接爲改善生活條件（工作日、工

資和工廠規章)而進行的職業鬥爭”，另一種鬥爭是“奪取國家政權機關(國家、市政府和行政機關等等)的更加廣泛的鬥爭，以使國家政權機關从目前作為鎮壓和剝削的工具變成由經濟上剝奪統治階級的工具”。這種說法証明了當時和馬克思主義很少聯繫的意大利工人運動理論上的弱點。這個說法指出“職業鬥爭”的特殊組織形式，但未同時指出政治鬥爭的組織形式。於是只能這樣假定：即代表大會只責成黨擔負起職業鬥爭的任務。此外，工會本身的活動仍被狹隘地理解成爲地方性的、行會式的活動，“職業鬥爭”的說法就表明了這一點，並且也說明了，完全忽視工會和政治鬥爭的聯繫。一句話，新政黨的內部還遺留不少過去工黨的行會主義的殘餘。

一八九三年九月的勒佐—艾米里亞代表大會向前跨了一大步，會上通過了“關於經濟鬥爭、反抗企業主聯盟、罷工和勞動立法”的決議。決議中說：

“代表大會注意到：勞動人民的政黨應以經濟鬥爭捍衛被剝削者反對剝削者的利益，由於城市和鄉村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的殊異，要求利用那些最符合各地情況的經濟組織形式。代表大會爲此責成區和省的聯合會注意經濟鬥爭並領導這個鬥爭，在城市和鄉村工人中間，依據羣衆積極性和當地情況宣傳反抗企業主的原則，爲反抗企業主運動的利益團結一切階層，不管這些運動是黨所附屬的組織發起的，抑或是在中央委員會認可下，由聯合會承認和贊同的；同時爲了宣傳的目的，必須支持那些不附屬於黨的組織所進行的罷工；

黨認爲爭取廢止間接稅和關稅、爭取縮短工作日到八小時、保護女工和童工以及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等是有益於經濟鬥爭的；黨並認爲在各中心地點作爲階級組織基礎而產生的各種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也是有益的，如果它們的目的不是在追求它們會員的個人發財致富。”

在這個決議中已經含有黨應該在一定範圍內領導工會活動

的思想，可是這種領導方式還是十分模糊不清、只局限於指出最一般性的任務，而沒有給予關於在城市和鄉村中組織鬥爭的具體指示。實際上，黨是在躲避具體領導，依賴地方上的自發的積極性，只給聯合會擔任一個不明確的監督和領導的任務。最後，黨和工會之間還是缺乏明確的界限。

巴馬的代表大會（一八九五年一月）向前躍進了新的一步，會上，以絕大多數票通過決定：今後黨將“通過地方上的社會主義小組進行其政治工作，這些小組建立在個別接收黨員的基礎上”。這才完成了劃清工會組織和黨的界限的漫長過程。黨有了獨立的組織機構，並終於克服了行會主義的殘餘。巴馬代表大會最後通過將黨的名稱改為意大利社會黨。可是，這個代表大會是在非法情況下舉行的，因為在一八九四年，意大利社會黨即被反動的克里斯比所禁止。克里斯比政府還破壞工會運動。可是，正在這幾年，工會運動找到了新的組織形式——勞動介紹所，它是意大利工會運動的特點。

早在熱內亞代表大會上，就曾向勞動人民指出勞動介紹所是工會鬥爭的一種工具，它的發起是仿效法國的職業介紹所。法國的第一個職業介紹所是一八八七年在巴黎成立的，它成立的唯一目的是謀求職業，可是不久以後，它即變成爲保衛工人階級權利的組織。一八八九年，約基—維阿尼·奧斯伐爾道^①和米蘭勞動人民代表團一起訪問了巴黎的職業介紹所，因此，他就產生在意大利成立類似組織的想法。結果一八九一年在米蘭、都靈和皮亞森薩以及後來在其他城市成立了首批勞動介紹所^②。到一八九三年六月和七月，已經有可能在巴馬召集第一次勞動介

① 約基—維阿尼·奧斯伐爾道（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年）——工人運動活動家，政論家，工黨的創始人，後來成爲社會黨員。——俄文版編者

② 在意大利採取“勞動介紹所”（代替“職業介紹所”）一名，是仿效商會的，後者是當時唯一代表僱主利益的經濟組織（勞動介紹所是按地區劃分，在城市或省份範圍內團結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人民）。——俄文版編者

紹所代表大會。會上，有當時已成立的十二個城市勞動介紹所的代表參加，這十二個城市就是：波倫亞、布里西亞、克利蒙納、佛羅倫薩、米蘭、巴馬、巴維亞、皮亞森薩、巴都亞、羅馬、都靈和威尼斯。

代表大會決定成立全國勞動介紹所總會並通過了下列的綱領：

“勞動介紹所的任务是作為介紹勞動力的中介人，並在任何情況下，保障勞動人民的利益。為此必須：

(一) 在一切勞動人民中間建立聯繫和保持經常的接觸，其目的是在實踐中培養兄弟般團結和相互支援的感情；

(二) 利用意大利的或是外國的市政廳、商會和勞動介紹所的服務，為各業勞動人民設立勞動市場概況情報部，它將供工人詢問有關主要工業和農業中心勞動需求和供應的情況，並指出什麼地方最需要勞動力，什麼地方工資比其他地方的工資較高；

(三) 規定學徒的勞動條件，努力爭取實行有效的關於女工和童工的勞動立法，並監督確切執行現行法律，使之完全符合保護勞動安全的要求以及要求男女同工同酬；

(四) 通過宣傳和介紹便於男女勞動者找到適當的工作和協助簽訂勞動合同；

(五) 努力使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勞動者恢復工作和恢復名譽；

(六) 鼓勵一切手工業建立工會委員會，使它會同勞動介紹所協力訂出和實施工資比率；

(七) 在市政廳和國家行政機關前，保護勞動人民的需要和利益；

(八) 在勞資之間進行仲裁，以解決工作日時間和工資等勞動問題；並促使不但在工業中，並在農業中嚴格遵守有關仲裁委員會的法律^①；

(九) 促進消費、生產和信用等方面合作社制度的發展，並進

行監督，使工人合作社協會負責公眾的工作；

(十)在一切手工業中組織職業教育；

(十一)最後，研究如何通過建立圖書館、出版公報等方法來提高僱傭工人的知識、道德和技術水平。”

從這個綱領中可以看到，勞動介紹所最初是作為在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下，通過勞動人民自身的團結互助來改善勞動人民狀況的一種機構。它利用合法的手段，主要方法是謀求職業、促進社會保障、建立合作社和組織教育等。可是勞動介紹所對反抗企業主的問題則純粹站在防禦的地位。它把主要的注意力轉移到調解的方法上，但對罷工和其他鬥爭方法則隻字未提。勞動介紹所的奠基人是極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如約基—維阿尼和卡布里尼，他們以後成為改良主義者。因此可以理解，在最初勞動介紹所甚至取得了資產階級集團的同情，並在有些城市獲得了儲蓄銀行、商會的補助以及幾乎到處受到市政機關的補助，後者認為勞動介紹所有利於它們組織僱用勞動力。

羣衆隨即了解到新組織的優點。他們看到勞動介紹所是一個能在僱主、市政廳和國家機關的面前代表城市和鄉村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的機構，最後，它並能團結他們，而不管職業和政治見解。這就是為什麼勞動羣衆自發地把勞動介紹所變成爲工會運動中心和他們的鬥爭工具的原因。勞動介紹所在實際上領導着勞動人民的反抗企業主的聯盟、發動和罷工。僅僅在一九〇〇年以後，工業中提高工資的鬥爭的領導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轉到全國產業部門聯合會的手中。可是在農業中，勞動介紹所始終保持着領導工會鬥爭的職責，並監督簽訂勞動合同。

勞動介紹所的擴展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意大利經濟上的特殊性，這個特點就是各地區和各省份的工業和農業發展的不平

① 關於成立仲裁委員會的法律是在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五日通過的。只准許在工業中有仲裁委員會，其職權是審理個別的勞動糾紛。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一半是工人，另一半是僱主的代表。

衡，因而影响到勞動力市場的狀況。此外，上面已經提到，党在這個方面的領導既然只局限於極爲一般性的指示，所以只有省的組織，如勞動介紹所才能執行具体的工会工作。而在这些情況下，全國勞動介紹所總會的職權就只是提供情報和進行總的調整。

勞動介紹所的組織機構在最初時是一致的：所有勞動介紹所按產業部門成立支部或同盟，支部或同盟的代表組成總委員會或同盟理事會；然後推选出勞動介紹所的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此外，在每個勞動介紹所成立管理專門問題的委員會或部：如仲裁、情報和宣傳、教育、醫藥和法律諮詢、勞動就業、統計等等。

二 社会衝突和工会鬥爭

隨着國內階級鬥爭尖銳化和擴大到全國規模，工人階級越來越傾向於它們的新的階級組織形式——社会党和勞動介紹所。社会党的成立和它在一八九二年大選中的成功，一八九〇年巨大規模的“五一”示威遊行、勞動人民的騷動和罷工的規模浩大——所有这一切使意大利資產階級大爲驚慌，同時，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被嚴重的財政混亂所削弱。

一八九三年，在西西里產生了“法西”運動。同年九月，在勒佐—艾米里亞的社会党代表大會上，代表之一——加里巴爾狄·保斯科——代表團結在“法西”中的六萬五千名西西里農民出席了大會。同年年底，“法西”已經團結了將近三十萬的西西里的勞動人民——農民、礦工和其他職業的工人。這些組織的活動既帶有政治的、也帶有工会的性質。但它們的領導者力圖使“法西”的活動帶有社会主義的色彩，可是，實際上，它們所捍衛的並不是社会主義的主張。這些主張反映了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存在着意大利資產階級無力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並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增長而造成的，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

展不足所造成的^①。西西里農民奮起反對難以忍受的間接稅和市政稅的重荷，反對地主和“馬弗亞”^②黨徒所控制的市政機關的壓迫。西西里勞動人民要求歸還被強佔去的公有土地和改善租金的條件，並佔用了荒地。雖然這些行動的性質一般是由於地方性原因所激起的暴動，可是它們是反對貪污腐化的全民鬥爭的一部分。所以，社會黨完全正確地保衛“法西”和反對克里斯比政府對它們野蠻的迫害。社會黨說，西西里問題只是意大利整個問題的一部分。當時的“社會評論”強調指出：“資產階級成爲了反動的階級，革命不再和它同路，而是反對它了。”

在鎮壓西西里“法西”運動和由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西西里事件的尾聲——盧尼讓暴動以後，反動派進攻了：社會黨和許多勞動介紹所被禁閉。可是，這不但沒有制止住社會黨的壯大，也沒有阻止住工會運動的發展：在一八九五年的大選中，社會黨獲得了七萬七千張選票，而在一八九七年的大選中社會黨却獲得了十三萬五千張選票；在城市和鄉村中，風潮和罷工越來越成爲經常的現象。工會運動的增長迫使社會黨明確了它的關於經濟鬥爭的政策。一八九七年九月在波倫亞的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二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決議：一個是關於產業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另一個是關於農民問題。全體通過的第一個決議中說：

“代表大會宣稱：

黨的政治活動不應與它的經濟鬥爭脫節，因爲只有經濟鬥爭才使黨具有階級性和保證了它的革命性；

這個活動應該通過兩條道路來實現：

① 恩格斯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致屠拉基的信中，曾首創地評介了這些年代中意大利的局勢並全面闡明了意大利在新時代中的社會政治問題，這封信發表在社會黨機關刊物“社會評論”雜誌上。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二分冊，第三七七—三八二頁。

② “馬弗亞”——一種秘密恐怖組織，它的形成是爲了服務西西里島上男爵——大地產主，是他們統治島上農民羣衆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工具。——俄文版編者

(一)參加經濟上反抗企業主的運動(罷工、組織反抗聯盟、在加入經濟組織的工人之中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參加社會黨的工人應該加入工會組織,在沒有工會的地方建立同樣的工會,在工會工作中進行階級意識的教育,並使人信服政治鬥爭的必要性;他們應當支持勞動介紹所,並努力使後者廣泛宣傳產業無產階級和農業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的必要性。

(二)組織勞動人民爲實施保障勞動立法的運動。勞動人民這種行動將促進黨的政治和經濟活動的配合。

黨經常根據工會組織的要求而草擬的勞動法案,在向下議院提出以前,必須將這些法案提交工人組織進行討論,在重要工業中心召開羣衆大會並爲勝利地通過這些法案而不倦地鬥爭。在目前,代表大會認爲必須迅速通過關於女工和童工的立法。”

這個決議證明,顯然是過高估價了經濟鬥爭,即把經濟鬥爭看作是給予黨以階級性和革命性的“唯一的”鬥爭方式。這種後退到工聯主義立場的傾向是這個時期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特徵。弗·伊·列寧在其著作“做什麼?”中深刻地批判了這種傾向。在一八九七年,這種傾向還無法充分表現出來,因爲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威脅到黨和工會本身的存在。可是一九〇〇年以後,由於統治階級改變政策的結果,社會黨的經濟主義却成爲了社會黨機會主義的根源。然而,儘管波倫亞決議中在黨對工會的關係問題上有思想上的錯誤,但它還是前進了一大步,因爲在一定的程度上,這個決議闡明了社會黨人應在工會中幹些什麼,並努力克服了在某些職業的勞動人民中尚未清除的、幼稚的行會主義。

農民問題的討論引起了更多的爭論。巴達盆地農民運動的高漲使農民問題成爲首要的問題;一八九六年,在艾米里亞與克利蒙納和貝拉地區曾發生過六十二起農業工人的罷工。一八九七年,蒙里涅爾區種稻農莊的工人連續不斷地罷工六十天,可

是，不幸沒有取得勝利。因為政府的迫害特別殘酷。顯然可見，社會黨不能迴避農民問題。早在佛羅倫薩代表大會上（一八九六年七月），以比沙拉齊為首的專門委員會曾作過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只是在大體上被接受，因為大會認為這個問題必須作進一步詳盡的探討。後來，在報刊上曾展開廣泛的爭論，這些爭論表現了嚴重的思想上的混亂，主要是在關於小私有者的問題上：有些人主張支持他們，另一些人則建議完全不管他們。最後，在波倫亞代表大會上經過長久的辯論後通過了下述的決議：

“鑒於意大利農業無產階級是分為三種範疇：（一）不受合同義務約束的農民（僱農），（二）受合同義務約束的農民（科羅納和保阿洛^①），（三）分益佃農，代表大會議決社會黨的活動應致力於：

在不受義務約束的農民，即僱農中，成立反抗同盟，其目的在：（甲）以按日計酬制度代替分成制度，（乙）設立農業仲裁，（丙）組織爭取縮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資的鬥爭；

在受義務約束的農民中，成立以改進租地合同、監督遵守這種合同為目的的協會；

在分益佃農中，成立為施行和遵守合同而鬥爭的協會，這種合同要最適合分益佃農制並且要保證農民維持家庭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工資，這是農民不可剝奪的權利。

對小土地所有制的態度，代表大會深信，當前的經濟發展具有競爭性質，資產階級政府對課稅方面的要求不斷提高，同時勞動人民的組織起來的程度越來越急速提高，這些因素將使小所有制一定遭到消滅。

代表大會認為社會黨對待小土地所有制所採取的立場應該是，闡明決定資本主義集中化、小私有者無產階級化的原

^① 意大利許多小型租佃土地使用形式中的兩種。——俄文版編者

因。”

在這個決議中，社會黨在實質上只限於承認農村中自發展開的農業無產階級（僱農——日工或長工）的鬥爭，但並不認真地提出關於黨在農村中直接工作的問題以及關於吸引農村居民中新的階層到工會組織中來的問題。顯而易見，在一八九七年，理論上軟弱無能的意大利社會黨對農民問題的提法是會不正確和明白的。就連當時其他國家的社會黨也未能辦到這一點。但這在以後由列寧作到了。在他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提綱”^①中，弗·伊·列寧對農業居民的分類不是按照抽象的法律上的特徵（具有這種或那種土地所有形式或各式各樣的確認土地使用權關係的合同），而是依據每個階層的真实情況。列寧把他們分成農業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農、中農和富農。工人階級可能而且應該率領其中前三類的農民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至於中農和富農，前者雖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但應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使其保持中立，可是富農則是（但並不永遠是）無產階級的敵人。

同時應當指出，波倫亞決議中十分簡略地談到關於小土地所有制。關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方針在很長時期中給予了社會黨一切農業政策、意大利勞動人民的工會和其他階級組織不良的影響。大家知道，在意大利許多地區，主要是南部，小土地所有者是半無產階級，他們被逼成為作日工的僱農或者移居到別處去。早在波倫亞代表大會以前的幾年中，恩格斯就曾對這個問題作了十分明確的敘述。在他的著作“法德農民問題”中，他寫道：

“我們能使之不真正轉變為無產者而把他們仍然作為農民吸收到我們這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變革底進行也就愈

^① 指的是列寧的著作：“土地問題提綱初稿”（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而作），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二卷，第七八〇頁。

加迅速和愈加容易。”^①

与此相反，意大利社会党在波倫亞通过的決議中拒絕在小土地所有者中間進行任何認真的工作和反对屠拉基的關於在小所有者中也成立協會的建議（誠然，這個建議是以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作出發點的）。從那時起，工會在農村中只在農業工人中間進行工作。而在分益佃農中進行的工作更微乎其微。這種政策在一九〇〇年七月米蘭舉行的勞動介紹所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得到支持。小土地所有者的被拒絕吸收到工會中來對以後的工人運動有着不良的後果，因此，它的結果是這批農民羣衆大部分落在僧侶和反動派的影响之下。

三 爲結社自由而鬥爭

在一八九八年事件^②後的反動時期中，工會組織遭受到嚴重的打擊：在當時存在的二十五個勞動介紹所中，二十一個被解散了。可是次年，它們就開始重新活動，到一九〇〇年，其中十九個已經恢復工作。同時，在議院中反对佩魯^③政府的鬥爭加劇，結果左派得勝。一九〇〇年的大選鞏固了這個勝利：社会党爭取到十六萬五千張選票和在議院中獲得了三十三個席次。在佩魯政府倒閣以後，新的沙拉科^④內閣被迫緩和政府政策的反動性。這時，關於工會自由的問題具有了頭等重要的意義，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殘酷的鬥爭，而這個鬥爭本身標誌着意大利政

①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頁。

② 一八九八年五月在全國掀起暴動、罷工和農民行動的浪潮，這是由於危機的嚴重後果和政府反民主措施所引起的。五月事件在米蘭表現得特別尖銳，那裏的暴動工人和政府軍隊進行了五天的街壘戰。——俄文版編者

③ 羅依齊·佩魯（一八三九——一九二四年）——意大利將軍和政治家，在一八九八——一九〇〇年擔任首相，執行了最反動的政策。——俄文版編者

④ 朱塞佩·沙拉科（一八二一——一九〇七年）——溫和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在一九〇〇年曾擔任首相。——俄文版編者

治生活中的决定性的轉變。

一九〇〇年，工会運動大大地加强了。在这一年中發生了四一〇起罷工，有八〇、八五八勞動者參加。可是工会自由依然受到威脅，因為在議院中遭受到失敗的反動勢力恰好決定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攻擊。為了正確地了解這個鬥爭的意義，必須考慮到那時存在的關於勞動糾紛的法律和如何來解釋這個法律。

一八九〇年实施的柴納狄利刑法法典不包含禁止勞動人民結社和罷工的某种條款，可是它的條款中有幾條在保障“勞動自由”的藉口下，幾乎使得結社和宣佈罷工毫無自由。柴納狄利法典的第一六五條和第一六七條規定有下列情形者判处徒刑二十個月：“以暴力或威脅擾亂，或者在任何程度上妨碍工業和商業活動自由”者；“以暴力或威脅停止工作，以强迫工人、僱主或企業主接受削減或增加工資或者是改變原先簽訂的協議”者。此外，第一六七條規定“上述條款載明的行爲的領導者或組織者应判有期徒刑三年到五年和罰款五百到五千里拉”。这些條款使得有充分的可能來保護破壞罷工的行爲和有步驟地破壞罷工和結社的自由。因此，同一八五九年的刑法法典比較，柴納狄利刑法法典只是在形式上前進了一步，而且新法典的第二四七條和第二五一條認定“在社会階級間煽起仇恨”是一种犯罪的行爲。

實際上，在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的十年中，定期地解散工人同盟和其他組織，一八九四年採取關於流放移居的非常法，不止一次宣佈戒嚴，建立战地軍事法庭，逮捕和審訊社会党的活動分子，農村和城市進行血腥迫害和以警察和士兵代替罷工工人等等，对工会組織的存在和活動造成了異常艰苦的形勢。可是，这些措施沒有摧毀工人和農民的頑抗性和勇敢精神。在每次反動派進攻以後，工人組織即重新成立，並帶着新的力量和更大、更廣泛規模的鬥爭捲土重來。當時，意大利無產階級完全了解到：当鞏固的經常的工会組織还未出現以及沒有作到使政府政策的總方針改變以前，他們任何的成果是不会持久的。在

羅馬的代表大會(一九〇〇年九月)上通過的“最低”綱領中，社會黨提出下述要求：

“保證一切經濟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合作社、同盟、工會、勞動介紹所……。廢除刑法法典第二四七條和第二五一條。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糾紛中，政府應完全保持中立。結盟和罷工有真正自由。禁止用警察代替罷工工人。在關於罷工問題上承認大多數表決的權利。廢除刑法法典第一六五條和第一六七條。實施保障勞動人民反對僱主的結社集會自由的立法。”

正當社會黨人提出這些要求之際，企業主圖謀嚴重打擊結社自由。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熱內亞地方長官命令解散勞動介紹所，在這以前，這個勞動介紹所已經兩次被當局解散(在一八九六年和一九〇八年)。可是，它每次被解散以後都恢復了。在熱內亞勞動介紹所中團結了一批組織在同盟內的碼頭工人，他們那時正在努力爭取締訂新的勞動合同。資產階級爲了企圖保持自身的特權，照例和政府當局勾通，在所謂“威脅社會治安”和不容許挑撥階級仇恨等的藉口下，隨時準備進行逞兇肆虐和迫害。可是這次接踵而來的却是勞動人民的有力的回擊。由碼頭工人開端的罷工迅速地變成爲總罷工。在意大利，不同職業的勞動人民還從未有過這樣團結一致的行動。參加罷工的約有二萬人，城市的生活在四天之中完全癱瘓了。罷工者所表現的決心以及由此激起的全意大利勞動人民的同情，迫使沙拉科政府吩咐熱內亞長官下命令恢復勞動介紹所。

這是一次巨大的成就並對國內整個局勢都發生了影響：一九〇一年二月沙拉科政府倒台了；接替它的是柴納狄利政府，其中內政部長的位置由喬里齊擔任。在這以前幾天，喬里齊曾在下議院發表關於工人結社自由問題的演說，他說：

“不幸在許多人中有一種頑固的傾向，認爲勞動人民的一切結社是危險的。因此勞動羣衆鑒於對待他們不信任，所以在同政府和國家關係上就產生了敵對情緒……勞動介紹所本身並不

是不合法的。它們的宗旨只不过是改善工人們的生活水平。它們是可以作為勞動和資本之間的令人滿意的中間人。如果它們採取敵對的立場，這只是由於它們認為本身經常遭受迫害。迄今為止，如果勞動介紹所不違反法令，對它應該尊重。倘若它們違反法令，那時應當委託法院當局處理這些違反法令的問題。勞動介紹所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表應被法律承認，猶如代表資本公司利益的商會為法律所承認一樣。

政府採取把工資壓在低水平上的措施是犯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錯誤。政府如果要實現調處的職能，應站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鬥爭之外。另一方面，這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認為低水平的工資能促使經濟好轉；實際上，工資水平高的國家，領導着工業的進步。”

由此可見，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迫使統治階級改變其政策的性質。工人運動新的時期開始了。

第三章 喬里齊統治時期

一 新的形勢。工会鬥爭和工会組織的發展

以上所引用的喬里齊的演說說明了意大利資產階級準備執行的新政策的特徵。喬里齊本人正是資產階級的狡猾的發言人和領導人。他起初在柴納狄利政府中担任內政部長，後來則曾先後三次親自或通過他的心腹人物長期地佔據內閣總理的職位（從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四年）。

安東尼奧·葛蘭西曾闡明這個政策的性質如下：

“早在大战以前，資產階級即不能平安無事地統治國家。一八九四年的西西里農民起義和一八九八年的米蘭暴動對資產階級來說是十分慘痛的經驗。在流血的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十年以後，資產階級被迫放棄過分極端的、過分恐怖的和太直截了當的獨裁；南方的農民和北方的工人雖不是相互呼应的，但會同時奮起反抗這種獨裁。在新的世紀開始，統治階級轉向新的政策……資產階級面臨一個抉擇：或者是和南方的農民結成聯盟，關稅自由政策，普選權，行政管理地方分權制，降低工業品價格；或者是和工業結成聯盟，沒有普選權，主張保護關稅政策，保持國家的中央集權制（這反映資產階級對農民，特別是對南方和各島嶼的農民的領導權），主張在工資和工会自由方面採取改良政策。資產階級選擇第二條道路，這不是偶然的。喬里齊成為資產階級統治的體現者，而社會黨則成為喬里齊政策的工具。”^①

在這種形勢下，意大利工会運動的發展不能不帶來階級鬥

^① 葛蘭西：“南方問題”，載“復興”雜誌，第二卷，第二號，一九四五年二月版。

爭的尖銳化，因為喬里齊政策只是在一定限制內不阻撓羣衆運動。喬里齊雖依靠了佔據社會黨和工會領導地位的改良主義者首腦們的直接和間接的幫助，企圖在工人階級中造成特殊的階層。但是羣衆的革命運動不但沒有削弱，却經常表現出力求超出對它所規定的範圍。因此，讓步政策極為短暫，到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就放棄了。

意大利工業的發展，特別顯著的是在一九〇〇——一九一三年期間，具有極端不平衡的特點（這是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特點）。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引起國內社會—經濟結構的尖銳矛盾，首先是北方和南方之間的矛盾。意大利的資產階級，不同於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他們沒有殖民超額利潤，使他們可以實行昂貴的社會政策。因此，從改良政策中得到利益的工人階層比較起來往往數目很小，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特權從來就不是穩固可靠的。這種情況在社會黨中惹起了不間斷的左右搖擺，並在黨內和工會組織中引起各種不同派系的鬥爭。

這裏所談到的時期，已經指出是意大利工業迅速發展的時期。意大利大規模的冶金工業的興起是在一九〇二年。在這以前，在厄爾巴島上的最大的鐵礦產地曾被一批比利時工業家所開採。一九〇二年，政府收買了這些開採的礦山，並把它們轉讓給意大利工業家。而那時，意大利工業家已經在薩窩那和特爾尼奠定了規模較小的冶金工業基礎。冶金工業發展得異常迅速：一九〇二年這個部門的工人數目是一萬五千人，而一九〇五年，這個數目已達到三萬五千人。同時，機器製造工業、汽車工業和紡織工業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紡織工業部門的企業和工人的數目在七年中增加了一倍。

起初，新的政策和工業的迅速發展對工人運動的發展形成了有利的條件。在一九〇一年，工會運動向前躍進巨大的一步。在這一年中，發生了罷工一、六七一起，其中工業佔一、〇四二起（有一九〇、五四〇人參加），農業佔六二九起（有二二九、八九五

人參加)。在工業中和農業中一樣，進攻性的罷工比防禦性的罷工佔更重要的地位(目的在增加工資和減少工作日時間的罷工在工業中佔百分之六十九，在農業中佔百分之七十三)，罷工本身的持續性加長了，同時罷工的結果得到成功的百分比也增長了(在工業中，百分之二十六的罷工的結果取得完全的勝利，百分之五十——部分勝利，只有百分之二十四——沒有成功；在農業中，百分之四十四罷工的結果取得完全勝利，百分之四十五——部分勝利，百分之十一——沒有得到收穫)。總計在這一一年中，勞動人民曾順利地迫使企業主吐出了一億五千萬里拉作為工資補助金。

農村中的運動更為有力：按它的廣泛性和所具規模，它帶有普遍高潮的性質，如果考慮到上一年度農村中只發生過二十七起罷工，那就更使人有這樣的看法了。許多發動使僱主們手足無措，以致迫使他們讓步。可是，這次運動並未波及全國，而主要的只是席卷了意大利的北部——艾米里亞省、倫巴第省、維涅托的幾個地區(波勒辛、維羅那)和皮蒙特(諾伐拉、維切利)。如果不把阿布里的騷動計算在內，勞動人民在意大利其他地區的發動是為數極少的。同時只有僱農和固定的農業工人參加了這些發動。

一九〇二年，罷工的次數減少了，而在城市中和農村中，僱主的抗拒愈形頑強。到一九〇三年，這種趨勢表現得更為明顯。罷工失敗的百分比增長了，一九〇二年在工業中達到了百分之三十四，而在一九〇三年則達到百分之四十四。由此可見，工人階級又再度被迫轉向防禦。

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的工人階級鬥爭使它的組織性顯著地加強了。例如，如果一九〇一年有五十八個勞動介紹所，到一九〇二年則已有七十一個，並擁有會員二八四、四三〇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八九八年事件以後，勞動介紹所僅只存下四個，而在一九〇〇年，全意大利也僅只有十九個。雖然當時工人

運動的發展主要的仍在北部，可是它已經開始蔓延到中部、南部和各個島嶼。一九〇一年十月，勞動介紹所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勒佐—艾米里亞舉行。這次大會的舉行正當工會運動比過去越來越尖銳地感到有在全國範圍團結起來的必要性，首先是加強爭取改進勞動立法的鬥爭，因為勞動立法一點點也沒有滿足過勞動人民。在勒佐—艾米里亞的代表大會上，又一次討論了一九〇〇年七月在米蘭代表大會上涉及過的關於勞動介紹所在法律上被承認的問題。大多數的代表表示反對這種承認的必要性，他們不無根據地耽心：法律上的承認只會限制組織行動的自由^①。

在勒佐—艾米里亞代表大會上還討論了其他兩個重要的組織上和政策上的問題：關於勞動介紹所、合作社與互助會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和關於勞動介紹所與全國聯合會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關於前一個問題經過熱烈爭辯後通過了一項決議，這個決議是關於在確實保證它們的真正工人性質的條件下，接受合作社^②和互助會參加勞動介紹所。同時並決定：今後全國勞動介紹所總會應該協助“成立全國聯合會，並盡力爭取勞動介紹所的分會參加相應的產業部門的聯合會”。這個任務曾是十分艱巨的，因為勞動介紹所在對待產業部門聯合會的關係上曾表現了一定程度的敵對態度，這種敵對情緒在一九〇〇年以後開始獲得廣泛的傳播。

以上已經談到的第一個產業部門聯合會是印刷工人聯合會，一八九三年它變成爲意大利印書工人聯合會。除了印刷工

① 反對法律上承認工會組織，顯然開始已列入喬里齊計劃，沒有自己組織的僱主們也表示反對並盡一切可能力圖避免和工會代表談判。那個時期的許多罷工是被僱主拒絕同工人同盟的代表進行談判所激起來的。一九〇二年，急進主義者古依道·阿列西奧提出關於法律上承認勞動介紹所的法案，但是引起如此堅決的反对，以致放棄了它。

② 關於合作運動的發展，參閱斯·斑薩松：“意大利的合作與改良主義”，載“社會文化”，一九四九年羅馬版。

人，它还团结了纸型工人、石印工人、铸字工人和装订工人。毫无疑问，这个联合会是意大利当时存在的一切产业部门联合会中最鞏固的一个，它具有为切身要求而作顽强斗争和屡次获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它拥有很发达的互助制度和自己的报纸。这个联合会通过伯尔尼的世界印刷工人书记处还曾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发生联系。虽然这样，但是意大利印书工人联合会长期存在着贵族工人所特有的一定程度的关门主义，而且虽然许多印书工人是社会党员，有的甚至于在党内担任领导的职位，但他们力图回避政治斗争。

按时间先后来说，第二个成立的产业部门联合会是铁路工人的组织。意大利北部铁路司机和司炉工人互助会是在一八七七年成立的。按照这个范例，一八八三年在意大利南部成立了类似的南部与加拉勃利亚—西西里铁路司机工人和司炉工人的组织。一八八三年，这两个组织合并成为一个互助会，不久，这个互助会把自己的活动很快扩大到工会斗争方面。一八九〇年，它改组成为一个包括一切范畴的铁路工人的“铁路工人法西奥”^①。这个“法西奥”不久又被改组成为意大利铁路工人同盟，最后成为意大利铁路工人的工会组织。

由于大罢工的結果，一八九一年产生了冶金工人的工会，这个组织曾在一八九八年反动时期中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可是它很快就恢复常态。在一九〇二年，意大利冶金工人联合会已拥有五万会员。一八九八年，国家企业工人联合会（製烟工厂、港口造船厂等等）成立了，到一九〇〇年，意大利建筑工人联合会和私人企业职工联合会也成立了。

由此可见，在一九〇一年以前，只有少数的劳动者团结在全国性的联合会中。可是，由于新的政治形势和一系列的关于工资问题的社会纠纷的结果，成立联合会的运动在那时具有了巨

^① “法西奥”，即联盟的意思。——译者

大的規模。當已成立的联合会進行改組和擴大它的活動範圍的時候，一九〇一年崛起許多新的联合会——木材工人、紡織工人、街道照明工人、製帽工人、化學工業工人、電車工人等联合会。一九〇二年成立了衛生工作人員、皮鞋工人、海運工人等联合会。最後成立了農民联合会，關於這個組織的作用在以後再談。

當然，联合会力圖執行勞動介紹所的許多職能，首先是關於談判工資的職能，並使勞動介紹所變成爲只不过是地方上互相配合行動的機構。因此，由於联合会和勞動介紹所兩者之間劃分權限而引起的衝突便成爲司空見慣的現象。可是，這種競爭和“联合会派”同“勞動介紹所派”^①之間的一切論爭不僅僅是組織上的，而且也是政策上的。雖則联合会是反映了工人階級組織性的加強，可是它們很容易走向改良主義：其中許多联合会又產生了舊的行會主義精神，而這種行會主義精神本來是沒有完全根除的。於是，這些联合会力圖使個別職業的勞動者的鬥爭，特別是爲工資的鬥爭來代替階級鬥爭。因此，站在社會黨領導地位的改良主義者熱烈地支持联合会和努力加強它們，並非偶然的。我們已經看到，以工聯主義的政策代替社會主義的政策傾向，曾出現在第一次社會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和一九〇〇年羅馬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最低綱領”中，而這種傾向整個說來在联合会中獲得了有利的立足點。這種傾向不只是意大利工人運動的特點，而且是全歐洲工人運動的特點。它在英國職工會中找到自己典型的表現，在德國工會中也獲得廣泛的傳播，而意大利部門联合会是按法國工會的樣子建立起來的。這種傾向思想上的根源是在於對羣衆自發性的崇拜。正爲了進行反對工人運動中這種傾向的鬥爭，列寧創擬了關於黨是無產階級組織最高形式的學說。

^① “勞動介紹所派”——勞動介紹所的擁護者。——俄文版編者

可是，勞動介紹所按其自身的構成說，不僅是關切加強不同職業的勞動者的團結，而且也表示關心遭受到最大剝削和壓迫的、較爲不熟練階層的勞動者。此外，由於勞動介紹所也團結農村勞動人民，它們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工農聯盟（雖則只是萌芽的狀態和只有省的規模）。因此，勞動介紹所照例是一個比聯合會更有戰鬥力的組織，雖然它有時採取輕率的決定，但它們更適合羣衆的革命要求。所以，對它抱同情態度的是那些不滿意意大利社會黨內猖獗的改良主義傾向的人。幾年以後，個別的勞動介紹所成爲了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堡壘。

在伊莫拉舉行的社會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以屠拉基爲首的改良主義派較以菲利^①爲首的所謂革命派取得優勢，在這以後，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在米蘭舉行了勞動介紹所和全國聯合會的代表聯席會議。在這個代表聯席會議上決定成立這兩個組織的全國性總機關——中央反抗運動書記處，它的職責的一部分是：協助建立新的部門聯合會，協調全國規模的勞動人民的發動，保證勞動介紹所和聯合會之間的一致，代表意大利加入柏林的國際工會書記處。這個書記處由八個成員組成：其中四個由勞動介紹所中央委員會推選，另四個由聯合會的會議（這個會議的名稱是全國反抗運動會議）推選。這種妥協性的決定使得新的組織被改良主義者所控制；書記處的領導人由改良主義者安席洛·卡布里尼擔任。

過了幾天以後，在波倫亞舉行的代表大會上，成立了全國農民聯合會。當時有不少誇誇其談的高調。菲利、加蒂、柏納羅利、保諾米^②在他們提議的議案中甚至要求土地社會化！可是代表大會的實際結果是建立了改良主義者領導的全國農民聯合會，它團結了許多幾年來在尖銳鬥爭中產生的省、地區和區的

① 恩利科·菲利（一八五六——一九二九年）——社會主義者，在一九〇六——一九〇九年領導“整體主義派”——社會黨內的中派。——俄文版編者

联合会和同盟。这个联合会总共团结了拥有十五万会员的七百零四个同盟，其中大多数的会员是农业工人，也有分益佃农和小土地私有者。全国农民联合会的任务只不过是进行宣传和确定总的方针；地方上的联合会和劳动介绍所仍保留着对反抗运动的实际领导。它对领导和开展农村中的工会运动无能为力。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农村中的工会运动进入停顿状态，其原因是由于：雇主抗拒的增长，组织不善，和白色工会的斗争（下文另详述），有些地区一部分最积极于工会运动的劳动人民很多移居到国外去，最后是由于合作社运动的方兴未艾、合作社运动往往被認為不是工人运动的形式之一，而是逐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手段。在有些地区（在这方面较典型的是勒佐—艾米里亚省），合作社活动的基本注意力是放在有利于劳动人民中最享有特权的阶层上，这样只有加速了它和基本群众的脱离。一九〇四年，全国农民联合会实际上变成一个谘询机关。改良主义者充分显示了其十足无能领导农村中的反抗运动。

以后在群众本身的主動发起下，农村劳动人民的斗争开始高涨，而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左派的代表。

二 一九〇四年总罢工和工会中派别的斗争

当改良主义者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摆为自己有时，政府方面正力图实行改良政策。在一九〇〇——一九〇四年的时期中，为了这个目的，曾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关于生产中不幸事故的义务保险（它是一八九八年法律的改进）；关于女工和童工的劳动；关于移民；最后关于成立劳动局和全国劳动会议^②。可是，在这些年代中，喬里齊政策对劳动人民也表示了其反动的一面。

^② 伊凡諾埃·保諾米（一八七三——一九五一年）——改良主义者领袖之一，一九一二年被开除出社会党，随后在法西斯主义时期以前，在多次内閣中担任部长职位；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领导了民族解放委员会，曾担任首相（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后来为上议院主席。——俄文版编者

政府一方面對無產階級中最享有特權的階層讓步和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他們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對最落後的、飽受壓迫的階層，特別是南方各省的農民加緊殘酷的剝削。對這些為爭取比較人道的生存水平而作鬥爭的下層勞動人民的頻繁的發動，政府用暴力來報復。在自由主義歷史家所稱頌的喬里齊的“和平”時代中，槍殺勞動人民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③。這就使改良主義者的活動十分困難，因為這種現象激起了一切勞動人民的憤慨，其中包括一部分特權階層，它使合作政策在黨和工會中不受欢迎。

恩利科·菲利的革命空話當然不能反映工人階級對改良主義領袖們政策的不滿，尤其是這些空話不能給予工人階級以正確政治方針。同樣的，它們也不能滿足意大利南部的農民。而且菲利本人傾向於溫和的立場。一九〇四年四月在波倫亞舉行的社會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他提出了獲得多數票通過的曖昧不清的、“左傾一中派分子”的決議案。領導中央反抗運動書記處的活動家，如卡布里尼和里戈拉等採取了“右傾一中派分子”的立

③ 全國勞動會議是屬於農工商部的一種機構。它成立於一九〇二年，四十三個委員組成，其中一部分是推選的，另一部分是由部長指派。在推選的委員中，有三個是互助會聯合會的代表，三個是合作社聯盟的代表；在部長指派的委員中，七個是勞動人民的代表，由工會組織選拔的候選人名單中挑選出來的。

④ 這就是在短短的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的時期中，警察實行鎮壓的毫無疑問的、不完全的清單：貝拉·弗拉涅柴，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擊斃三人，傷二十三人；卡薩諾·吉列·慕爾齊（巴里），一九〇二年八月五日——擊斃一人，傷四人；岡吉拉（福柴），一九〇二年九月八日——擊斃五人，傷十人；柴倫泰那（拉戈柴），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三日——擊斃二人，傷五十人；畢泰奇阿多（卡姆波巴沙），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擊斃三人，傷三十人；布吉雅拿（巴里），一九〇三年三月十四日——傷八人；卡瑪依奧拉（羅加），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擊斃三人，傷一人；托列·安奴尼西阿泰，一九〇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擊斃七人，傷四十人；契林奧拉，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七日——擊斃三人，傷十四人；胡齊羅（卡爾雅里），一九〇四年九月四日——擊斃三人，傷二十人；卡斯吉留索（托拉巴尼），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四日——擊斃二人，傷十人。

場，因為他們想和以比沙拉齊為首的、公開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擁護者的右派劃清界限，雖然只限於口頭上。可是，這只是不同色彩的機會主義。實質上，社會黨和工會運動的領導繼續執行着改良主義的政策，只是為了掩蓋他們同政府之間的合作，採取了更小心謹慎的政策而已。

波倫亞代表大會上，採取極端左派立場的新思潮的代表們首次出現。這就是反喬里齊、反保皇主義的思潮，它提出了關於準備在必要的情況下使用武力。這個派別的擁護者的活動中心是在米蘭，它的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前衛”也在那裏出版。可是，它的首腦人物却是意大利南部知識分子的代表，例如，阿圖羅·拉布里奧拉^①。起源於法國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開始在他們中間擴大影響，當時法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理論家是喬治·沙列爾。這些意大利知識分子意識到改良主義的站不住腳，於是醉心於沙列爾的思想，即工人階級的基本的戰鬥組織不是黨，而是工會，並認為總罷工應成為推翻資產階級制度的手段。這是以新形式復活的舊無政府主義，而且並沒有什麼更多的內容。葛蘭西談到這個思潮表現了“工人階級對於同資產階級合作政策的本能的、膚淺的和原始的，可是健康的反應，表現了它企圖和農民，首先是南部的農民聯盟。這正是工團主義。而且，這個思潮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意大利南部農民想把無產階級放在他們後面的那種胆怯企圖，而當時代表南部農民的是一羣先進的知識分子。”^②

一九〇四年，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思想尚未滲入到羣衆中去，而且在波倫亞代表大會上自稱為工團主義者的極左派領袖們中

① 阿圖羅·拉布里奧拉（生於一八七三年）——過去曾是社會黨無政府工團主義派的領袖之一，意大利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擁護者；獨立議員（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大西洋公約的反對者，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俄文版編者

② 葛蘭西：“南方問題”，載“復興”雜誌，第二卷，第二號，一九四五年二月版。

間並未得到廣泛的傳播。可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風氣已經到處可以碰到；羣衆自發地力圖使勞動介紹所變成爲政治鬥爭的工具。當發生槍殺勞動者時，往往是勞動介紹所，而不是黨的組織主動發起抗議示威。許多勞動介紹所的領導人採取極左派的立場，或者至少是成爲工會機會主義領導人的敵人。屬於黨的極左派的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們和工會運動戰鬥力最強的組織之間在無意中建立了緊密的聯繫。恰好在这种形勢下，爆發了一九〇四年的九月總罷工。這個總罷工是被薩丁尼島的布齊盧和西西里島的卡斯特留查兩地槍殺了罷工工人所激起來的。在米蘭的工人羣衆大會上，提議要求舉行抗議總罷工。當時由傾心革命分子所領導的米蘭勞動介紹所響應這個號召。效法這個範例的有許多勞動介紹所。但中央反抗運動書記處的改良主義領導者却跟隨在迅速發展爲巨大規模的自發性的羣衆運動的後面。意大利北部一系列的地區在四天內，所有的生活都癱瘓了。在許多城市——米蘭、都靈、熱內亞、波倫亞、巴馬、佛羅倫薩、那不勒斯——罷工是成功的。衝突的事件很少，尤其沒有發生重大的事件。可是資產階級確實嚇壞了。在意大利，還從未發生過如此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而況在同一時期內，這個運動席卷了數目那麼衆多的城市和省份。可是，這次罷工沒有得到重要的政治領導。改良主義者本來就不贊成這次總罷工，因爲這超出了支持工會經濟要求的一般鬥爭範圍，但爲了不喪失他們對羣衆的影響，於是才跟隨在運動的後面。而傾心於革命的領袖們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這種新的鬥爭手段能取得哪些結果。因而無力領導廣泛展開的運動，此外，工會和黨的領導權又都不是在他們的手中。結果幾天以後，罷工運動就消沉了下去，並遺留給羣衆一種失望的情緒。

喬里齊沒有對罷工者使用暴力，可是，爲了其自身的政治目的，他力圖利用資產階級的驚慌失措和力圖削弱社會黨人在議院中的地位。因此，他決定解散下議院和進行新的大選。這個

策略在頗大程度上獲得了成功！社会党人喪失了四個席位，共和党人和急進党人也喪失了一些席位，而喬里齊的多數派則顯著地加強了。此外，大選還標誌着一個新的值得重視的事實：首批由好鬥的天主教徒選出的議員進入了下議院，這些天主教徒是一八七〇年梵蒂岡第一次准許他們在許多地區參加競選和投票選舉天主教的或保守黨的候選人。由此可見，工人運動的增長迫使統治階級把自己的隊伍靠攏起來；不同的階層忘却舊時的嫌隙而接近起來為新的聯盟準備基礎。

相反的，在工人罷工運動的隊伍中，意見分歧却加深了。對喪失議院席位感到沮喪的改良主義者認為是罷工帶來了這個致命的後果，並責難左派輕率的使用危險的鬥爭手段和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增强的責任推在左派的身上。另一方面，左派則責難是改良主義本身的騎牆態度促使罷工的失敗，並責備社会党議員沒有完成他們所負的責任，即沒有努力使下議院通過禁止警察干涉勞動糾紛的法律。一九〇五年一月在熱內亞舉行的勞動介紹所和全國聯合會的第五次聯合大會上，引起這兩個派別激烈的鬥爭。米蘭勞動介紹所提出的而為另外一些勞動介紹所贊成的議案中，要求議院中社会党黨團盡一切力量爭取解除喬里齊的職務並實施在解決勞動和資本之間的衝突時禁止使用武裝力量的法律。這個議案被大多數所否決，但同時通過了另一個決議，其中建議今後遇到槍殺勞動者的情況時將採取總罷工。此外，改良主義者力圖通過關於責成勞動介紹所使它的產業支部向相應的部門聯合會登記以及關於通過反抗運動書記處和勞動介紹所聯合委員會合併的方法來加強前者的決議。

工會組織內部各種派別的鬥爭不但沒有停止，而且在熱內亞大會以後不久，由於鐵路工人的大發動而更為尖銳化。一九〇五年二月，政府提交下議院一項關於將鐵路轉讓給國家經營的法案，社會主義者在原則上贊成這個草案。可是，這個草案禁止鐵路服務人員罷工並且在鐵路服務人員和行政當局之間發生

衝突的情況時實行強制仲裁。鐵路工人工會組織羣起反對這個草案，它們並不向議院中社會黨黨團請求調解，猶如在一九〇二年類似情況下所作的那樣。對社會黨議員感到不滿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屠拉基不止一次地發表反對公用事業企業的工作人員罷工的意見，鐵路工人在過高估計自身力量的推動下，懷着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精神踏上“直接行動”的道路。這個運動在反對政府的迫害措施的鬥爭中，最初以一種搗亂主義的方式出現，即過分地死扣和拘泥形式地執行複雜的鐵路規章中一切條文而使鐵路工作大大地緩慢下來。因此，鐵路工人在議院中和報刊上遭到極為嚴厲的抨擊。社會黨和工會組織沒有展開必要的宣傳來反駁各方面加於繼續頑強鬥爭的鐵路工人的打擊。喬里齊的辭職使他們為之鼓舞。喬里齊本人認為最好不參加解決這樣複雜的事務，於是便把他的職位讓給他的心腹人物——阿列山德羅·福齊斯，並推薦他給國王作為他的繼任人擔任內閣總理的職位。福齊斯再度向下議院提出關於轉讓鐵路給國家的法案，其中取消了禁止罷工的條文，但是加入了一項特別條文，根據這個條文鐵路工人轉變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因而曠職或是企圖阻礙鐵路工作者將立即遭到解僱。於是在四月十六日，當下議院中開始討論這個法案的同一天，鐵路工人宣佈了罷工。可是過了四天，罷工就停止了，因為只有半數鐵路工人停止工作，而中央反抗運動書記處還拒絕了舉行同情總罷工的要求。

顯然的，鐵路工人是犯了錯誤，他們孤立地進行反對政府的艱苦鬥爭。可是，犯錯誤更嚴重的是那些組織，特別是反抗運動書記處，它們沒有表現最起碼的階級同情心。而這個鬥爭是由於公用事業員工的罷工權利這樣一個重大原則性問題而引起的，而且在那時這個鬥爭同轉讓鐵路屬於國家所有這個具有全國意義的問題相關聯的。這個運動的結果，左派和改良主義者之間的意見分歧愈形加深，並引起了中央反抗運動書記處的危機。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反抗運動書記處的一些成員呈請辭職。左

派的代表雖力圖重新建立沒有改良主義者參加的中央反抗運動書記處，可是由於勞動介紹所和聯合會矛盾的尖銳化使它無法工作。

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工會運動的發展遲緩和停頓了。如果在一九〇四年有九十個勞動介紹所，團結了三四〇、二二八個會員，那麼到一九〇六年，只剩下八十二個勞動介紹所，會員的總數減少到三一八、四四六人。

三 總工會的成立。工會改良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

爲了克服瀰漫在工人運動中的混亂狀態，全國五金工人聯合會在一九〇六年二月建議依據法國當時的工會組織的範例成立總工會。這個建議被其他聯合會所接受並爲工會改良主義者所支持，不久以後，左派的代表們也贊成了這個建議。於是在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在米蘭舉行的大會上成立了總工會。在大會上，改良主義者是多數派，而人數衆多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共和黨人是少數派。在原則上，大家同意成立總工會的建議，可是多數派堅決主張一切加入總工會的組織必須執行總工會的決議，而當時少數派則要求就所要通過的決議舉行全體投票。可是，關於全體投票的建議被否決了，於是帶來了分裂：多數派通過了總工會的章程，而少數派則不同意並本着無政府工團主義精神擬定了自己的章程草案。

在米蘭大會上以多數票通過的總工會章程中最重要的一條文如下：

“第一條 在意大利成立總工會，其目的在實現勞動人民的有組織地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體、生產和勞動的鬥爭。

第二條 總工會聯合一切加入全國性產業部門聯合會和地方勞動介紹所的組織。

第三條 總工會的任務是：

(一)對城市和農村的無產階級運動進行總的最高領導，

不問無產階級的政治觀點如何；

(二)對於無產階級大會派到代議機關的無產階級專使提出關於社會改革和相應的行政措施的建議；

(三)支持、指導和配合勞動人民關於立法方面的倡議，並進行廣泛的運動來支持代議機關的無產階級代表所着手採取的行動，其目的在使國家的、省的和區的全局採取勞動羣衆所期待和要求的法律和措施；

(四)在緊密合作和共同行動的基礎上，使反抗運動與合作社聯合會、互助會的行動聯繫起來；

(五)同在政治方面保護勞動人民利益的政黨達成必要的協議，以使勞動和資本之間的任何局部衝突公平合理地得到解決，並使被階級鬥爭尖銳化所激起的任何總的運動可以確定切實可行的目標；

(六)解決不同產業部門組織之間的衝突，並爲了有利於解決爭論，實施固定的程序標準，而這些程序標準經過審查和全體投票通過後在各支部執行；

(七)不屈不撓地、經常不斷地宣傳爲改善經濟狀況而鬥爭，爲提高勞動人民精神上的和智力上的水平而鬥爭；

(八)在部門組織中竭力增加工人階級的全國大團結和國際大團結的意識，在這個基礎上加強部門組織在反抗事業中的聯繫；

(九)編製各種統計報告：關於工會組織的數字和活動，關於罷工，關於沒有組織起來的勞動人民的數目及沒有組織起來的原因，以及關於一旦發生衝突在地方上、地區上和全國範圍內可能產生多大比例的破壞罷工者等等；

(十)採取必要措施監督和促進勞動局在應用和確切遵守社會立法方面的活動；

(十一)在無產階級羣衆中，培養他們善於爲充分實現切身要求的綱領而直接行動或通過代議機關行動，不問其屬於何

种政党和派別。”

最初的總工會章程顯然帶着改良主義的性質。這可從章程第一條中所包含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中得到十分明顯的證明，雖說這種提法是十足抽象的。此外，力圖使總工會對政党和政治運動的關係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這也貫穿在整個章程中。十分明顯，改良主義者要保證自身的安全，生怕社會党的政策有革命性質。雖然他們並不完全拒絕和政党取得協議，但是認為政党應該主要通过議院鬥爭支持總工會。事實上，在以後的年代中，總工會不僅和社會党，而且和共和党和急進黨保持聯繫。

至於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少數派在他們自己的章程草案中，却要求總工會作為“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鬥爭中，在資產階級政府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中擔任無產階級代表”，並“嚴格地和不屈不撓地遵守反抗和階級鬥爭的原則，並且使宣傳具有反軍國主義的、反僧侶主義的和反君主政體的性質。”

這些就是米蘭大會幾天以後，在羅馬舉行的社會党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所維護的立場。他們提出的決議案中說：党的主要任務是“推進工會發展，工會是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而這個組織中的最急進和最自覺的一部分就是社會党”。在決議案中又說：“党的革命活動可通過工會鬥爭的特殊手段來實現，這就是通過總罷工的方法，而追求的目標是從資本家的手中奪取國家政權和將其職能交給工會機構或者個人。”可是，在羅馬的代表大會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仍然是少數派。代表大會的大多數贊成奧狄諾·莫加里^①提出的“整體主義”的決議案，改良主義者在最後也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整體主義”是一種騎牆態度的思潮，它力圖通過既向改良主義者，也向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作部分讓步的方法以維持党的統一。實際上，

^① 奧狄諾·莫加里——社會党内“整體主義者”(中派分子)的領袖之一，後來歸附改良主義者，在法國流亡時亡故。——俄文版編者

這是一種新形式的機會主義，它幫助改良主義者又一次地取得黨的領導權。

於是，改良主義者在總工會中的領導中結實地鞏固起來了，里那多·里戈拉從一九〇七年擔任總工會的總書記，直到一九一八年，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在一九一一年以前，總工會的中央機構設在都靈，後來，遷往米蘭。改良主義仿效德國工會的組織原則建立了相當穩固的集中制的組織，它從各個工會獲得巨額的會費收入。可是，這個組織具有極端官僚主義的特色：它認為友好的協議方法比任何其他方法要好並害怕罷工和稍為激烈的行動，總而言之，力圖指導工會運動走上資產階級合法性的軌道。由此可見，工會的改良主義者雖然使總工會的會員數目得到顯著的增長（從一九〇七年的一九〇、四二二人增加到一九一一年的一三三、七七〇人）和鞏固了它的組織機構，可是他們越來越公開地壓制無產階級羣眾的革命主動性。那時總工會支持了番里齊所實施的政策。

可是，總工會和社會黨之間，特別是在最初的一個時期，存在着一些分歧意見，不僅僅是因為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直到一九〇八年還留在黨內，而且也是因為工會改良主義者的政策和黨內的改良主義者的政策也存在着某些分歧。工會的改良主義充滿行會主義精神，它的出發點首先是為了團結在部門聯合會中的某幾種職業的勞動者的利益，而黨內的改良主義者不得不相當重視未組織起來的羣眾的利益，雖說他們的目的是在爭取選票。黨和工會的相互關係問題不只是意大利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其他國家中更為尖銳，例如，在法國，從法國總工會奠基時（一八九五年）起，它即和政黨斷絕一切關係，並在一九〇六年的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宣佈了它對政黨的獨立性。可是，如果那時在法國總工會中是左派佔優勢，那末在意大利，總工會卻掌握在改良主義者的手中，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則團結在總工會以外。因此，總工會和社會黨之間的分歧意見在那時並不顯著，直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以後才急劇地加深。在大战前的時期中，他們分歧意見的調節是建立在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二——十三日在斯圖加特舉行的第二國際第七屆大會上所通過的關於黨和工會關係的決議的基礎上的。由於這個決議指出工人階級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之間，也就是說社會黨和工會之間有密切聯繫的必要性，因此，它比較它實質上所斥責的工會中立的理論是前進了一步^①。可是，斯圖加特決議的錯誤是在於：它沒有看到政治和經濟鬥爭的差別，它認為，黨和工會的聯繫是二個組織的聯盟，這兩個組織領導着有明確分工範圍的兩種工作，黨應該領導政治鬥爭，而工會則領導經濟鬥爭。如果像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所做的那樣，認為政治鬥爭只是一種在議院中的活動，而工會鬥爭只是保衛某種經濟上的要求，那麼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中，建立在這樣分工上的聯盟可以存在而絲毫不威脅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可是，如果不是在口頭上，而是要在實際上以社會主義的秩序來代替資產階級的秩序，那末正如列寧和斯大林非常明確地指出的：必須有一個對一切其他無產階級組織實行統一領導的組織，而這樣的組織只能是工人階級的政黨。

在意大利，機會主義者在黨內和總工會中同樣都佔着優勢，因之，斯圖加特決議得到極為有利的基地。一九〇七年十月在佛羅倫薩，社會黨和總工會之間訂立了一項特別協定，後來這個協定在摩登納的總工會大會（一九〇八年九月）上被批准，到一九一七年，仍然以斯圖加特決議為基礎，這個協定變成為聯盟公約。由於這個原因，在意大利，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和大战以後的期間，總工會的指導委員會往往和社會黨的領導舉行聯席會議。隨後我們將看到這個關於社會黨和工會之間相互關係的錯誤方針後來帶來了多末嚴重的後果。

在米蘭大會以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並沒有立即就成功地

^① 關於斯圖加特決議的這些問題，參閱：“工會的中立性”，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三卷，第四二二——四三一頁。

建立了自己的集中制的工会組織。一九〇六年，他們在米蘭的勞動介紹所中喪失了領導的地位，可是在次年中，他們已經在一系列的其他勞動介紹所中擴大了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在都靈的勞動介紹所和艾米里亞的一些勞動介紹所中。巴馬的勞動介紹所成爲了他們運動的中心，它联合了其他支持無政府工团主義的一些勞動介紹所和同盟。在巴馬曾經成立了具有全國範圍权力的反抗運動委員會。無政府工团主義者在產業部門联合会中的影响並不突出。只有在一九〇七年，鐵路工人工会曾站到它这方面來。這個運動的基本力量是艾米里亞、杜斯坎尼的幾個區（馬薩和卡拉拉）和馬爾凱區的僱農，这些地方曾特別長久地存在着無政府主義的傳統。無政府主義者大批地補充了和他們連接在共同思想体系上的無政府工团主義的隊伍。儘管無政府工团主義的思想產生於法國，可是，這個派系的意大利領袖和理論家在沙列爾和拉加狄爾影响下，以及他們之間互相保持經常接觸的情況下，無政府工团主義在意大利也找到了基地；这是意大利無產階級廣大階層对社会党和總工会領導的改良主義政策感到深切失望的結果。可是，對於克服改良主義問題，無政府工团主義採取了宗派主義的和过激的方式。無政府工团主義和改良主義一樣都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前者是“左的修正主義”，後者則是“右的修正主義”。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這兩種思潮都是資產階級思想体系对工人運動的影响的結果：

“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不懂得現代工人運動，所以他們經常从一种沒有办法的極端跳到另一种沒有办法的極端。他們時而說一切都是由於有些心懷惡意的人‘嗾使’一個階級反对另一個階級的結果，時而又以工人政党是個‘和平改良党’來妄自安慰。無政府工团主義和改良主義，都是这种資產階級世界觀及其影响的直接產物，因爲這兩種思想都是隨便抓住工人運動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性的觀點發展成爲一种理論，把這個運動中構成工人階級在某一時期或某

種環境中活動上的特點的趨向或特徵宣佈爲互不相容的東西。而實際的生活，實際的歷史本身，却包含有這些各不相同的傾向，好像自然界中的生活和發展過程既包含有緩慢的進化，也包含有迅速的突變，即漸進過程底間斷一樣。

修正主義者認爲所有一切說明‘突變’，說明工人運動與舊社會根本對立的議論，都是一種空話。他們認爲改良就是局部實現社會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排斥‘細小工作’，特別是反對利用國會講台。其實，後一策略就是等候‘偉大日子’到來，而不善於收集那些造成這種偉大事變的力量。前後兩者都阻礙着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即阻礙着把工人團結成爲一個規模巨大，力量堅強，動作靈活，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好好動作的組織，團結成爲充滿階級鬥爭精神，明白認識本身目標，受着真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教育的組織。”^①

絕對不應忘記，無政府工團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運動影響的結果。這樣，就可以發現大部分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鼓吹者和領導者繼續陷入各種錯誤的原因。這個派別的許多意大利領袖們走上了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理論家沙列爾被法西斯主義者認爲是他們的先驅者和鼓舞者，同樣的，拉加狄爾是作爲法西斯維希政府的勞工部長而結束了自己的前途的。

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當意大利爲阻礙工業發展和激起食品價格急劇上漲的嚴重經濟危機所震動時，以及全國到處興起勞動人民的罷工和行動浪潮時，無政府工團主義顯出了它究竟有什麼能力。一九〇七年，工業和農業中的罷工人數曾達到五十七萬五千人。在斐拉拉省爆發了有四萬勞動者參加的大規模的農業工人罷工。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領導着這個罷工以及許多其他的發動。在這些鬥爭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個鬥爭是一九

^① 參閱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蘇聯外國文書局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四四頁。

○八年春季發生在巴馬。四月三十日，巴馬的勞動介紹所宣佈該省的僱農實行罷工抗議僱主破壞上一年度所簽訂的協議。鬥爭一下子變得十分殘酷，因為團結在有勢力的農業協會中的地主們依靠鄰省類似的協會的幫助，募集了大批罷工破壞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允諾“偉大日子”即將來臨的過激宣傳，引起了羣衆中的混亂，並且使僱主陷入極度的驚慌，以致使他們在鬥爭中帶着拚死命的決心。在兩個多月的時間中，意大利全國的注意力被吸引在發生於巴馬省的這個鬥爭上。總工會和社會黨聲明自己同情罷工者，可是，並沒有給予他們實際的援助。此外，罷工中的僱農沒有得到小土地所有者的支持，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對小土地所有者的態度上採取了同樣的政策。在改良主義者控制下廣泛發展着合作社運動的巴馬省的一些地區也沒有給予僱農任何支援。但是罷工者的鬥爭到處喚起了熱烈的同情；艾米里亞和杜斯坎尼等省份的勞動人民長時期的養育罷工者的子女；在意大利募集了將近二十萬里拉，從國外也有援助給罷工者。可是，企業主方面表示了最大限度的團結，他們利用警察保護罷工破壞者和從廄欄中牽走家畜^①。僱農和警察之間的衝突從未停止過，到六月，在一系列的調停企圖失敗以後，在巴馬曾宣佈了總罷工。那時警察就佔領了勞動介紹所的大樓。勞動介紹所的書記、罷工中最傑出的領袖阿爾契斯吉·迪·安勃里沙不得不自城中隱匿起來，而整個奧特勒托林吉市區舉起了起義的旗幟和抵抗警察達三晝夜之久。由於社會黨議員的干涉而使勞動介紹所恢復活動的結果，城市才重新回復安謐；在這以後，農村中的罷工走向下坡，到七月就停止了。

這次罷工遭受到沉重的打擊，而其後果更爲嚴重。它不但

^① 警察遵照大地主的命令從農業工人宣佈罷工的那些畜牧農場把牲畜牽到別的地區去。這就使大地主不致遭到由於罷工者拒絕照料牲畜而蒙受的損失，而拒絕照料牲畜是農業無產階級爲其權利而鬥爭的最有效的方法。——俄文版編者

加强了僱主們的團結和引起了他們方面有組織的回擊，而且也暴露了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領袖們只能煽動羣衆，但在艱苦鬥爭中却無能力在政治上領導羣衆。從那時起，無政府工團主義在意大利開始沒落，而改良主義者又振作起來了。一九〇八年九月在摩登納舉行了總工會的第二次大會，在佛羅倫薩舉行了社會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在總工會大會上決定，只有總工會才能宣佈總罷工。黨的代表大會宣稱：“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和社會黨的原則和方法不相容的”，以及無產階級的鬥爭“應該表現在工人組織的不斷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逐步地奪取政權”；同時，代表大會不主張採取總罷工和在公用事業中採取罷工的手段。爲了對這些決定表示報復，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脫離了社會黨，他們雖沒有成功地建立自己的政黨，但仍舊保持其對某些工會組織的影響。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在波倫亞，這些組織舉行的大會之一，曾代表有十個勞動介紹所、十九個獨立的工會組織和一個鐵路工人工會——總計將近有十五萬會員。到一九一二年才形成了無政府工團主義影響下的全國性中央組織——意大利職工會聯盟。鐵路工人工會沒有併入到這個聯盟中去。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意大利職工會聯盟舉行的米蘭大會曾代表了一〇一、七二九名會員。很明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隊伍是縮小了，可是，就連加入總工會的某些同盟却仍遵循着這種思潮。

儘管社會黨和總工會的改良主義者的政策分別爲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一〇年十月在米蘭）和總工會的第三次大會（一九一一年五月在巴都亞）所批准，總工會和主要的產業部門的聯合會所實行的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曾不斷地激起富有革命情緒的羣衆的憤慨。可是，對改良主義者懦弱的領導感到不滿的勞動人民又陷入到無政府工團主義領袖們的影響之下，但後者越來越顯出他們只是對任何領導都無能爲力的煽動家；從切身經驗體會中確信無政府工團主義是無能的工人，重新又傾

向於改良主義者，迫使後者走上更堅決的行動。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都靈汽車工廠工人的罷工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在這裏享有巨大的威信；它曾從一九〇七年起就領導了地方上的勞動介紹所。汽車工廠的大多數工人是反對那時改良主義者領導的意大利五金工人聯合會所實行的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一九一一年，他們宣告了罷工，這個罷工由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首腦們領導；罷工持續了三個多月，由於拙劣的領導和改良主義者怠工的結果，罷工最後失敗了。在這以後，都靈的大多數工人轉到意大利五金工人聯合會的隊伍中並迫使聯合會採取更堅決的行動。一九一二年，新的罷工宣佈了，它也延續了三個月，最後取得了局部的勝利。這次罷工最值得注意的特點可以說是這次罷工參加者絕無僅有的團結一致以及都靈的熟練工人與從鄰省和南部地區來的較不熟練工人和粗工之間的同心協力。都靈工人階級証明了它本身已經在其隊伍中完全克服了行會主義並有能力成為無產階級較落後階層的領導力量^①。

當時全國正醞釀着重大的政變。可是在談到這個政變以前，必須論及另一形式的工會運動發展——天主教工團主義，它曾和工會改良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同時並存。

四 天主教工團主義

一八九一年，當意大利的工人運動初級階段告終時，羅馬教皇里奧十三發出了闡明教會對社會問題立場的“諸事皆新”（*Rerum novarum*）的敕令。在這個文件中，羅馬教皇重申了教會對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敵對態度，並確定關於“慈悲”天職和階級合作的原則以及勸告天主教徒工人成立自己的組織。那

^① 關於更詳盡的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的都靈罷工，參閱馬·蒙塔尼亞納：“都靈工人回憶錄”，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第二三——二五頁。——俄文版編者

時，在意大利，主要是在倫巴第和維涅托已經存在着許多天主教徒所組織的協會、合作社和農村共濟社。這些組織的活動主要是展開在中等階層的農民中，它們是天主教更廣泛的組織“會議運動”^①的一部分，並受這個運動的第二分部管轄，這個分部的中央局設在貝加摩。儘管這個運動在一八九一——一八九八年獲得廣泛的發展，但它仍繼續保持着互助會和合作社的性質。組織名副其實的天主教工會在開始時進行得相當緩慢，它們的發展因派別中理論上有分歧而受到阻撓，一派是所謂混合聯盟（即中世紀行會型的聯盟）的擁護者，僱主和僱傭工人都可以加入這個聯盟；另一派是所謂純粹聯盟的擁護者，它是由僱傭工人自己所組成。在天主教運動中，當時主要的只包括農村的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可是它的領導却掌握在大資產階級和農村貴族階級的手中。

在一八九八年以後，真正的、後來稱為“白色”的天主教工團主義才在意大利獲得發展。它的產生是和這些年代中意大利無產階級運動總的高漲有關連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和巴達盆地農民羣衆的覺悟有關。鑑於勞動人民階級組織的廣泛發展，天主教首腦們畏懼喪失對羣衆的一切控制，於是在那些很久以來受教會影響比較深的地區開始緊張地組織農民和工人，可是，正因為這樣，被吸引到天主教運動中來的是那些毫無生氣的階層。

天主教工會運動思想上的先驅者是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思潮，這個思潮的理論家和領袖是羅莫洛·慕里^②。在一九〇

① “會議運動”——天主教會政治組織，在教徒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其中包括工會工作），存在於一八七六——一九〇四年，即現今的“天主教行動會”的先驅。——俄文版編者

② 羅莫洛·慕里（一八七〇——一九四四年）——天主教神甫，一八九五年是“基督教民主黨”思潮在天主教徒中間進行工作的組織者，這個思潮是企圖保證天主教會對勞動羣衆的領導，因為在十九世紀末葉羣衆反對現行的制度鬥爭急劇地加強，慕里的活動引起了反動天主教首腦和梵蒂岡的狂怒。在一九〇九年，他被革除教籍。——俄文版編者

○——一九〇三年中，天主教工会獲得了巨大的擴展：許多農民和工人聯盟和同盟出現了，互助會、合作社和農村共濟社的組織網也繼續增長。可是，慕里的擁護者——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和反動的僧侶主義者之間的意見分歧帶來了危機：一九〇四年，梵蒂岡解散了天主教組織“會議運動”，可是這個運動的第二分部（社會經濟部）仍保留着，一九〇六年，這個分部被改組為社會經濟聯盟，這個聯盟團結了工会組織、互助會、合作社和天主教信貸機關。

在這以後，白色工会又重新增長起來：如果一九〇七年，它們是一八三個，那末到一九一〇年已經有三七四個了。同時，首批省的聯合會和兩個全國性的工会——意大利紡織工人工会和全國天主教鐵路工人工会——成立了。一九〇九年，在社會經濟聯盟總部所在地的貝加摩建立了領導和協調整個天主教工会運動的職工會聯盟總書記處。一九一〇年末，白色工会已擁有會員一〇四、六一四人，其中在工業中有六七、四六六人，在農業中有三七、一四八人。在工業中，天主教組織在紡織工人中得到特別廣泛的擴展（有三三、四〇二名會員）；在農業中，它們主要是團結了某些地區（例如，克利蒙納省）的固定工人。農村中受天主教影響的主要是分益佃農、小康農民和中農，實現這個影響，不僅通過工会同盟（聯盟），而且更多的是通過互助會、合作社和農村共濟社。他們正是社會黨人所蔑視的那些農民階層。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和大戰期間，天主教徒順利地建立了小土地所有者聯合會和分益佃農與佃農聯合會。一九一〇年最強大的天主教組織是在倫巴第（五七、八七〇名會員）、維涅托（一八、九五〇名會員）和西西里島（六、三九七名會員）。一九一四年，白色工会擁有會員十一萬四千人。同一九一〇年比較，他們在數量上增加得雖不多，可是，另一方面，它們在組織上鞏固了，並包括了新的其他職業的勞動人民，例如，五金工人、郵電工人和商業部門的職員。

白色工会在一開始就宣傳階級合作的理論和維護这种組織的同業公會性質，它們力圖使勞動人民撇開階級鬥爭，分裂工人階級，從而削弱工人階級反對僱主的鬥爭。因此，企業主通常是鼓勵成立這些較易談判而又比較少採取罷工的白色同盟。順服的白色工会和無產階級戰鬥性組織的同時並存，在事實上是意味着存在有組織的罷工破壞者。可是，有時在羣衆的壓力下，天主教的首腦們不得不和站在階級鬥爭立場的工会領導人物聯合起來行動。在這些情況下，勞動人民的團結一致是自發地產生的，那時，白色工会也得到一定的利益，因為它們把那些被社會主義工会組織者的幼稚的、反僧侶主義的宣傳所嚇跑的羣衆吸引到它們的運動中去了。白色工会對工人運動的危險性和危害性還不僅是在於個別勞動糾紛中他們所採取的那種具體的立場，而更嚴重的是在於天主教運動的政治總路綫。雖說這個運動團結了廣大階層的小資產階級和部分的無產階級，可是領導這個運動的却是大資產階級和農村貴族階級的代表以及梵蒂岡的走狗，梵蒂岡利用天主教組織，內中包括工会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這些年代中，梵蒂岡成爲了巨大的資本主義勢力，它力圖克服過去同意大利自由資產階級之間的分歧意見，並同資產階級締結了旨在反對工人階級的堅固的聯盟。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形勢

在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意大利內部政治形勢發生深刻的轉變的時機成熟了。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喬里齊向下議院提出了社會黨人許久以來所要求的關於普選權的法案。但同時在同年九月，爲了奪取土耳其的里維阿，他向土耳其宣戰。意大利政府和一些資產階級集團在教會的支持下，早就已經逐步準備這個掠奪^①。可是，無產階級羣衆被這個戰爭所激怒，並爲了

^① 如要了解教會在里維阿戰爭中的作用，參閱坎歐洛羅：“意大利天主教的行動”，第四五頁。

表示抗議這個戰爭，要求宣佈總罷工。雖然社會黨和總工會的領導機關宣佈了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並且在各地取得成功，可是戰爭已經成為既成事實。而同時在社會黨內，敵視妥協主義政策的派別增長了。結果在一九一二年七月的勒佐—艾米里亞代表大會上，把支持殖民戰爭的比沙拉齊、保諾米和卡布里尼開除出黨。他們成立了新的社會改良黨。可是，其他的机会主義者認識到羣衆不會跟隨公開的改良主義者，於是仍留在黨內，在這些人中間包括屠拉基和總工會的領導人。在一九一三年（即里維阿戰爭所引起的經濟危機的一年，失業者和大規模的罷工急劇增加的一年），意大利舉行了第一次建立在普選權基礎上的大選。在社會黨不採取妥協主義政策的情況下，“喬里齊建立的和代表的工業集團喪失了它過去的效能，於是喬里齊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用資產階級同代表意大利南部和中部農民羣衆的天主教徒的聯盟代替了資產階級同工人中的特權階層結成的聯盟”^①。依靠“簡蒂洛尼協定”^②的幫助，喬里齊取得了天主教徒的支持。結果在一九一三年的大選中，他在下議院中保持了多數，可是，社會黨人顯著地加強了他們的地位，他們獲得了五十二個席位，過去是四十一席，還不算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獲得的八席和改良黨獲得的十九席。

在新的形勢下，總工會的改良主義者領導的地位也十分不穩定。兩種情況使他們的活動更形困難，並越來越暴露了改良主義是領導勞動人民鬥爭的拙劣方法，這兩種情況就是：僱主更有組織的抗拒和缺乏工會運動的統一。企業主的更為堅決的行動是政府公開敵視工人階級新政策的很自然的後果，同時，也是意大利資產階級成立了全國經濟組織的結果。許多年以來，僱

① 葛蘭西：“南方問題”，載“復興”雜誌，第二卷，第二號，一九四五年二月版。

② “簡蒂洛尼協定”——梵蒂岡的代表簡蒂洛尼伯爵和喬里齊政府之間關於共同反對社會黨候選人的協議，簽訂於一九一三年議院選舉的前夕。

主的抗拒雖說有時帶着殘酷的和頑抗的性質，但通常是分散的或是建立在僱主間地方性協議的基礎上進行的。完全服從於階級鬥爭任務的企業主的經常性經濟組織長久以來是沒有的。一九〇六年在都靈出現了第一個這類的組織，即皮蒙特產業家同盟。不久以後，類似的組織出現在倫巴第。直到一九一〇年才形成了設立在都靈的意大利產業家總會。走上壟斷發展道路的意大利大資本家把這個總會作為他們全國性的機構，他們不但利用它來進行反對工人運動的鬥爭，而且也用來指揮政府實行保證他們利益的政策。尤其不利的是：與企業主的統一組織對抗的是三個互相紛爭的工會組織：總工會（到一九一三年末，會員減少到三十二萬七千人），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意大利職工會聯盟（會員有十萬一千人）和白色工會（會員有十一萬四千人）。此外，還存在着少數不屬於任何上述組織的、獨立的工會同盟和組織。這些組織中，有些組織的活動帶着階級性質（如鐵路工人工會），有些則是一般的民主主義的（如政府機關人員、中等學校教師和初等學校教師等的聯盟）。總共將近有八十万勞動人民包括在這種或那種組織形式中，可見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仍沒參加任何組織。這三種組織中的二個——總工會和意大利職工會聯盟——雖說它們的活動方法各異和領袖們之間存在個人競爭，可是在很多方面它們相互比較接近，往往成羣工人從這個組織轉到另一個組織。至於白色工會，由於它們領導上的反動政策使這些工會事實上變成為資產階級的工具①。

總工會領袖們所實行的妥協主義政策也被另一種情形所困擾——即社會黨內左派地位的加強使總工會和黨之間的關係複雜化。在總工會的第四次大會（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孟都亞）上，曾提出了關於工會統一的問題，這使總工會書記處陷於十分難

① “羅蒂洛尼協定”中條文之一責成天主教徒幫助的自由主義者候選人保證在國家機關中對白色工會和站在階級鬥爭立場的工會代表之間保持同等對待。

堪的地位。从各方面發出的呼声認爲：只有更隨機應變的和更堅決的政策才能將許多屬於無政府工團主義聯盟的勞動人民和未組織起來的廣大羣衆吸引到總工会的隊伍中來。可是，里戈拉和其他改良主義者領袖們巧妙地把討論引到不致於使他們自己受到某種義務的約束。結果，大會通過了一項實質上贊同改良主義策略的決議，其中只有極爲含糊的關於實行更積極政策的諾言。可是，大會的討論中一些新的要求曾被提出，這些要求都反映在會上通過的章程的新條文中，內中說：總工会應該“組織無產階級的反抗，使個別職業的工人爲其自身要求而進行的鬥爭服從於一切勞動人民爲提高生活水平的更廣大利益的共同鬥爭”。大會還通過了另一個關於爭取減少失業者的決議，其中特別是包括要求“撥給必要的資金：在沼澤地帶進行改良土壤的工作；發展農業；藉助於山上的水池來利用水力發電；裝備港口和碼頭；擴大交通網；所有這些工作的實現將是一種促進生產的高漲和減少意大利最大災害之一——失業的有效的方法”。由此可見，早在那時，勞動人民通過自己的強大的工会組織要求採取鼓勵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可惜的是，這個大規模的政策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原因是由於總工会的領袖們幾乎在這方面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同時也由於世界大戰對意大利無產階級提出了更艱鉅和更緊急的任務。

第四章 世界大戰和戰後的革命危機

一 中立時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工會運動

當世界大戰爆發時，在意大利，階級鬥爭正顯著地尖銳化。一九一四年三月，由於沙倫特拉內閣替代了喬里齊而獲得政權後，政府政策的反動性加深了，而當時羣衆的革命力量又能造成起義。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全國被稱爲“紅色週”的運動所籠罩。爲了表示抗議警察槍殺安科納，反軍國主義的遊行示威者曾宣佈了總罷工，而在馬爾凱和羅馬尼約地區，這個總罷工帶有真正起義的性質。可是，由於無產階級的這次行動毫無領導和缺乏配合，結果演變成爲分散的和地方性的騷動，並且很容易地被鎮壓了下去。總工會領袖們只是在羣衆壓力下才宣佈罷工，現在他們竭力使罷工停止，這時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表明了完全無能力在羣衆面前提出明確的政治目標，他們進入到無政府主義進行暴動的範圍，無疑的必然遭到失敗。

當發生對待戰爭的態度時，更明顯地暴露了工人運動中缺乏堅強的政治領導。在最初，所有工人組織——社會黨、總工會和意大利職工會聯盟——都表示反對戰爭。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它們的領導機構在聯席會議上決定：如果意大利參加戰爭，它們即宣佈總罷工。可是，參加反對主要列強的戰爭的思想很快的征服了小資產階級階層：社會改良主義黨和共和黨表示贊成戰爭。在這個時候，墨索里尼轉而加入“干涉派”陣營對意大利職工會聯盟隊伍中的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有極大的影響。其中有幾個（如科里多尼、迪·安勃里斯、羅蘇尼等等）展開了刺耳的戰爭宣傳，從而明明白白地表明他們的“社會主義”是擁護什麼

的。有些地方的工人团体被这些宣傳所欺騙而成爲了战争的擁護者，可是他們只佔無足輕重的少數。在白色工会的領袖中，只有一些較接近羣衆的領袖，例如，米爾奧里^①採取了与社会党人類似的立場，即中立主義的立場；而大多數的領袖則堅持梵蒂岡的總政策：即開始動搖，後來对政府採取調和主義的立場，最後主張參加战争。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是反对战争的，可是遺憾的是沒有任何人組織和領導工人階級積極鬥爭，而當時被上面所支持的各式各樣色彩的一切干涉派团体正進行着猛烈的和固執的宣傳战争。

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九日，当意大利加入战争已經預先決定了，社会党和總工会的領導在波倫亞舉行了联席會議，以便決定在複雜化的情況下应如何行動的問題，可是實際上承認战争是既成的事实。社会党和總工会对战争所採取的立場表現在下述公式中：“不參加但也不怠工”^②。在这一天，只有在都靈，自發地爆發了總罷工，並發生了工人和警察的流血衝突；警察佔領了勞動介紹所並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但在其他的城市中，干涉派的勢力很快佔了優勢。

在大战期間，工会的改良主義者領袖們公開地和当局合作，他們的藉口是应当利用政府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的努力，以便達到增加工資和鬆弛許多軍事企業中所規定的嚴格的監視制度和战時紀律。儘管有一些產業部門的工人的工資是增加了（由於工作日時間的延長和物價上漲，這些增加是完全有名無實的），工人階級对战争的敌視態度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更加深了。爲了緩和工人的不滿，政府進而成立了工業動員委員會和正式承認工廠內部委員會。

① 戈依道·米爾奧里（生於一八八〇年）——法西斯時期前天主教工会運動左派領袖之一，工会統一的擁護者。——俄文版編者

② 關於意大利社会党在战争時期的立場，參閱“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五九頁；第二十三卷，第一六五——一八五頁。

每省都成立了由地方長官、產業家及工会組織三方面代表組成的工業動員委員會，它們的正式任務是提高生產。但實際上，它們是工会改良主義者領袖們所實行的階級合作政策的倡導者。

相反的，由某一企業的工人推選出來的工廠內部委員會則保護着本企業單位工人的利益不受產業家貪求無饜的剝削。由於這些委員會的民主性質和同羣衆的經常聯系，它們在全國迅速地擴展着，並實際上離開了工会而具有獨立性，而工会本身却因為它們領袖們的官僚主義和妥協政策使工人對它們失去了信任。內部委員會，特別是在都靈，很快的獲得了巨大的影響。以後，這些委員會發展成爲工廠職工会議，後者在戰後，在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俄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和以後發生的事件促起了工人運動的新的高漲。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的名字在意大利已經非常受到歡迎，雖然他的學說還很少人知道。一九一七年，在米蘭的人民“五一”節示威遊行和同年八月的都靈暴動，都是工人階級先進階層革命性高漲的證明。一九一八年九月在羅馬召開的社會黨代表大會顯示了反改良主義派的顯著加強。可是，總工会的領導權繼續保留在改良主義者的手中。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里戈拉被調換，替代總工会書記處里戈拉職位的是在過去十年內曾是里戈拉的最接近的助手、擔任過監察秘書的魯多維科·迪·阿拉貢。當然，這次調換沒有能在書記處的政策上引起任何改變。這類人物在全國最強大的工会組織中佔據了領導職位，對意大利工人運動却帶來了不小的損害。

二 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 工農運動和政治領導危機

在戰事結束以後，工農運動以巨大的速度增長着。早在戰前夕就尖銳化了的階級鬥爭具有了特別巨大的規模。在意大利

利,和歐洲大多數國家一樣,資產階級似乎对付不了战争的後果,战争鼓舞了數百万过去不積極參加工人運動的羣衆,並且鍛鍊了無產階級最先進部分的戰鬥精神。

俄國的十月革命在意大利勞動人民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熱情,並成爲戰後意大利革命運動發展的決定性的因素。意大利必須“像俄國一樣地幹”这种思想打入了廣大的羣衆的心。許多人認爲革命臨近了。

一九一九年資產階級驚慌失措的程度,可以从資產階級在工資問題上对勞動人民讓步這個事实判斷出來。这些讓步也推進了工会經濟要求勝利的鬥爭。

隨着罷工運動的巨大高漲,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了工会。總工会會員的數目,在战争中減少到二四九、〇三九人(一九一八年年底),到一九一九年年底却達到了一、一五九、〇六二人,而到一九二〇年年底則增加到二、三二〇、一六三人。意大利職工会聯盟和独立的工会(例如:鐵路工人工会)會員的增加也应計算在內。此外,一九一八年,在人民党成立的同時,意大利勞動人民總會成立了,後者因結了白色工会並宣佈脫離“天主教行動会”的組織。意大利勞動人民總會的會員人數很快的增長着,它的領袖後來是阿基列·葛蘭迪;一九二〇年年底,它差不多擁有了會員一百萬人。由此可見,在一九二〇年,整個說來工会團結了將近三百八十萬勞動人民,這個數字比戰前幾乎增加了四倍之多。

工会組織的發展与其說是由於各產業联合会領導人的活動,不如說是羣衆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自發性運動所造成的,正因爲這樣,羣衆非常願意參加產業部門的工会和勞動介紹所。同時,在這幾年中,工会運動也席卷了工業中以前拒絕參加有組織的鬥爭的職員和技術人員。在各行各業的勞動人民中和全國一切地區,罷工的次數和參加罷工的人數急劇地增長。在一九一九年,罷工的結果一般總是成功的,因爲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進行

堅決的抵抗，雖然仍有尖銳的和時間長久的衝突。

在戰後的時期中，無產階級第一個重要的勝利是確定八小時的工作日，這首先是由五金工人通過談判而達成的（一九一九年二月），而後來其他職業的工人經過一些重大的困難也得到了。過了不久，勞動人民的這個勝利在立法手續上鞏固了下來。大約在這同時，許多產業部門的工人藉談判或者是罷工的結果，他們的工資獲得了提高，可是由於生活費用的急劇上漲，工資的提高完全成爲有名無實。勞動人民了解如果物價繼續瘋狂地上漲，那末他們一切的勝利都將等於零。可是，遺憾的是勞動人民沒有同樣明確地理解到：這種現象的根源是什麼，以及爲了阻止或至少減少它的影響應採取什麼具體措施。黨和工會的領袖不向羣衆解釋這種現象，而且對由於這個原因而造成的錯誤負有責任。他們實際上什麼也不幹，他們既不反對政府縱容投機商人的通貨膨脹政策，也不組織直接反對和財政資本勾結的投機商人的鬥爭。結果，在一九一九年春季，全國掀起了主要是反對商人的自發性示威遊行的浪潮。許多食品商店和貨棧都被搗毀。曾經有過這樣的情況，有時商店主人向勞動介紹所請求保護並將自己貨棧的鑰匙交給它們。政府和市政當局曾被迫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反對不斷上漲的物價，可是它們的效果都是微不足道的，因爲它們並未接觸到物價高漲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見，反對生活費用高漲的運動並未得到一點重要的結果。

那時，同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甚至沒有提出過（從對店主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可是，工人自發地在企業中對待工程技術人員的關係上實行了這種聯盟。工程技術人員在加入總工會的隊伍以後，開始爲改善物質生活條件而鬥爭。產業家估計工人不會支援這些行動，認爲在最熟練的工人中間可以網羅一批罷工破壞者，這樣並可在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之間種下深刻的仇恨，在這樣的考慮下，於是產業主採取了不妥協的立場。可是，儘管產業主採取了同盟歇業的手段，工人仍拒絕被利用。結果，

罷工者的要求如願以償。

農民當時和工人階級一起奮起鬥爭。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在意大利南部和拉齊奧區發生了多次農民發動的事件，那些農民曾經是前方的戰士，他們佔用了未開墾的或是耕種不良的土地^①。在巴達盆地以及後來在阿布里，首先站起來鬥爭的是僱農，他們要求地主必須規定每一公頃土地僱傭勞動力的數目。在戰前時期，這個要求已經提出並由於鬥爭的結果已經部分的被滿足，現在在擁有許多僱農羣衆的不少省份中已經實行了。按照這些原則規定了在一定的土地單位面積上所應僱傭的最低限度的勞動力人數，大地主在和農民同盟簽訂合同時應遵守這個制度。同時，僱農和固定農業工人力求實現其他的要求：如提高工資，實行四十八小時工作週等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分益佃農也成功地爭取到使用土地的更有利的條件。合作社的運動也具有很大的規模。

白色工會和合作社在分益佃農、佃農和小農民中間獲得了特別廣泛的擴展，主要是在維涅托、倫巴第和艾米里亞等地區以及意大利中部地區。在下倫巴第，白色工會和合作社除席捲上述那些農民以外，還吸收了大批的固定農業工人。儘管團結艾米里亞、杜斯坎尼和烏姆布利亞等地區極大部分僱農的農民聯合會加入了總工會，農民聯合會仍然是代表僱農和固定農業工人利益的組織。那個時期，白色工會和站在階級鬥爭立場上的工會之間進行了無情的鬥爭，這個鬥爭削弱了整個運動並便利了法西斯取得政權。可是，在白色工會的會員中間出現了和其他勞動人民組織取得協議的意圖。這個傾向的最徹底的表達者是克利蒙納省的農民領袖、人民黨左翼代表、議院議員米爾奧里，但是這種傾向受到人民黨領導和在政治上控制白色工會的（天主教行動會）組織方面的嚴重反對。社會黨和總工會的領袖

^① 關於這個運動參閱卡洛曉羅：“意大利土地的佔有”，載“社會文化”，一九五〇年羅馬版，第二七——四二頁。

都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支持這種意圖，以便即使不是同白色工會行動一致起來，至少也同白色工會結成聯盟。關於同天主教勞動者聯盟的問題，曾在一九二一年首次認真地由共產黨人提出，可是在實際上這個聯盟是一直到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才開始實現的。

工會組織在農村中的活動大大地複雜化，不僅是由於同白色工會鬥爭，而且也由於農民聯合會如何在如何向農民進行工作這個問題上提法不正確所造成的。這個組織不僅使僱農和固定農業工人的利益與一切其他階層農村勞動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而且还提出土地社會化作為基本任務。這個政策不能得到意大利南部數目特別眾多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的擁護，當時他們要求的是重新分配屬於大地主的土地。由於意大利南部和拉齊奧地區的佔用土地運動沒有得到總工會和社會黨方面的認真的支持，因之，這個運動在取得一些初步勝利以後，走向沒落，並且在法西斯反動派在意大利北部展開進攻以前停止了活動。除了阿布里仍舊保留着強大的僱農組織以外，其餘各地都是這樣。

缺少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其他階層聯盟的政策是由於社會黨和總工會的政治領導有缺點。在戰後的時期中，社會黨內形成了三種派別：首先是包括少數人，但掌握着工會、產業部門聯合會、合作社同盟、社會黨佔優勢的大部分市政委員會以及議院中的社會黨黨團領導權的改良主義派；其次是以塞拉第為首的最高綱領主義派，後來又稱為“統一共產主義派”，而事實上是中派，在它的手中掌握着社會黨和“前進報”編輯部的領導權；最後是保爾狄加領導的棄權主義—共產主義者，他們之所以這樣稱呼自己，是因為他們鼓吹拒絕參加議院選舉鬥爭，他們依靠的是許多派別，他們得到社會主義青年聯合會的支持。可是，這三派中的任何一派都沒有能力領導羣衆運動。改良主義者想盡一切方法避免革命並斷言革命在意大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力圖使每一次行動的性質只是為了爭取某些工會的要求，從而

妨碍羣衆運動；自称为革命者的最高綱領主義者也表现了完全没有能力認真地領導運動；他們維護改良主義者，並且不採取任何措施將改良主義者排除出總工会和部門联合会的領導；最後，棄權主義—共產主義者被自身的極端主義和宗派主義所束縛。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十月在波倫亞）上，大多數的代表贊成最高綱領主義者的綱領和鼓掌歡迎關於党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但即使在这个大会以後，局面仍沒有變化。波倫亞大会議決“爲了以自己的活動幫助更完滿地實現上述原則（即最高綱領主義原則），將与站在階級鬥爭基礎上的工会組織締結協議”。實際上，總工会的領導还是一點也沒有改變它的政策，当總工会和社会党之間有意見分歧（这个時期常常發生）時，在党的領導機關中的最高綱領主義派領袖即在總工会的領袖面前屈服。这就爲意大利工人階級和整個人民運動遭受嚴重的失敗作了準備。

三 爭取建立工廠委員會運動。葛蘭西和“新秩序”

除了上述三種派別以外，存在於意大利工人運動中的同時還有另一個派別，雖然在當時它的擴展並不廣泛，可是它却給予了意大利今後的歷史進程以決定性的影响，因爲它的代表在建立共產党的問題上採取了正確的立場。安東尼奧·葛蘭西和帕爾米羅·陶里亞蒂以及他們指導的依靠各地工廠委員會運動的称为“新秩序”的都靈小組領導了這個派別。早在一九一〇——一九一二年的罷工和以後的一九一七年八月暴動的時候，都靈的工人即表現出自己是意大利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他們找到了能運用新的觀點提出意大利革命問題的安東尼奧·葛蘭西作他們的領袖。在大戰以前和戰爭的年代中，葛蘭西早就考慮到意大利工人階級如何能在改造意大利社會運動中執行它的領導作用。在努力探求答案的過程中，他注意到在企業中進行階級鬥爭的那些組織形式。十月革命和蘇維埃俄國的經驗在葛蘭西

的見解上給予了深刻的影響，並幫助他確定了革命鬥爭的目標和方法，而它們是和宗派主義的棄權主義者的“革命性”毫無共同之點的。陶里亞蒂在敘述這幾年中葛蘭西思想方法和活動的發展時說：

“對企業中工人階級組織形式和階級鬥爭擁有深奧知識的葛蘭西，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的問題和建立新型工人組織的問題直接地聯繫了起來，這個新型工人組織將體現工人奪取政權的鬥爭並將能成為無產階級國家的基礎。”

他問：“在意大利是否存在任何能同蘇維埃相比的工人階級組織形式或者是否存在着在其真正的本質上同蘇維埃相類似的組織？我們是不是有任何這樣的組織使我有權這樣說：對的，蘇維埃不僅僅是俄國的制度，這也是各地都適用的制度；對的，蘇維埃就是一種表現工人階級解放意志的組織，工人階級不論在哪裏都為工業擺脫資本家控制而鬥爭；對的，蘇維埃就是工人階級的自治形式。在意大利，在都靈是否有成立蘇維埃這種管理形式的萌芽或者脆弱的企圖呢？”

他回答說：“是的，在意大利，在都靈有着工人的管理形式的萌芽，即蘇維埃的萌芽——這個萌芽就是工廠內部委員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工廠內部委員會是在工會發起為保障工人利益、反對企業主的鬥爭中產生的。不久，在擺脫工會直接控制後，它們發展成為獨立的機構，它們被全體工人推選出來並代表所有工人羣衆。戰後危機所造成的國內局勢使工人階級必須為奪取政權而建立必要條件，這個局勢加速了這個過程。在工廠內部委員會運動的基礎上，在都靈產生了為建立工廠委員會的運動，這個蘇維埃式的運動在生產方面直接威脅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政權。葛蘭西是工廠委員會運動的領袖。他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創辦了這個運動的機關報“新秩序”。

在社會黨老領袖中很少有人懂得爭取建立工廠委員會運

動的意義。葛蘭西被加上了工團主義的罪名，因為他力圖使工人的注意力不集中在議院的論爭中，而集中在生產問題上和企業的實際生活中。可是，實際上，葛蘭西的一切論爭都正是針對工團主義，目的是要證明：部門聯合會不是工人們利用來為奪取政權和為建立自己的國家的鬥爭中的機構。他們指責他，好像他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把工廠委員會問題變成了中心的問題，因而規避關於黨和黨的領導作用問題。而實際上，葛蘭西早從一九一七年起已經很清楚地了解：改良主義者、中派分子和浮淺的煽動家控制下的意大利社會黨是沒有能力領導無產階級的奪取政權的鬥爭的。同時，他懂得戰後的局勢不能再將奪取政權的鬥爭擱置在一邊，要不然就將為最黑暗的反動派開闢道路。

“必須迅速行動起來。對葛蘭西來說，速度問題是基本問題。不能把奪取政權的鬥爭擱置在一邊，而去從事組織新的革命政黨；必須在同一時候，既解決關於黨的問題——這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對一切運動的政治領導問題，又解決關於能擔負起奪取政權任務的、工人和勞動人民的那種組織形式的問題。戰後革命危機時期中羣眾熱情高漲，以致可能在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葛蘭西本人在以後曾承認他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時期中的有些方案是不够明確的，可是這些方案的實質在於：工廠委員會的建立必須和新的政治組織網，即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和發展聯繫起來，這些小組要能在領導工廠委員會運動的同時，從根本上改革社會黨，使它的機構、它的方法、它的日常工作和政治路線革命化。工廠委員會的發展一定會使工人階級在國內得到領導權和使無產階級與革命分子在社會黨內取得優勢。可惜的是，這個優勢只在都靈一個地方獲得了實現。

在葛蘭西直接影響所及的都靈和其他中心地、工廠委員會運動以飛躍的速度發展着。改良主義者被逐出工會的領導，中派分子從黨支部的領導中被趕走。鬥爭已經越出某些產業部門

的勞動人民爲提高自己工資而鬥爭的範圍，已經越出選舉鬥爭的範圍。”①

工廠委員會的成立引起工會組織機構上的巨大變化。在每個企業中，一切工人按車間選舉出會議的成員，這些成員被稱爲車間委員，每個工廠委員會不僅推選工廠內部委員會，而且還處理有關同行職業工人的利益和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的問題。工廠委員會對工會的機構和性質的影響表現在：過去的指導委員會是由工會會員全體會議選舉出來的，會上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團結在其所屬聯盟的少數勞動者（這統統造成了工會的領導機關和它的一切活動的官僚主義化），而現在指導委員會是在相應的生產部門的全工廠工人會議大會上選舉出來的。

馬里奧·蒙塔尼亞納指出：“由此可見，工廠委員會不僅在工廠中，而且也在工會中執行着工人代表機關的主要任務，後來甚至間接地在各省最重要的工會組織——勞動介紹所中也執行着工人代表機關的主要任務。

爲了不准無組織的工人直接參加工會領導人的選舉，工廠工人會議的章程說明只有參加組織的工人才能被選爲車間委員。

但是，儘管改良主義者預言，由於工廠委員會給予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享有權利，似乎將會促使工會運動的崩潰。但工廠委員會的產生給予工人進入工會以巨大的推動力，因此，在短短的時間內，在工會中團結了絕大多數的工人，其中五金工人幾乎無例外地都加入了工會。”②

產業家懂得工廠委員會運動威脅着他們，並試圖在一九二〇年四月窒死這個運動。那時，爲保衛工廠委員會，都靈五金工

① 參閱陶里亞蒂：“葛蘭西”，“團結”出版社，羅馬一九四九年出版，第三七—四〇頁。

② 馬·蒙塔尼亞納：“都靈工人回憶錄”，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第一〇三頁。

人首先實行罷工，以後都靈和整個都靈省舉行了十一天的總罷工。這次罷工，按照葛蘭西和陶里亞蒂的說法是“意大利無產階級在戰後的最大規模的運動”——這個時期工人運動的頂點。都靈勞動人民在那時表現了團結和戰鬥精神，尤其重要的是罷工本身的宣佈不是為保障經濟上的要求，而是保衛工人階級政治鬥爭工具的組織不受敵對階級的進攻。可是，正当都靈的產業家受到全意大利的同業者支持時，都靈的工人又一次地幾乎處在孤立中，只有鄰省的農業工人宣佈同情的罷工。葛蘭西建議在全國組織同情運動，可是社會黨和總工會的領袖們拒絕給予任何支持。鬥爭到了一定的階段，總工會的改良主義者領袖出來干預了，可是，正如魯多維科·迪·阿拉貢嘲笑地說，只不過是為了“埋葬死在胎中的嬰孩”，這就是說為了窒死由於他們的背叛行為而陷入絕境的罷工。雖說如此，產業家並未得到完全的和決定性的勝利，罷工以後，工廠委員會和工廠內部委員會繼續存在，只是它們的權限被削減了。

這次罷工的演變證明了有必要改組社會黨。正在那時，一九二〇年五月，在“新秩序”小組的建議下，意大利社會黨都靈支部（這個支部早已稱為意大利社會黨都靈共產主義者支部）通過了一項名為“爭取革新社會黨”的文件，這個文件在實質上是一個建立共產黨的計劃，即建立一個能真正領導意大利工人和農民鬥爭的黨。由葛蘭西起草和發表在“新秩序”上的這個文件中說：

“在意大利經歷的階級鬥爭的現階段中，隨着而來的將是：或者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便過渡到可以使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新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或者是有產階級和統治集團反動派瘋狂地猖獗起來。那時將從暴力的軍火庫中拿出一切手段，迫使工業和農業無產階級進行奴隸的勞動；那時將用盡一切手段，來殘酷地摧毀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社會黨）並且把經濟組織（工會和合作社）納入資產階級國家的體系內。”^①

一九二〇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列寧根據這個文件聲稱：在意大利只有“新秩序”小組站在正確的道路上，並號召社會黨召開非常代表大會討論文件中所包含的建議。關於黨對工會的關係，這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提出的“二十一個條件”的第九點中談到：“凡願意隸屬於共產國際的每一個黨，都必須在職工會、合作社及其他羣衆性的工人組織裏面有系統地和頑強地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在這些工會裏面，必須成立共產主義的支部，這種支部應該以長期的和頑強的工作，奪取職工會，到擁護共產主義事業的這方面來。”^②

這種態度同“新秩序”小組提出的完全一致。可是，塞拉第和社會黨領導中的其他中派分子對這方面不採取任何措施，他們沒有力爭把改良主義者從工會的中央領導機構驅逐出去，雖然不僅在大會上而且在大會以後，列寧曾不止一次地批評改良主義者執拗地不願把機會主義分子從黨內清洗出去，批評他們畏懼新人在領導上的沒有經驗將會使工會組織蒙受損害。

列寧說：“塞拉第害怕破壞職工會、合作社和市政，他害怕新人沒有能力和犯錯誤。

共產主義者害怕改良主義者對革命怠工。”^③

四 從佔領企業到共產黨的成立

在佔領企業的時期中，改良主義者對革命的怠工和中派分子的無能充分地暴露出來了。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七日，在向企業主提出由於生活費用高漲要求增加工資的談判失敗以後，意大利五金工人聯合會決定在企業中開始故意破壞以表示抗議的運動。企業主們在這個運動席捲全國以前採取了同盟歇業的辦

① “意大利共產黨三十年的經歷和鬥爭”，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四六頁。

② 參閱“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六冊，第二八〇頁。

③ 同上書，第三三七頁。

法，那時，全國五金工人聯合會發出了在全國佔領冶金工業企業的指示。工人以空前的熱情響應這個指示：他們深信今後資本家的腳將再也不會跨進工廠的大門，而且佔領企業將是奪取政權的開端。因此，曾決定繼續工作（這樣，就使得他們必須佔領和冶金工業有關係的許多其他企業）和準備防衛。在工廠中找到的殘缺不全的武器被修整好了，並立刻製造新的武器。如果政府在這個時候採取武力，那末就會遇到頑強的反抗。

可是，當時的內閣總理喬里齊並打算採取武力。他了解與其採取武力而可能惹起不可制服的革命爆發，不如利用總工會領袖的妥協政策，以便藉他們的幫助把運動推入到純粹是工會糾紛的範圍。改良主義者甚至在這一次也不拒絕和資產階級合作。

由於羣衆廣泛的奮起和情緒高昂，這個運動越出了原先推動它的要求的範圍。重新把它推入到爭取工資的工會鬥爭，意味着它必將遭受失敗。而正如葛蘭西所指出的，失敗就將不可避免地為最野蠻的反動派開拓道路。但是為了取得勝利必須迅速把已經展開的運動轉變到為奪取政權的鬥爭。在企業中領導工人鬥爭的工廠委員會堅持這種意見，絕大多數的工人也這樣考慮。可是，社會黨的領導沒有能力實現為達到這個目的所必需的行動。它甚至不能迫使領導總工會的改良主義者接受它的觀點，這可以在九月十日到十一日所舉行的總工會指導委員會會議上討論這些問題中獲得證明。全國五金工人聯合會的書記處在第一次會議上宣佈，考慮到運動的規模，沒有總工會的許可，它將不簽訂任何協議。那時，社會黨的代表要求將運動的領導權轉交給黨，以便使黨和總工會一起行動並使運動具有政治和革命的性質。總工會全國理事會宣稱，它不打算對運動的結果負責，因為它認為國內的形勢不能有助於革命鬥爭的成功。

改良主義者首腦們巧妙地使用手段並宣稱，在承認運動的政治性質而不是工會性質的情況下，他們準備躲在一旁，將領導

鬥爭的一切責任推給社会党。但同時，他們聲明，如果能將這次行動引導到純粹是工会鬥爭的軌道上，則將受到歡迎，並且建議向企業主和政府要求實施“工人監督工業生產”。在長時間的和緊張的辯論以及五金工人聯合會的領導者力圖調和相反的觀點失敗以後，問題被提出表決。反映改良主義者立場的阿拉貢的提案為大多數票通過。社会党領導中的最高綱領主義者在總工会首腦們的狡猾的手腕下投降了。意大利工人階級對前者的錯誤和後者的背叛行為將不得不付出極高的代價。

以後進入與產業家和政府談判，總工会和五金工人聯合會爭取：（一）增加一切五金工人的每天工資到四里拉，這就是說，高工資的工人增加百分之十到十二，較不熟練的工人增加百分之二十；（二）政府允諾在最短期間內向議院提出“工人監督工業生產”的法案；（三）產業家保證不使用迫害手段反對工人。

資產階級鬆了一口氣，改良主義者鼓吹工人獲得提高工資的勝利，可是社会党的“前進報”在九月二十一日悲痛地承認：“……如果從政治方面來看問題，顯然的，這不僅是五金工人的勝利，而且也是喬伐尼·喬里齊的勝利。監督本身就是一種合作。如果認真地執行監督，那就不可避免的使工人變成爲僱主的有利關係的助手。資產階級享受着烤肉，而無產階級所得到的却只是烤肉的香味而已。”其實，任何監督，不論是認真的抑或是表面的，都沒有實行，喬里齊任命的按平等原則組成的法案起草委員會不久即停止工作，因爲工人和企業主之間的意見有分歧。於是，總工会要求社会党在議院中的黨團向議院提出法案審核，可是事態的發展妨礙了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至於迫害手段，雖然並沒有立刻採取，但是不久以後，大家知道，這些迫害曾達到怎樣駭人聽聞的規模。

列寧對佔領企業時期中總工会領導人的立場所作的評價是值得注意的。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批評了塞拉第在十月十四日給“人道報”的信中的錯誤立場，他說：

“塞拉第在我前面已經提到的‘人道報’上所登載的一封信裏面，附帶地寫道：

‘……至於說到最近的事變，那末，必須知道，“全國勞動總同盟”（意大利職工會中央理事會）領導者提議把運動之領導權交給那些願意把這種運動擴展到革命的人們。我們在全國勞動總同盟內的同志們，曾經聲明：假如過激分子願意擔負起義之領導，那末，他們同意做一個遵守紀律的兵士。但是，過激分子却沒有接受領導運動。……’

塞拉第如果相信‘全國勞動總同盟’中的改良主義者底這種聲明是可以兌現的，那他就太天真了。實際上，這是对革命怠工的變種之一：在最緊急的關頭以辭職相威脅。在這裏，問題完全不在於忠誠，而在於領導者如果在事變底每一困難的轉變關頭便在‘自己人’中間、在首腦中間、在‘領袖’中間遇到動搖、躊躇、辭職，那在革命中就不能得到勝利了。”^①

當法西斯匪徒已經在艾米里亞和巴達盆地等地區進攻時，社會黨內的分裂徹底的成熟了。十月十日，以屠拉基、布拉姆保里尼和阿拉貢為首的改良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者集中派”在勒佐—艾米里亞召集了會議，會議吸收了議院黨團以及工會和合作社的改良主義者領導們參加；他們統一了自身的力量和肯定了他們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中派分子在黨的領導中已經毫無威信，他們甚至缺乏勇氣根據忠實於第三國際原則的共產黨人的要求，開除改良主義者。一九二一年一月，在里窩那代表大會上發生了中派分子和共產黨人之間的分裂，因為前者不願意和機會主義派別決裂，於是後者退出了代表大會。

一九二一年一月意大利共產黨的成立是意大利工人運動歷史上的重大事件^②。在共產黨成立的初期，它在工會中沒有很大的威信，可是，這件大事的後果對意大利工人運動史具有決定

^① “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六冊，第三四五頁。

性的意義，这在以後再談。意大利共產黨成立的年月，正当國內反動派展開進攻，以後造成法西斯獨裁恐怖的時期。

② 關於世界大戰後社會黨內的鬥爭和共產黨的建立以及它的初期，參閱“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七——四八、九一——九七、一七五、二一二、二二六、二二八——二三一、二五七、三五——三六八；第三十二卷，第四三八——四五三頁。

第五章 反法西斯主義鬥爭時期

一 自由工会的消滅

一九二一年二月末，總工會第五次大會在里窩那舉行。這次大會本應在很早以前就召開的，可是總工會的領導者估計到那時預料中的社會黨內的分裂，於是蓄意拖延召開這次大會。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社會黨領導和總工會指導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就曾認為有必要召開無產階級的各种政治的和經濟的組織的大會，以便通過“關於為達成最高綱領主義目標的可能性和鬥爭方法”的決議，這些目標是社會黨領導所提出的。可是，總工會的首腦們在必須先知道大會的意見的藉口下，拒絕更改自己的政策，並在二年多的時間內拖延召開大會。由此可見，改良主義者利用了中派分子的動搖不定，逃避了在羣衆革命運動最高漲的時期召開大會。但是在社會黨分裂以後，他們立即召開大會，以便可以利用許多工會工作人員的手足無措，來保持他們在工會中的地位並以一切手段反對共產黨人在工會中的活動，以及繼續執行他們的妥協政策。

里窩那的大會已表明共產黨人在工人羣衆中享有不小的威信。他們的議案獲得了五十萬票，對社會黨領導支持的改良主義者的決議投贊成票的有一百二十萬票。五十萬票應該說是極為巨大的數字，如果考慮到工會中革命的派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從下面自發地增長起來的，而且當時改良主義者又掌握了工會組織的領導權。從共產黨成立的時候起，反對共產黨人在工會中的威信的鬥爭成為了總工會領導者主要的關心的問題。

里窩那大會以後，總工會領導者所堅持的關於總工會國際

联系问题的政策特别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早在一九二〇年，他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极为模稜两可的；在同年六月，他們在莫斯科同苏联工会签订了成立对抗阿姆斯特丹工会國際的新工会國際的協定，但是他們却出席了阿姆斯特丹工会國際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倫敦舉行的大會。在里窩那大會上，曾通過併入赤色工会國際和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國際斷絕關係的決議。可是，在以後的幾個月中，總工會的首腦們繼續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國際保持密切联系，而在一九二〇年六月派遣參加莫斯科赤色工会國際第一次大會的代表團却只有純粹情報性質的權力。在赤色工会國際第一次大會上展開的關於意大利工会立場問題的討論過程中，代表總工會的改良主義者為同時參加二個工会國際的論調辯護，不言而喻，這個論調被否決了。此後，不顧工會會員的意見，總工會領導者在事實上同赤色工会國際斷絕一切關係，而只留在阿姆斯特丹工会國際中，並參加後者一九二二年在羅馬舉行的一次定期大會。忠實於工会統一原則和斥責這些行動的共產黨人仍留在總工會內，並運用一切力量以便鞏固總工會和領導它走上保衛無產階級利益的更堅決鬥爭的道路，而這在當時是越來越困難了。

實際上，國內的政治形勢一天比一天更為複雜；從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起，法西斯轉入到決定性的進攻，而在这以前，他們的行動僅只帶有偶然的性質。為警察和政府當局所支持的、受大地主與產業家所津貼的法西斯黨徒，最初在艾米里亞的農村地區和城市活動，以後，從一九二一年初起，也在杜斯坎尼以及維涅托、倫巴第和皮蒙特等地區的農村中活動。大批的毆打、殺戮、放火和搶劫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接踵發生。社會黨、勞動介紹所、工会和工人同盟的會所是法西斯恐怖手段的主要對象。規模越來越大的反動派的瘋狂暴行首先是無例外的攻擊一切工人和農民的組織。一九二一年春，法西斯匪徒在大工業中心用武裝反對工人組織。企業主在大工業中心為法西斯匪徒的

活動造成有利的條件，即廣泛實施解僱以指望造成羣衆性的失業。解僱首先是在最有組織的部門的工人中實行，例如，五金工人。當時五金工人工會採取的是防衛性質的鬥爭。在工人階級其他的最有戰鬥力的團體中也出現了疲弱和厭煩的跡象。這就使法西斯匪徒易於在工業中心組織襲擊和大屠殺，而在半年以前——在佔領企業時期，他們是不敢冒險採取這些手段的。

勞動人民對法西斯匪徒顯示了英勇的反抗，可是他們沒有很好地組織起來，他們的行動往往帶着地方性的和散漫的性質，而當時法西斯分子却得到警察的支持並從當局取得武器。

共產黨人不止一次地號召發起反法西斯分子的總反攻，可是，一切都是枉然，因為中派分子和改良主義者只限於抗議和號召，以保持平靜。一九二一年八月三日，由社會黨議院黨團發起，並在取得總工會指導委員會完全同意下，社會黨同法西斯分子簽訂了“和解公約”^①，這就更加破壞了它的威信，因為在公約簽訂以後，過了一些時候，法西斯恐怖手段更為猖獗。總工會的首腦們完全忽視羣衆要求消滅有計劃地蹂躪工人組織的意志，他們畏懼共產黨人在羣衆中威望的增長，於是執拗地拒絕反對法西斯分子。他們同改良主義者一起更加甘心公開地和政府合作。當保諾米和法克塔政府執政時，甚至有風聲談到右派社會黨分子^②可能參加政府。改良主義者幻想如果他們參加到政府中去，那末對工會方面的公開合作感到滿意的資產階級會自行遏止法西斯主義的進攻，或者最低限度可引導它只反對共產黨人。

① “和解公約”是一九二一年墨索里尼與社會黨、改良主義的工會和一些其他組織所簽訂的關於放棄暴力形式的政治鬥爭的協定。事實上，它解除了無產階級的武裝，加強了法西斯主義者的有利地位，並促進法西斯主義的掌握政權。——俄文版編者

② 詳情參閱“意大利共產黨三十年的經歷和鬥爭”，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第五四——五五頁。——俄文版編者

由此可見，在工人階級最艱苦的時候，改良主義者指望分裂工人階級的隊伍以挽救其自身和總工會整個的官僚主義機構。他們不了解，策動法西斯恐怖手段的那一部分反動資產階級對他們的妥協主義的立場已經不感興趣，這種立場只能鼓勵這部分資產階級繼續他們的政策，這個政策就是粉碎不分任何政治傾向的工人階級組織。另一方面，為總工會領導人所支持的改良主義者的妥協策略引起社會黨領導內部的最高綱領主義者的反對。這一切產生了黨內的鬥爭和糾紛，正當羣衆要求對法西斯主義的進攻組織強有力的和同心協力的反擊的時候，這些鬥爭和糾紛是十分有害的。最高綱領主義者的不懂得工人階級在鬥爭中團結的必要性在鐵路工人工會大會上明顯地暴露了出來，最高綱領主義者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一起在會上投票反對共產黨建議的關於鐵路工人工會加入總工會的提案。

成立一個團結一切工會組織為自由而鬥爭的勞動協會正是鐵路工人工會所建議的。勞動協會會正式成立，並得到工人政黨的支持。這是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向無產階級力量的統一邁進一大步。可是，勞動協會却成為一個軟弱無能的和缺乏主動性的組織，這主要是由於總工會領袖們始終拒絕採取堅決行動的政策。當時，羣衆的反抗行動大為增加，一九二二年七月在皮蒙特和倫巴第發生了反法西斯總罷工。在長久的猶豫不決以後，勞動協會最後決定八月一日在全意大利宣佈總罷工。這個決定的採取完全出乎意外，當時既沒有進行相應的準備工作，而且勞動協會領導者正在力圖制止幾天以前開始的另外一些羣衆行動。同意這個決定是因為總工會領導者企圖藉助於所謂“合法的”罷工對當時發生的政府危機的結果發生影響，他們企圖阻撓成立極右派的政府，因為這將剝奪他們實現妥協計劃的可能性。因此，在法克塔爾組成其最後一次內閣時，改良主義者即滿足了新政府的要求，換句話說，在第三天即迫使勞動協會接受停止罷工的決定。可是，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不願改良主

義者的議院的陰謀，積極參加罷工，並對這次同樣受警察支持的法西斯匪徒的猛烈攻擊表示了堅決有力的反抗。在這次鬥爭的過程中，勞動人民表現了真正的英雄主義，例如：在巴馬，共產黨人古依多·畢切利（後來死在西班牙）領導下的工人曾迫使法西斯分子竄逃而去。可是經過幾天的流血戰鬥以後，罷工因失去統一領導而被法西斯匪徒和警察鎮壓了下去。

勞動協會瓦解以後，社會黨內部的妥協主義的傾向愈益加強了，而總工會領導越來越服從於工會對政治鬥爭採取“中立”原則的態度。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初羅馬舉行的社會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發生了新的分裂，改良主義者被開除出黨，並且他們成立了自己的統一社會黨。儘管總工會正式聲明放棄同政黨的一切聯盟，可是在事實上，它仍奉行着統一社會黨的路綫。但是不久，“進軍羅馬”^①摧毀了改良主義者參加政府的最後希望。

當時，最初的法西斯工會組織已經產生，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出身的人在它們成立的時候起了不小的作用。從一成立起，這個派別具有反國際主義的和沙文主義的傾向。早在戰爭時期，在里維阿，有些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曾轉而加入了國民黨。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意大利職工會聯盟的許多領導者同墨索里尼一起呼籲意大利參加戰爭。這類事實的產生是因為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運動的影響的結果；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領袖們一般都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隊伍的人。他們是革命空談的愛好者，而且並不理解階級鬥爭的真正意義，他們是吹牛家和幻想家，其中更有不少是煽動家和冒險家。在一九一八年，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作為擁護參加戰爭者被趕出了意大利職工會聯盟，他們組織了民族主義工會同盟——意大利勞動同盟。

① “進軍羅馬”——是墨索里尼所扮演的法西斯隊伍向羅馬進軍的把戲，它受到要求成立法西斯政府的意大利產業家總會、軍隊高級將領、皇朝和梵蒂岡的支持。皇帝拒絕宣佈羅馬戒嚴，並推薦墨索里尼擔任政府首腦的職位。——俄文版編者

這個人數極少的組織利用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舊口號從事於瘋狂的煽動性宣傳，目的是在爭取某些工人團體。於是，在贊成阿努齊奧^①的“遠征”阜姆的同時，它在一九二〇年支持佔領企業運動並要求根據企業主的指導成立工人合作社。這個時期，沙文主義的傾向也出現在其他工會組織中，如朱列齊領導的海員聯合會也支持阿努齊奧侵犯阜姆的冒險行為。一九二二年，法西斯黨建立了全國同盟工會總會，使這些工會從屬於自己影響之下並把它們攬為己有。可是，只有在進軍羅馬以後，這個法西斯組織才獲得它的活動的場所。

在法西斯統治的最初幾年（一九二六年以前），一切工會組織在法律上被宣佈為平等的和自由的，但是事實上，法西斯黨徒和政府當局想盡一切方法阻撓那些站在階級鬥爭立場的工會的活動以及白色工會的活動。首先他們企圖瓦解站在階級鬥爭立場的工會中的一切內部民主形式，為的是使它們變成和法西斯組織毫無差別。法西斯分子在總工會改良主義者領袖們中間找到很滿意的助手，因為這些領袖們千方百計地使總工會和隸屬於它的組織帶有官僚主義的和盲目服從的性質。在由羣衆選出的共產黨人領導的工會中，總工會領導者常常派遣委員去更換他們。而這些委員不認識工會的普通會員，但却能順從地執行總工會書記處要求工會組織對法西斯分子遵守“中立”態度的指示。於是，共產黨人多年來所領導的都靈的勞動介紹所和地方五金工人工會，在一九二四年被置於總工會的委員管轄之下。藉助於這些方法，改良主義者成功地保持它在總工會中的領導地位。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米蘭舉行的最後一次總工會大會上（這時總工會會員人數已減少到二十六萬九千人），改良主義者

① 加勃里埃列·阿努齊奧（一八六三——一九三八年）——著名的作家，意大利帝國主義的思想家，贊成意大利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成為公開的法西斯主義擁護者。在一九一九年領導了帝國主義侵略阜姆的冒險行動，這是以後意大利併吞阜姆的開端。——俄文版編者

比共產黨人佔優勢，並迫使工會以盲目服從的精神修改總工會的章程。

不顧法西斯殘酷的恐怖行爲和總工會領袖們的背叛行爲，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共產黨人在工會中的威信顯著地增長着。在這些年代中，一部分共產黨人獲得了三個全國聯合會（木材工業工人、旅館和飯館服務人員以及私人企業職員）的領導權。共產黨人在工會中的成功一方面是和馬契奧齊^①被殺害後工人運動的高漲有關，而另一方面，是由於在一九二四年初，葛蘭西回到意大利以後，共產黨實行了更積極和更大膽的政策。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六年之間的時期中，保爾狄加宗派主義^②的清算使共產黨在羣衆中的工作活躍起來和擴大了。

陶里亞蒂回憶說：“新的政策不但活躍了黨的工作，而且也推動了工人階級。工人階級鬥爭新的時期開始了，雖然時間很短暫，可是關係重大，因為它標誌着共產黨人威信的增長，雖然面對着來自社會民主黨人方面的無情的反對和來自法西斯匪徒方面的迫害。我們的黨所享有的威望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獲得的。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經驗教訓是：都靈共產黨人對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作出一個政策上正確的提法，單這一點是不足以保證他們在革命運動中的領導作用的。這個時候，葛蘭西關懷的是：爲了要擴大黨的影響，不僅應藉助於提出符合羣衆要求的正確的口號，而且要藉助於在各種不同的政治團體中進

① 柴柯莫·馬契奧齊（一八八五——一九二四年）——社會黨黨員。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被殺死。這個殺害激起了反對法西斯政府的抗議運動，並使墨索里尼政權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脅。——俄文版編者

② 阿曼傑奧·保爾狄加——鑽到黨的隊伍中來的共產黨敵人，後來變成爲托洛茨基分子。一九二四——一九三〇年他在意大利共產黨內進行了同“保爾狄加分子”的鬥爭。詳細情形參閱“意大利共產黨三十年的經歷和鬥爭”，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三七——一四四、二六二——二七五頁。——俄文版編者

行系統的工作，利用在勞動人民中的影響，特別是在農村中的影響，在這些地方，鼓勵那些依靠同工人階級聯盟的各種反對派別……在這個時期中，開始努力使天主教工會和參加總工會的工會接近起來，並促使天主教農民組織中的左派分子接受工人階級同農民聯盟的革命原則。”^①

天主教工會的有聲望的活動家和國會議員米奧利轉而加入農民聯合會的隊伍中來，就是這個接近天主教組織政策的結果之一。共產黨人方面成立了一個團結不少小土地所有者團體的農民保障協會，這個協會獨立於農民聯合會之外，並且是按地區的原則而組成的。接着，意大利南方貧農協會也建立起來了。同時，共產黨人加強了他們在工業中心的工作，以便從改良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方面奪取陣地。一九二五年冬，在都靈的企業中改選工廠內部委員會時，共產黨人向改良主義者建議提出共同的反法西斯的聯合候選人名單，可是遭到了拒絕，於是雙方分別提出名單。在選舉中，共產黨人幾乎在一切企業中獲得了多數票，不但超過了獲得極少票數的法西斯分子，而且也勝過改良主義者。這個勝利表明了法西斯取得政權兩年以後，都靈工人的真實心情是怎樣的。在這方面，另一個有意義的事件是一九二五年三月，皮蒙特、倫巴第和里古利亞五金工人的罷工。罷工是由布里西亞的企業中的法西斯工會發起的，這個工會不滿意產業家對它所表示的軟弱無力的支持，於是指望通過罷工獲得工人的同情。於是意大利五金工人聯合會立刻宣佈總罷工，工廠的工作完全停頓了下來。法西斯分子感到無限的驚訝和惶恐，他們沒有預料到工人還能顯示這樣的團結和戰鬥力。可是，總工會和五金工人聯合會的領導者又一次地幫助了法西斯分子，號召罷工者恢復工作。改良主義領袖們這個新的背叛行為使工人對他們完全失去了一切信任。在法西斯統治時期最後一

^① 陶里亞蒂：“葛蘭西”，第四九頁。

次的合法的工会行動發生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它已經不是受總工会的領導，而是受企業的工廠內部委員會的領導，後者通過同僱主直接談判來爭取提高工資，同時拒絕了總工会委任的由都靈五金工人工会選派的總工会委員的調解^①。

幾個月以後，法西斯分子對工会運動給予了嚴重的打擊。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意大利產業家總會和全國同盟工会總會簽訂了所謂“維多尼宮公約”^②的協議，其中承認只有法西斯的工会有權代表工人的利益並指令取消工廠內部委員會。為了更為完滿起見，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出現了關於“勞動關係的法律準則”的羅科（司法部長）法案，這個法案廢除了罷工的权利並設立勞資糾紛特別法庭（仲裁）。法西斯工会並因此而成了國家的機關。最後，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除了法西斯的政黨以外，一切政黨皆被禁止。由此可見，葛蘭西的預言應驗了。他曾說過：“將用盡一切手段，來殘酷地摧毀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社會黨），並且把經濟組織（工会和合作社）納入資產階級國家的體系內。”

可是在整個一九二六年中，總工会仍繼續存在着，因為羅科法案，雖然只承認法西斯工会組織才在法律上有權代表勞動人民，但不排除法西斯以外的其他工会組織存在的可能性。一九二六年一月，勃魯諾·布奧齊^③成為總工会總書記。在殘酷的反動時期中，隨着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波倫亞圖謀暗刺

① 關於合法工会鬥爭的最近事件，參閱蒙塔尼亞納：“都靈工人會議”，第一卷，第二七四——二七九頁（蒙塔尼亞納：“都靈工人會議”，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第二二五——二二七頁）。

② “維多尼宮公約”的名稱是因在羅馬簽約的地點而得來的。——俄文版編者。

③ 勃魯諾·布奧齊（一八八一——一九四四年）——社會黨人，著名的工会活動家，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六年擔任全國五金工人聯合會書記，法西斯分子當權後即流亡到法國去，一九四四年被希特勒匪徒槍殺。——俄文版編者

墨索里尼事件以後，總工會會所曾被搗毀和徵用。可是過了三個星期，法西斯分子將其恢復原狀並聲稱總工會未解散。法西斯分子認為總工會有名無實地存在一個時間会更好些，因為它曾加入了法西斯工會代表頗難混入的日內瓦的國際勞動局。法西斯分子估計總工會將會自行消滅，而到那時候再攫取它的遺產將會比較簡單些。這個變動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發生，當時在最後一任總書記巴齊斯塔·馬奧涅的主動建議下（布奧齊在這以前不久已流亡到法國去了），指導委員會宣佈了“自動解散”總工會。

二月二日，一批著名的工會的改良主義者領袖，其中有里戈拉、阿拉貢、馬奧涅、阿齊蒙吉，聲明承認法西斯勝利為既成事實，並表示準備和法西斯合作。他們被允許組成全國勞動問題研究會，這個研究會出版的刊物鼓吹法西斯的公會主義，並印行關於意大利工人運動歷史的紀事書籍。這個研究會的綱領宣言中曾說道：“我們將會自相矛盾，如果我們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所力圖實現的公會式國家或是‘勞動憲章’^①。只要一提我們過去所發表的願望和方案，就可以明白我們的職責就是通過自身的活動和批評來幫助成功地完成這個實驗。”社會改良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之間這種深厚的親密關係是不需要更多的令人信服的證據的，也未必可能有比這更赤裸裸地暴露了改良主義者的背叛行為。可是，工會改良主義者的可恥的結局並不是自由工會運動在意大利的結束。在這些日子中，獻身於無產階級事業的新的、更年輕和更堅強的力量舉起了自由工會運動的旗幟，並進入到艱鉅的地下反法西斯鬥爭的道路，它的結果是意大利勞動人民建立了新的、更強有力的反抗組織。

二 地下工會的鬥爭

共產黨人負起倡導的責任，恢復了為改良主義者所出賣的總工會以進行地下工作。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日，在米蘭舉行

了秘密的工会大会，会上擬定了新總工会的組織上和綱領上的原則。除了共產黨人所領導的三個工人联合会（木材工業工人、私人企業職員以及旅館和飯館服務人員）的領導者以外，大会还接受許多其他联合会（五金工人、紡織工人、印刷工人、建築工人、化学和食品工業工人、運輸工人）的工会活動家以及許多勞動介紹所的代表參加。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一起參加了這個大会。大会所通过的宣言，不但提出了一系列勞動人民必須爭取的刻不容緩的要求，而且指出了總目標——為爭取从法西斯主義下解放出來而鬥爭。

在一九二七年中，這個新組織顯著地擴大了自己的聯繫和展開了積極的活動：總工会地下機關報“工会戰鬥報”和其他宣傳刊物在勞動人民中間廣泛地傳佈着。儘管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公佈的法西斯“勞動憲章”在各方面受到許多公會主義的辯護者的稱頌和全國勞動問題研究會的改良主義者的讚揚，可是，絕大多數的工人意識到這一切都純粹是個騙局，並和過去一樣地迴避法西斯工團主義者。工人們了解企業主將利用自由工会的瓦解以便轉而進攻勞動人民的經濟果实。而事實上，一九二七年第一次減低工資百分之二十。在這種情況下，地下總工会才能組織一系列的規模頗大的發動，其中有米蘭企業中的工人罷工，西西里硫黃礦井工人的發動以及特別重要的維切利區種稻農場僱農的罷工，這個罷工有幾千個農民參加並獲得了局部的勝利。總工会的男女積極分子曾在種稻農場的僱農中間展開了大胆的和真正的宣傳工作並散發地下報紙“稻子”，此後，共產黨人和總工会也从未停止過這項宣傳工作。此外，在一九二八年的最初幾個月中，還曾組織了波登諾奈紡織工人的大罷工。

可是，這些成功付出了極高的代價。羣衆組織做地下工作

① “勞動憲章”宣佈於一九二七年，它代表了大吹大擂的法西斯主義的“勞動”煽動宣傳。事實上，它取締了勞動人民一切權利和批准將工会包括在法西斯國家官僚主義體系中。——俄文版編者

的條件極端困難，即連非法工作本身在進行中也並不是常常保險的。許多早已爲警察所監視的工會活動分子被逮捕了。在一九二八年中，法西斯非常法庭審判共產黨人的案件接踵而起，並在審判結束時，宣告殘酷的判決。地下工會鬥爭逐漸被削弱，那時，勞動人民的地位也同時越來越惡化了；一九二九年又實行了減低工資百分之十。

可是，任何警察恐怖手段都不能摧毀共產黨人鬥爭的意志，而只能是迫使他們改進鬥爭的方法，使之更適合於當時的情勢。一九二九年七月，在法國舉行了地下總工會第二次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二十個來自意大利的代表。大會詳盡地討論了國內政治和經濟的形勢。這次討論指出：不願嚴密的警察控制，不願拉吉倫協定^①和由於用十足官僚主義方法而達成的法西斯工會會員人數表面上的增長，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精神在工人和農民羣衆中並未消失，而且由於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所引起的勞動人民經濟狀況的惡化，這種戰鬥精神更加强了。大會並進一步擬定了一系列的具體任務，這些任務在以後動員羣衆的事業中起了極重大的作用。大會還通過了關於總工會國際聯繫問題的決議。在總工會重新恢復以後，它的領導就曾爭取過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承認新組織作爲舊總工會的合法的繼承者（大家知道，舊總工會是爲改良主義者領袖們不願工會一般會員的反对所解散的），可是遭到了拒絕。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的領袖藉口布奧齊和一批流亡的改良主義者宣佈在巴黎重新恢復總工會，而拒絕考慮這個問題，然而，布奧齊的總工會是和意大利的地下工會運動沒有任何聯繫的。大會清算了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領袖們的這種敵對立場，宣佈和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完全決裂（這早在一九二一年里窩那大會曾經建議過），並聲明加入赤

^① 這個協定簽訂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它是梵蒂岡和墨索里尼政府之間所締結的，目的在確定意大利天主教會的权利和其在政府中的地位。實質上，這個協定是形成教皇和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聯盟。——俄文版編者

色工会國際。这件事發生在一九三〇年，那時總工会第三次大会在苏黎世舉行，会上曾派遣代表出席赤色工会國際第五次世界大会並參加後者的工作。

最後，一九二九年的大会还提出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即關於利用合法的可能性問題，也就是說在法西斯工会內部的工作問題，共產黨人葛蘭西从監獄的來信中曾注意到這個問題^①。那時候，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已經被強制地登記加入法西斯工会。可是，对真正的工会甚至是一种諷刺，法西斯工会被迫和羣衆維持一定的联系，並允許下級組織召開定期的會議和在大企業中保存車間委員。因此，从這裏產生了在法西斯工会內部進行某些工作的可能性：向工会領導，並通过它向僱主和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組織羣衆爲当前的要求而鬥爭，但須考慮到逐漸地吸引這些羣衆到反对整個法西斯國家迫害機構的越來越廣泛的鬥爭中來。当然這項工作並不是輕而易舉的，這不僅是由於法西斯分子的阻撓，而且也是由於許多在意大利工作的共產黨人和反法西斯的勞動人民在最初存在着放棄一切關於在法西斯工会內部工作的思想。此外，困难還在於進行這項工作要避免走到机会主義立場上去。陶里亞蒂的兩篇發表在“工人狀況”雜誌上的文章曾談到這個問題。在其中的第一篇，他寫道：“我想談到的合法工作的可能性，与其說是包含在法西斯的‘法律制度’內，不如說包含在法西斯主義原有的一些特徵中，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經常渴望建立自身的階級基礎以及它有時所採用的社會性的煽動宣傳。”^② 在結論中，陶里亞蒂指出在法西斯工会內部的宣傳只有在這些情況下才能生效；它具有簡單明瞭的

① “在一九二九年，他請求傳達給我們：‘請注意法西斯工会中工廠的全權代表運動’。他再一次地竭力要我們注意在法西斯羣衆組織中工作的重要性。”陶里亞蒂：“葛蘭西”，第五四頁。

② 陶里亞蒂：“在非法狀態下的工会和工會活動”，載“工人狀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號（署名：愛可里）。

性質，這項工作能有系統地大規模進行，它在任何時候都不忘却這個鬥爭的最終目的是無產階級的公開發動。第二篇文章在重新論証了這些理論以後，陶里亞蒂對那些認為這種主張是機會主義的人提出批評：“那些認為我們想改變我們對法西斯工會的看法的人是大大地錯了，法西斯工會是反動的組織，它是企業主和政府手中的剝削和鎮壓工人的工具……問題在於尋找瓦解它們的更好的和更切实可行的方法。”①

任務是在於利用法西斯主義易被攻破的方面——即它对煽動宣傳的癖好，而這是它在現代工人運動巨大規模的情況下所被迫採用的。與以往的反動政權不同的是法西斯主義不能完全取消工會。維多里奧在當時寫道：“工會在歷史上已經是‘不可廢除’的了。在我們時代中最殘忍的反動政權已經不能只採取高壓的政策來對付工人階級。他們被迫在恐怖行為以外加上煽動宣傳。因此，他們不能沒有自己的工會（和其他羣眾組織），並違反了他們自己的意願被迫允許這些組織保有某些職權，以便在羣眾中造成幻想，好像羣眾還能藉助這些組織保衛自身的迫切利益。”②

在整個堅決不屈的鬥爭時期中，共產黨人一直遵循着這些關於在法西斯工會中工作的方針，直到法西斯主義崩潰。關於非法鬥爭的組織問題也曾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因為，在地下的條件下，存在羣眾性的組織是站不住的，於是建立了一批骨幹的工會積極分子小組。這些小組的任務是：同城市和鄉村勞動羣眾維持經常的聯繫，注意研究他們的需要，提出適合於各個鬥爭階段的任務的口號，散佈非法工會和黨的書報。由於提高了警惕性和改進了地下工作的方法，被逮捕的人數與一九二

① 陶里亞蒂：“再論非法狀態下的工會活動”，載“工人狀況”，一九三二年一月號（署名：愛可里）。

② 維多里奧：“意大利地下工會運動的經驗”，載“工人狀況”，一九三三年四月號。

七——一九二九年比較起來是顯著地減少了，可是這個鬥爭仍包括很多的困難和危險，並使共產黨人遭受到巨大的犧牲。可是，儘管如此，共產黨人恢復了被警察摧毀的組織，保持了同羣衆的聯繫，組織他們不僅爲改善生活水平而鬥爭，而且爲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總的政治目標而鬥爭。

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中，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國內經濟情況普遍惡化，勞動人民反對失業和降低工資的鬥爭重新又抬頭了。一九三一年六月，又一次爆發了維切利種稻農場僱農的大規模的反對減低工資的三天罷工，它在結束時得到了局部的勝利。在一九三二年，米蘭的五金工人以不止一次的罷工阻止了工資的降低。在整個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中，在阿布里發生了大規模失業工人的騷動，隨着許多地方舉行了遊行示威。在一九三三年還發生了拉斯畢齊的五金工人的大罷工，在貝拉、都靈和其他城市也騷擾不安。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中，在國內重要的企業中展開了反對實行以“貝多制”爲名的血汗制的運動。它所激起工人強烈不滿的程度曾使法西斯工會也被迫要求取消這個制度，爭取取消這個制度的鬥爭曾遇到無數的困難，但最後是工人勝利了。

領導勞動人民這些行動的照例是共產黨人和地下總工會，他們善於走在勞動人民自發性的反抗的前面。此外，在各地，那裏有可能，那裏的鬥爭就通過合法途徑進行。法西斯工會被迫越來越經常舉行會議，會上，工人公開地傾吐自己的怨言和提出要求。勞動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使法西斯分子陷入困難的境地。他們一方面力圖使公會制度更加官僚主義化，這是在一九三三年通過按工業部門組成公會的方法而達成的；另一方面，他們被迫在一定的範圍內對勞動人民讓步。於是，在一九三四年，由於修改工會的章程，局部的對較不重要的職位恢復了選舉原則。

那些有系統地恢復的煽動性的陰謀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利

用來作為加深羣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的。共產黨人密切注視法西斯分子工會政策的搖擺，並且通過自己的報刊經常喚起勞動人民的警惕和揭露法西斯的煽動宣傳，但是同時指出勞動者在工會中建立合法工作的可能性。

在對埃塞俄比亞戰爭和西班牙內戰時期中，共產黨人沒有停止過工會工作，並緊密地將它和反對戰爭的宣傳聯繫起來。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中，由於物價普遍高漲，工會主要進行了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接着，騷動、停止工作和全國許多工廠的短期罷工又出現了，積極分子又在工會中發言迫使法西斯工會採取行動。結果成功地爭取到一些附加工資。在一九三四年，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之間簽訂了關於在工會中統一行動的協議以後，同時也展開了爭取統一所有反法西斯的和人民的力量鬥爭。在一九三五年，總工會開始與布奧齊領導的巴黎的總工會談判關於統一行動，在一九三六年地下的總工會同它在一起擬定了宣告工會統一原則的文件；可是，這個宣言在當時僅僅是原則性的，而並無實際的意義，因此巴黎的總工會幾乎並未在意大利進行任何工作，但這曾是向未來的真正的工會統一前進了一大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全國成長着新的反法西斯力量時，共產黨人使自己的政治的和工會的活動顯著地活躍起來。他們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最後帶來了果實。一九四三年三月，共產黨人許多年以來所組織的和領導的工人反法西斯鬥爭演變成爲一個強大的羣衆運動，並造成一系列互相有聯繫的、由都靈大企業中開端的大規模的罷工，以後立刻蔓延到整個意大利北部。這個巨大的運動以及後來的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德國佔領期間的鬥爭至今還活在一切人們的記憶中。一九四三年的運動是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起義的第一階段，它對以後造成法西斯覆滅的事件給予了決定性的影響。這個羣衆行動加速了以墨索里尼爲中心的反動集團的崩潰，並間接地準備了七月二十五日

事件^①，雖然三月罷工是經濟原因所引起的（僱主拒絕付給撤退補助金），它立即採取了更廣泛的性質。意大利最重要的企業（即共產黨人經常在那裏進行強有力的組織和鼓動工作的企業）的五萬工人一致起來投入鬥爭，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資本家。資本家曾扶持法西斯主義執政和支持它二十年。意大利歷史中的新的時期以及意大利工會運動史的新時期已經開始了。

^①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法西斯政府垮台和墨索里尼被捕的日子，這是由於英美軍隊在意大利南部登陸後，一部分法西斯巨頭和國王維克多·愛麥奴伊爾第三串通的結果。——俄文版編者

第六章 从法西斯主義的崩潰到意大利 總工会佛羅倫薩大会

一 意大利北部的罷工和羅馬協約

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後不久，巴多洛^①政府从法西斯時期前的工会運動活動家中任命特派員臨時領導从前的法西斯工会团体。爲了協調这些特派員的活動，曾成立了工会联合委员会，由勃魯諾·布奧齊担任主席，这是走向確立工会統一道路的第一步。可是，九月八日事件^②毀滅了一切關於有可能利用法西斯遺留下來的工会組織系統以成立民主的工会組織的幻想。自由的統一工会運動只能在反对德國佔領者及其意大利同謀者的鬥爭过程中，以新的組織形式恢復起來。

一切職業和一切政治派別的廣大勞動羣衆都認識到必須統一行動。人們還清楚地記得法西斯主義曾利用白色工会和站在階級鬥爭立場的工会之間的鬥爭來摧毀工人階級的自由組織，这些印象深刻的回憶，增強了在反法西斯鬥爭中連結起來的人民力量的團結一致。站在解放祖國鬥爭前列的是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一九四三年在都靈、米蘭和熱內亞的十一月罷工

① 皮特魯·巴多洛(生於一八七一年)——保皇黨人，法西斯侵略埃塞俄比亞時期的意大利軍隊的總司令，在推翻墨索里尼以後在政府中居領導地位。——俄文版編者

②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意大利宣佈投降，同聯軍和在英美軍艦保護下逃往南部的巴多洛政府之間簽訂休戰的日子。這個政府存在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同時，墨索里尼政府在希特勒軍隊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佔領下的意大利北部、中部和一部分南部地區宣佈了傀儡的“社會共和國”。——俄文版編者

的特點是它的參加者十分團結一致。“在這些罷工的時候，刻不容緩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和停止戰爭的口號結合着。為了保衛自身的權利，勞動人民力圖首先給予仇恨最深的敵人以打擊，對它的野心和橫暴予以反擊。工人的階級鬥爭極明顯地帶有民族的和愛國的性質。”^①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由行動委員會領導的新的罷工浪潮席捲了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工業中心，這些行動委員會是在工廠中成立的，並聯合了工人、職員以及技術人員。一九四四年三月，整個意大利北部和一部分中部地區籠罩着政治總罷工。除了工業中的工人和職員以外，還有公用事業企業的勞動人民參加了這次罷工。同時，游擊隊在各地襲擊敵人。這是戰爭時期在德國佔領下的西歐國家中最大的羣衆運動之一。

當工會統一在意大利北部的解放鬥爭熔爐中受到鍛鍊時，在德國人佔領的羅馬，共產黨、社會黨和基督教民主黨三個主要工會派別的領袖之間進行了談判。這些談判的參加者聚會的目的是在於奠定羣衆性的統一的工會組織的基礎，他們處在搜捕他們的法西斯警察和黨衛軍逮捕和迫害的不斷的威脅之下。可是，他們頑強地繼續自己的工作直到達成協議。社會黨人勃魯諾·布奧齊、共產黨人朱塞佩·迪·維多里奧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阿基列·葛蘭迪是這次協議的主要創造者。布奧齊未能看到他一生致力的共同事業的完成。他落到德國人的手中後，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當德國人從羅馬撤退時，被槍殺於斯多爾泰地方。

在羅馬解放前夕的前一天，維多里奧代表共產黨，阿基列·葛蘭迪代表基督教民主黨和厄米利奧·卡涅伐里^②代表社會黨簽訂了著名的稱爲羅馬協約的工會統一宣言。在這個奠定新的

① 薩哥：“解放戰爭末期的工人”，載“團結報”，一九五〇年三月七日。

② 厄米利奧·卡涅伐里——社會黨人，後來轉入到右派社會主義分裂者的隊伍中去和加入了社會民主黨。——俄文版編者

統一工会組織基礎的文件中談到：

“在意大利工会運動中三個主要派別（共產黨、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黨）的代表，對已經從德國佔領者及其法西斯同謀者解放出來的意大利的那些地區的工会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以後，深信一切勞動者（不問他們的政治見解和宗教信仰）的工会統一，是鞏固他們的組織的最有效的方法，因為這樣就能保證最好地保衛他們的利益，並使勞動人民自己有可能對偉大的復興祖國的事業作出貢獻，在這個事業中，無疑的，勞動人民將起決定性的作用。為此我們一致同意下列各點：

（一）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全意大利建立一個稱為意大利總工会的工会聯盟；每個生產部門只建立一個統一的全國性聯合會；每省只建立一個統一的勞動介紹所；每個生產部門或是每一種職業在本地或是本省只建立一個工会；以上述辦法實現工会的統一。

（二）一切有關總工会的總綱領、它的最後的組織結構和章程草案的擬定的問題暫作懸案（這些問題必須在更廣泛的一切派別的工会積極分子會同已存在於意大利南部的自由工会運動領袖一起參加下決定），在下述總的原則的基礎上立即實現工会統一：

（甲）意大利總工会是根據最廣泛的內部民主原則建成的，因此，工会中一切環節的一切領導職位必須通過自下而上的選舉補充之，即根據地方工会的全体大會的決議補充之，或是由按規定的程序選舉出來的代表大會的決議補充之。在各級領導機關中，必須按比例保證少數派的代表席位。

（乙）在意大利總工会的一切機關中必須保證一切會員有表示意見的完全自由，並必須保證彼此尊重任何政治見解和宗教信仰。

（丙）意大利總工会脫離一切政黨而具有獨立性；但是當它認為適當的時候，即當某些黨派的行動無論是在保障和擴大民

主自由問題上，無論是在保障勞動人民一定的利益和全國的利益上都體現了勞動羣衆的利益的時侯，它將支持這些民主政黨的行動。”

此外，在羅馬協約中指明：總工會的臨時領導機關和聯合會與勞動介紹所的領導機關必須按三個派別代表均等的原則組成，但是，在某些省份中和某些職業中有其他派系者，則並不排除他們的代表參加。最後，協約中指出了工會工作中一些刻不容緩的任務。在羅馬解放以後，按照協約的條款立即任命了意大利總工會的三個總書記——朱塞佩·迪·維多里奧，阿基列·葛蘭迪和奧雷斯特·利薩德里^①。羅馬協約中宣佈的原則：統一，內部民主，脫離政黨而獨立，參加保衛勞動人民自由和利益的政治鬥爭的權利等，後來在總工會的章程中被確認了下來，這些原則奠定了它的一切活動的基礎。後來發生的分裂陰謀正是指向反對這些原則的，雖則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包括未來的分裂分子在內的人們都承認了這一切。

當成立統一工會的談判正在羅馬進行的時侯，在意大利南部解放了的省份中，儘管有個別分裂分子的陰謀，自由工會運動還是復興了。在阿布里，工會運動是在統一的基礎上展開的，而在那不勒斯按照“行動黨”^②一些活動家的倡議却產生了其中沒有基督教民主黨派的代表參加的總工會。在羅馬解放以後，阿布里工會組織立即併入意大利總工會，而分裂派的那不勒斯總工會不久就瓦解了，因為勞動介紹所，還有附屬於它的省的工會都併入了意大利總工會。在羅馬解放兩個月以後，工會的統一

① 奧雷斯特·利薩德里——意大利社會黨領導人之一，現在担任意大利總工會書記。——俄文版編者

② “行動黨”——急進的、小資產階級政黨，成立於一九四三年，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曾積極地參加民族解放運動。戰後努力使自己與共產黨和社會黨對立起來，並妄圖担任勞動羣衆領導者的角色。到一九四七年，它最後瓦解了，其左派併入意大利社會黨，而右派反動分子則加入了巴恰爾迪的“共和黨”。——俄文版編者

實際上在整個意大利解放區實現了。

二 意大利總工会的初期活動。那不勒斯大會

意大利總工会的初期活動是很困難的。戰爭狀態，交通阻滯，各個省份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行政上的不同，英美軍事當局和意大利的民政當局的許多互相矛盾的指示和命令，在有些地方遺留下來舊的法西斯組織殘餘——所有這一切大大地加深了新工会組織活動的困難。可是使它的活動更加感到艱難的是：缺乏有鍛鍊的幹部，加入新組織的羣衆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二十年中對合法的政治和工会鬥爭形式已經生疏了。法西斯統治時期以前的老的工会活動分子在數量上是比較少的，而且並不是都能够在新的環境中迅速識別方向，這些新的環境是同法西斯執政以前的工会運動所處的環境顯著地不同。而年輕的工作人員却還沒有任何經驗。最後，意大利總工会產生時的一些情況對它的初期活動也頗為不利，不論是在中央或是地方，特別是在不是一下子解放的省份中都是那樣。五十年前的工会聯盟是在羣衆發起下逐漸形成的，而意大利總工会則大大不同：意大利總工会是在短期內由參加羅馬協約的派別（和其他一些較小的派別）發起下成立的；它的領袖們迎合勞動人民自發的爭取團結的渴望，因之，在尚未解放的地區在奠定工会組織的基礎時，往往走在事件的前面。在意大利中部如此，在北部尤其是如此，那些地方在德國佔領期間就會成立各個派別的代表所組成的臨時工会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有雙重的任務：一方面通過罷工和怠工組織反對德國佔領者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鬥爭；另一方面準備在本地區解放以後立即成立勞動介紹所和工会。這些委員會在開始時由於處在地下，實質上是自上而下地組成的。在把德寇逐出以後，這些委員會在當時繼續活動了一個時期，但往往妨礙了工会的真正民主化和耽誤了永久性領導機關的自由選舉。

意大利總工會書記處儘一切可能力圖消除這些缺點和加速工會民主化。一九四四年九月在英美工會代表團參加下的羅馬會議上，維多里奧在他的演說中揭露了年輕的工會組織中的缺點。他提到在一切省份中勞動介紹所的恢復沒有經歷重大的困難，但是關於各部門聯合會的恢復則不能這末說。雖說這種情況是與意大利工人運動的傳統有關，但它仍是開展正常的工會工作的一個嚴重的障礙。這次會議通過了與這有關的決議，決議中提出必須在三個月期限內進行一切工會領導機關的選舉和成立全國性部門聯合會，會議並批准工會脫離政黨而獨立的原則。這就顯著地加速了工會民主化的過程。但是，由於害怕引起那些在選舉中變成少數派的派別的不滿，當時對少數派作了一些不必要的鼓勵，有時甚至把它們放在特權的地位。在許多組織中過分長久地保持了領導的均等制度，並因此使得在領導職位上長時期有一些沒有任何羣衆支持的、不是保衛勞動人民利益而是保衛本黨的與勞動人民相違背的利益的人們。

在解決這些複雜的組織問題的同時，意大利總工會展開了目的在減輕勞動人民困苦狀況的工會鬥爭，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共同性質的迫切要求。一九四四年年底，曾獲得了一些勝利，例如：工資之外另加物價高漲補助金，提高那些已經取得聖誕節津貼的人的津貼，對那些過去沒有享受過這個權利的人則發給津貼。此外，意大利總工會在一切工業企業中取得了對工廠內部委員會的承認。在農業方面，關於分益佃農的處境問題被提到首要的地位。這方面最初的勝利是在契里諾拉簽訂的協議，其中規定給予分益佃農以權利：從他們耕作的地段上取得比以前更多的分益生產品。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樣，關於加拉勃利亞、拉齊奧和其他區域的許多地方的農民佔用荒地的問題也被提出來了。這個運動第一個勝利的標誌就是通過了把荒地和耕作不良土地交給合作社^①的古略^②法案和以後的辛尼^③法案。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一日在那不勒斯舉行了意大利解放地區的意大利總工會的第一次大會。大會的議程除了確定意大利總工會的章程外，還有關於當前的一切基本的經濟問題：從復興祖國和同失業鬥爭的問題一直到土地、社會立法、廢除法西斯集體合同和簽訂新合同以及社會保險制度等等問題。大會有當時包括在意大利總工會的一百三十萬人中的一、〇三五、三二六名工會會員的代表參加。大會工作在團結一致的氣氛中進行，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不同派別和職業的代表之間對個別問題沒有分歧的意見。可是重要的是他們在工會工作和經濟政策的一切基本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基督教民主黨人士，並不差於其他的人們，認為有必要在國內進行經濟改革。卡普吉、巴斯多列^④和其他基督教民主黨人所提出的議案中強調指出壟斷性大企業的特殊意義，並指出有必要“加強國家經濟生活民主化”和要求“勞動人民參加監督、管理企業的生產，和在最短時間內擬出這些企業逐步國有化的計劃，並同時考慮首先在電力工業方面實行這個計劃的適宜性”。後來這個提案被包括在一致通過的大會的總決議中。這個總決議中所含有的意圖直到現在還是意大利總工會的特點，即把關於工資的要求包括在一整套建議中。這些建議的目的是改變和民主地革新意大利的整個經濟制度。因此，在那不勒斯大會的決議中不僅提出要求實行有伸縮性的工資比率和經勞動者事先同意的新合同代替

-
- ① 詳情參閱卡洛曉羅：“意大利土地的佔有”，第四七——五七頁。
 - ② 福斯多·古略——共產黨人，在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擔任農業部長，關於轉讓一部分地主的荒地給無地農民合作社使用法案的起草人。
 - ③ 安東尼奧·辛尼——基督教民主黨人，曾擔任後來一個時期的農業部長，在一九四七年頒佈確認古略法案所規定的一部分措施的法案。——俄文版編者
 - ④ 列那多·卡普吉——工會方面天主教徒的領袖之一。——俄文版編者
朱里奧·巴斯多列——意大利總工會內天主教派領袖，後來是分裂派基督教民主黨工會聯盟書記。

法西斯的集体合同以及改善公務人員的經濟狀況，而且也有關於制定國家經濟復興計劃，消滅大地產制度和勞動人民參加企業管理等等的建議。

在那不勒斯大会上还通过了根據羅馬協約原則而制定的意大利總工会章程。這個章程在以後的幾次大会上曾作了一些修改，但直到現在仍舊有效。大会批准了維多里奧、葛蘭迪和利薩德里担任總書記，並指定了由二十五人組成的指導委員會，即由三個主要派別各派代表七人和少數派派代表四人組成，此外，這個委員會中還有婦女代表一人，工会青年代表一人和公務人員联合会的代表一人參加。

在大会的过程中，除了以前已存在的四個全國联合会——農民，鐵路工人，郵電工人和銀行職員——以外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全國联合会。重新成立的全國联合会有：意大利五金工人联合会，意大利紡織工業工人联合会，全國礦山和礦井工人联合会，電車工人，化学工業工人，教師，娛樂团体職工，汽車運輸工人，麵粉工業工人和印刷工人等联合会。開始時，領導一切新建联合会的是臨時委員會，以後則由這些組織的代表大会选出常務委員會。

三 从那不勒斯大会到佛羅倫薩大会

当意大利總工会改進了自身組織機構和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整頓了工作的時候，意大利北部的工会運動則在反納粹和反意大利法西斯的殘酷的游擊鬥爭的條件下展開。一九四五年三月，在米蘭、熱內亞和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中，同一九四四年春季一樣，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在統一原則的基礎上，幾乎在各地都成立了地下勞動介紹所。当民族解放委員會^①号召挽救工業企業時，這些地下勞動介紹所曾在解放戰爭的決定性時機中，

^① 民族解放委員會——意大利解放鬥爭時期和解放後初期（一九四三——一九四六年）的意大利反法西斯黨派的組織。——俄文版編者

起了特殊重大的作用。当意大利北部主要的勞動介紹所開始公開活動和宣佈併入意大利總工会時，解放鬥爭尙未完全結束。在地下鬥爭時期中一直和北部工会保持經常联系的意大利總工会書記处那時決定派遣它的代表團到北部去，以便熟悉勞動人民的狀況，佈置与地方工会的合作，以及準備召開會議來推選意大利北部勞動人民的代表參加意大利總工会的指導委員會。在意大利北部解放以後不久，這個會議就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在米蘭舉行，參加會議的有意大利總工会的書記和北部一切主要的勞動介紹所的書記。會議一致贊成作為羅馬協約的基礎的工会統一原則，確認那不勒斯大會關於組織問題的指示，而且对書記处的工作表示滿意並推派了代表二十一人參加那不勒斯大會所選出的意大利總工会指導委員會。从這個時候起，意大利總工会的活動已普及到整個意大利。在短時間中，加入工会的將近三百万勞動人民補充到總工会那時已有很大數目的隊伍中去了。

在意大利北部工会組織併入意大利總工会的時候，總工会已經在中部和南部進行了反对物價高漲的堅決鬥爭。總工会不止一次地向政府請求採取实施由人民直接管制物價的緊急措施，可是这些請求从來沒有被接受过。意大利總工会也爲爭取改善公務人員的狀況作鬥爭。一九四五年二月，意大利總工会和意大利產業家總會取得了簽訂關於当婦女是家長的情況下实行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協議。一九四五年七月，開始僅只在米蘭省实行的对基本工資的特別附加(以後成爲有伸縮性工資比率的基礎)已被普及到意大利北部一切工業的工人。在當時有必要立即解决下述問題：關於在艾米里亞、馬爾凱和杜斯坎尼地區爲更公正地分配生產產品而頑強地鬥爭着的分益佃農；關於称爲“解放獎金”的特別津貼尙未在所有省份实行；關於失業問題，爲了減輕失業現象，總工会向政府提出需要巨大勞動力的公共工程計劃以及要求增加失業補助金。

分益佃農的鬥爭延續了一年多。由於意大利大地主總會方面執拗地抵制，往往拒絕承認在地方上簽訂的協議，這個鬥爭有時具有極為尖銳的性質。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這個鬥爭在簽訂了所謂“加斯貝利仲裁”^①後才結束。意大利總工會承認了這個協議，但是要求雙方必須全部執行這個協議。“解放獎金”則在一九四五年夏季和秋季中陸續付給了所有省份的勞動人民。

意大利總工會對失業和物價高漲進行了頑強的和連續不斷的鬥爭，並要求政府實現它所建議的措施，即加強同投機行為作鬥爭和努力提高生產。可是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中不斷調換的政府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實現這些建議。在改善退役軍人狀況的工作中，意大利總工會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果。經過長期談判以後，意大利總工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成功地達成了關於聖誕節津貼的最後協議，協議中規定對工人這個津貼是根據二百個工作小時的工資標準付給，對職員則根據一個月的工資（即所謂“第十三次薪金”）標準付給。公務人員直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才爭取到一個月薪金標準的津貼，同時在總工會經常的支援和經過了長久鬥爭後，他們還成功地獲得了百分之七十的工資附加。在這以前不久，總工會曾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和意大利產業家總會達成在解僱工業企業工人上給予企業主一定程度自由的協議；協議中規定解僱某部分多餘人員時必須在工會機關監督下分三次進行。在簽訂這個協議時，意大利總工會預料在即將來臨的春季，國內經濟生活將會活躍起來。但這個推測沒有實現，總工會於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要意大利產業家總會推遲預定在這個月中要解僱的人員。隨着而來的是曠日持久的談判，可是總工會絕不放棄本身的要求。在一九四

① “加斯貝利仲裁”——這是天主教領袖加斯貝利在大地主和分益佃農間關於分配收成的糾紛中以仲裁人的資格所作出的決定。由於這個仲裁的結果規定了收成的百分之五十七應歸分益佃農所得。——俄文版編者

六年三月，總工會還曾獲得了另外二個重大的勝利：頒佈了同意全部保險費由企業主支付的法令，和同意大利產業家總會簽訂了關於改善工業企業中職員狀況的協議。

一九四六年四月，在羅馬舉行了農民聯合會第一次全國會議，會議確定要求土地改革，並討論了組織問題。同法西斯時期以前比較，這個方面經歷了顯著的變化。不同於舊的農民聯合會的新組織不僅團結了整個意大利南部的農業勞動人民，而且在這個聯合會中分益佃農起着更為顯著的作用。因此，它具有真正聯盟的性質，它不僅團結了農村中一切範疇的勞動人民，而且在同等程度上保衛了他們的利益。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目前的農民聯合總會，它的最重要的組成成員是僱農聯合會和分益佃農聯合會。如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大規模的僱農罷工所証明的，這樣的機構幫助避免了過去的重大錯誤。

在統一工會運動中，最薄弱的環節是私有農民中間的工作。如果將這個範疇的農民團結到附和總工會、但沒有參加總工會的組織中去，那這是最正確的。可是工會的領導者，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至少在初期都沒有對這項工作給予應有的注意。而基督教民主黨人對大部分分益佃農的擁護共產黨感到不安並畏懼在廣大農民階層中失去影響，於是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匆忙地成立了自耕農總會，這個總會沒有加入意大利總工會，並對它採取了敵對立場，由於沒有可能與這個組織達成協議，於是決定在農民聯合總會的體系內成立全國自耕農協會。

一九四六年五月和六月，總工會按照羅馬協約和總工會的章程對國家政權形式採取了堅決的立場，它號召勞動人民投票贊成共和國，後來當前國王拒絕承認全民投票的結果時，就進一步支持共和國政府。在全意大利召集許多保衛共和國的羣衆大會。應當指出，在這個時期的一些事件中，意大利總工會曾起了重大的作用；總工會內部的各個不同派別之間在這個問題上也並未有過任何分歧意見。

糧食的極端缺乏和生活費用的瘋狂上漲在一切職業的勞動人民中間引起了嚴重的不滿和騷動。七月十五日，意大利總工會指導委員會召開討論當前形勢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三個派別首次打破了意見的一致，因為基督教民主黨人堅持通過他們的與其他二個派別聯合議案對立的決議。意見的分歧是關於增加新的工資問題；基督教民主黨人反對這個要求，而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認為：對抑止物價上漲沒有任何保證時，就不能凍結工資。應當注意到的是：當時尚未實行有伸縮性的工資比率，於是任何工資附加都不能補償生活費用高漲給工人帶來的損失。這些分歧的意見可以看作只是策略上的，因為會議的參加者都會保證忠實於工會統一的原則。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具體問題上，基督教民主黨人卻採取了符合產業家利益的立場。

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最後幾天中，開始了意大利總工會和意大利產業家總會之間關於爭取增加工資鬥爭的“休戰”談判。這些曾中斷過的談判一直延續到十月三十日，雙方簽訂了規定“休戰”七個月的協議。同時，勞動人民得到增加工資頗多，主要是有賴於實行了有伸縮性的工資比率制度（它的基礎是作為工資伸縮因素的特別附加）。這個時期意大利工會運動的重要成就是實行了有伸縮性的工資比率。由於意大利勞動人民的工會統一，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意大利取得了這個勝利。但是，它未大大改進工人的狀況，因為，猶如那時總工會已經公開宣佈的，只有在有效地制止物價的情況下這種改進才有可能。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的冬季中，物價仍繼續不斷地上漲，這就在許多城市中，主要是在意大利南部，激起了不滿和抗議運動。同時，在意大利北部卻正遭受到由於電力缺乏所引起的尖銳危機。鑒於這些形勢，意大利總工會又一次力圖迫使政府採取根本措施來緩和勞動人民的困境，可是，它所提出的辦法在這一回仍沒一條付諸實施。

意大利總工會中的基督教民主黨一派在葛蘭迪亡故（一九

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後,起初由拉佩里^①,後來是朱里奧·巴斯多列領導。當時,這個派別開始公開實行目的在阻撓意大利總工會進行保衛自由和民主的鬥爭的政策。於是,當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在波吉拉·奇利·齊涅斯特勒(西西里島)發生槍殺示威的勞動者時,基督教民主黨人(指導委員會的成員)拒絕投票贊成舉行抗議總罷工的決議,然而這個罷工在五月三日仍然席捲了整個意大利。還有其他跡象顯示了服從上級命令的基督教民主黨人走上了分裂行爲的道路。這個問題必須在意大利總工會的全國大會上進行廣泛的討論,這個大會確定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召開。

四 佛羅倫薩大會

意大利總工會第一次全國大會(佛羅倫薩,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到七日)具有着巨大的意義,這不僅是由於這是在推翻法西斯主義以後全意大利勞動人民的力量首次檢閱,而且也由於它恰好和政府發生危機的時間巧合,危機的結果是從政府中排除了勞動人民的代表並組成了公開向意大利資產階級最反動的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服務的新政府。正當在解放鬥爭過程中形成的政治同盟解體的時候,意大利總工會全國大會竟能夠保持工會隊伍的統一這個事實,無疑的,必須認作是那些派別,首先是多年來爲統一而鬥爭的共產黨的一個勝利;同時也是工會統一思想深入羣衆意識的一個證明。基督教民主黨人的領袖感覺到它在總工會中沒有足夠的力量去製造分裂,因爲分裂是違背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包括基督教民主黨的廣大羣衆的統一意志的。因此,他們當時只採取了一般的嘗試來削弱意大利總工會,他們要求總工會局限於純粹工會的和經濟的鬥爭,甚至連爲保衛民主的政治鬥爭也不考慮。

^① 朱塞普·拉佩里——分裂派天主教工會聯合會的領袖之一。——俄文版編者

大會特別詳盡地討論兩個問題：關於所謂意大利勞動人民基督教協會的組織和總工會章程的第九條。在羅馬解放後不久，“天主教行動會”所建立的意大利勞動人民基督教協會本應是從事於宣傳的和慈善事業的活動。實際上，猶如大會的許多代表所証明的，這些天主教組織越來越干預到純粹是工會的事業。多數派（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對這個問題採取了不妥協的立場。迪·維多里奧聲明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即如果意大利勞動人民基督教協會限制其活動於救濟貧困者（因為在這方面一些組織能自由地活動），那末工會統一的原則才不被破壞。基督教民主黨人，例如巴斯多列和卡普吉，當時對大會保證：意大利勞動人民基督教協會並不企圖成為工會，而是追求宣傳和慈善事業目的的組織。這個聲明受到其他派別代表們的注意。

更嚴重的是關於那不勒斯大會所通過的總工會章程第九條的意見分歧。這個條文說：“工會離開政党和政府而獨立並不意味着工會對一切政治問題都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總工會將不是對任何一個政党，而是對大多數勞動人民有利害關係的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例如：爭取和擴大民主和民主自由，社会立法，復興和發展國家經濟等等，並將維護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決定。”基督教民主黨人要求取消第九條，理由是，認為總工會應該“局限自身的活動於純粹的工會鬥爭”，而不要侵入到政党活動的領域中去。這個認為工會鬥爭僅僅是經濟鬥爭的陳舊觀念的復活帶有一定的目的——即使意大利總工會沒有任何可能反抗加斯貝利政府所準備實行的反民主的政策。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維護勞動人民的權利，以其工會作為保障民主的工具。維多里奧宣稱：“放棄這個權利就意味着有意識地解除對反動派的束縛。”可是，為了力圖保全工會統一，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迎合了基督教民主黨人，宣佈同意更改第九條如下：

“工會離開政党和政府而獨立並不意味着工會對一切政治問題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意大利總工會將不是對任何一個政

党，而是对大多数劳动人民有利害关系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例如：保卫共和国，扩大民主和民主自由，社会立法，复兴和发展国家经济。工会组织对上述问题的行动将具有特殊的性质并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进行，即如果有资格的领导机关按照章程规定召集的会议，在参加会议人数的四分之三同意下作出相应的决定”。

可是，基督教民主党人连这样的措词也坚决拒绝接受，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多数代表所通过并包括在总工会的章程中。

中央机关的人员也曾变更：在指导委员会中现在有七十五个委员，执行委员会——二十一个委员，而秘书处则由四个总书记和六个副书记组成。这个决议投票的结果，共产党人获得二、六三一、一二九票（百分之五十七点八），社会党人——一、〇二九、八五二票（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基督教民主党人——六一〇、一〇四票（百分之十三点四）；其余票数是少数派的。与此相适应地在指导委员会中有三十八个共产党人，十九个社会党人，十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二个共和党人，二个右派社会党人，一个行动党党员，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一个无党无派的人。

佛罗伦萨大会结束时以显著的多数票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和工会斗争的决议，内中谈到：必须争取整顿国家经济和财政；实行反对物价高涨的有效措施；通过生产总高涨、工人转业和进行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各企业承认工厂管理委员会等等。在工会斗争的当前任务中，决议中提出：确定最低限度的工资和推行有伸缩性的工资比率，普及到全意大利一切职业的劳动人民中去，以及满足雇农、分益佃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系列的具体要求。这个决议，最后要求开始改组工业并逐步将公用事业国有化和“建立全国规模的对分配电力的监督，为的是逐步准备电力来源的国有化”。决议中还谈到实现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消灭大地产。其余的决议是关于特殊的组织问题、保险和社会安全问题等等。

總的說來，佛羅倫薩大會是戰後時期意大利工會運動向前發展的重要的一步，它的特點不僅解決了工人階級經濟鬥爭問題，而且提出了意大利一切社會和經濟基本問題。意大利總工會不僅保持了勞動人民的工會統一，而且还準備着在國內當時形成的新的、更為艱鉅的情況下，為工會統一而鬥爭。

第七章 爲勞動、自由与和平 而鬥爭的三年

一 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分裂工会運動的圖謀

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以後，当政府開始实施越來越反動的政策，而意大利对美國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从加强的時候，工会的地位也日益惡化。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七年中，当執政的是民族解放委員會政府以及三党政府，同時反法西斯力量中間籠罩着和睦氣氛的時候，工会運動是在其隊伍統一的條件下發展着，並在其鬥爭中藉助於同企業主和政府談判的基本方法獲得了不少的成就。由於總工会的靈活的政策，統治階級有時被迫在改善勞動人民生活條件的問題上作出讓步。这些政策更由於保衛人民羣衆利益的共產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部長參加政府而易於實現。總之，雖然有战争招來的破壞和國內經濟的混亂，雖然有經常的失業和物價的不斷上漲，可是勞動人民的利益被堅決地保衛着（只要記得伸縮性工資比率的实施即可），同時还取得了確定勞動關係法規的重大勝利。

在一九四七年，正如佛羅倫薩大会所已經提到的，意大利產業家總會和意大利大地主總會的抵制越來越頑固，在基督教民主党的“黑暗”政府組成以後，这种抵制更帶着殘忍的性質。从這時候起，勞動人民就不得不越來越經常地進入堅決的鬥爭和採用罷工，雖然他們从未輕視过談判的方法，無論是意大利總工会和部門联合会本身都从未拒絕談判。儘管鬥爭的困难在增大，一九四七年夏天，工会还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勝利。这只要提到同意大利產業家總會簽訂的關於工廠內部委員會的八月協

議和波河流域僱農九月罷工的勝利就夠了。九月罷工具有着特殊重要的意義，不僅是因為它是第一個越出一省範圍席卷了差不多整個波河流域的、擁有六十萬勞動人民參加的僱農罷工，而且是因為它是用新的方式進行鬥爭的。它反對地主，但是不反對自己下地耕作的農民私有者。這種不同於從前的罷工的情況形成了農村中不同範疇的勞動人民的廣泛團結，因而打垮了大地主採用法西斯方法來孤立罷工者和鎮壓罷工的陰謀。

在一九四八年，尤其是在四月十八日大選以後，情況更為複雜化。確信其能勝利的反動派加緊攻擊勞動人民。產業家和大地主指望利用新的政治形勢來瓦解工會，孤立勞動人民中戰鬥性最強的隊伍，並在政府協助下粉碎它們。展開了“三重集中攻擊”，分裂分子，產業家和政府來反對工會組織。分裂派的詭計、工業的縮減和警察的恐怖行為是意大利大資產階級鬥爭的基本方式，他們藉助這些方式，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鼓勵和支持下，企圖摧毀意大利勞動人民的反抗。基督教民主黨人的分裂行為，在一九四七年最後幾個月開始一直持續到一九四八年七月。分裂分子基本上以二種方式行動：藉助於經常使意大利勞動人民基督教協會進入到工會活動中去，因而破壞了基督教民主黨人在佛羅倫薩大會所給予的最莊嚴的諾言；藉助於在意大利總工會內部對一切關於遊行示威和同情罷工的決議實行怠工，而在新的情況下，這些示威和罷工都有必要比以前更經常的舉行。多數派（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的代表在這個時期中顯示了極大的忍耐和鎮靜，並盡一切可能不使關係尖銳化和不給分裂分子任何藉口。分裂分子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從勞動人民方面是不能指望得到一點點支持的，因此，他們長久決定不走向公開的決裂，而寧願在總工會內部實行怠工的政策。在四月十八日以後，天主教領袖們設想政治選舉的結果將影響到工會的內部局面和那時即將到來的工會組織的改選的結局。基督教民主黨的魁首之一泰維阿尼預言“工會的四月十八日”；主教和神甫動員了一

切力量爲了“開導”勞動人民；在基督教民主黨人、共和黨人和意大利勞動人民社會黨人之間進行了關於在總工會內部結成聯盟和提出共同的候選人名單的談判。只有意大利勞動人民社會黨人和共和黨人達成了協議，而基督教民主黨人不得不從意大利勞動人民基督教協會的積極分子中提出候選人名單。選舉標誌着共產黨派系的巨大勝利，它得到社會黨人的擁護，而基督教民主黨人和所謂“第三派勢力”的代表獲得了極少量的選票。

當國內展開了反對意大利產業家總會的鬥爭之際，這些鬥爭是爲了修正工資等級和工資定額、爲了增加對有家眷和子女衆多的工人的津貼、反對大批的解僱和政府侵犯憲法規定的勞動人民權利的行爲，教皇庇護十二世在六月二十九日對意大利勞動人民基督教協會代表發表的演說中，挑釁地宣稱，“反基督教的享受慾和粗暴慾望產生於工人中間”，並號召意大利勞動人民基督教協會的領導人在人民中喚醒“基督教的節儉精神”。

當時，在意大利爆發了巨大規模的自發性的抗議罷工反對發生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的謀刺陶里亞蒂事件。意大利總工會執行委員會贊成已經開始的總罷工，並決定從七月十五日午夜起將其普及到一切職業的勞動人民，同時不指出這次罷工延續的時間。關於進一步的行動問題則在次日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研究和作出決定。在這個第二次會議上，基督教民主黨人並不表示反對宣佈總罷工。次日，意大利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決定延長罷工到七月十六日十二時。基督教民主黨人未出席這個會議，他們通過無線電廣播向其擁護者號召在六月十六日早晨八時恢復工作。天主教首腦們好像突然發現這個罷工是“政治性的”！顯然，當最初的驚駭發生時，他們認爲這是適宜於實現分裂的時機，而這個分裂是加斯貝利、“天主教行動會”、梵蒂岡、意大利產業家總會和美國國務院所早已期望着的。七月十六日，十一個意大利總工會指導委員會委員——基督教民主黨人單獨地聚集在一起，表示要成立獨立於意大利總工會之外的工

会。總工会指導委員會全体一致譴責分裂分子並号召天主教勞動人民留在意大利總工会隊伍中。共和黨人巴里和意大利勞動人民社會黨人卡尼尼(那時曾是意大利總工会秘書處的成員)起初企圖說服巴斯多列不脫離總工会,可是遭到失敗;但是他們決定不與總工会破裂。在共和黨和意大利勞動人民社會黨的報刊上,公開地指責分裂分子。由此可見,天主教首腦們表現出孤立情況,跟隨他們的只有少數總工会的會員,而許多屬於基督教民主派的勞動人民仍留在意大利總工会的隊伍中。關於這個問題,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佛羅倫薩舉行的總工会指導委員會常會上曾予以正式宣佈。九月十八日,在羅馬拉吉倫宮開會的意大利勞動人民基督教協會第二屆全國大會宣佈成立獨立於總工会之外的工会,它是在一九四八年十月組成的,名稱爲:全意大利勞動人民自由工会。分裂分子實際上所取得的結果是很小的,如果考慮到加入新工会的人數曾顯著地少於分裂以前在意大利總工会內擁護基督教民主黨派系的人數,這些擁護者中有一些仍留在意大利總工会中,另一些則乾脆分頭散去,既離開總工会,也拋棄了自己的領袖。有一些工会,例如,學校工作人員工会(基督教民主黨擁有多數的唯一工会)退出了意大利總工会,可是宣佈它的獨立並拒絕加入基督教民主黨人的工会,爲的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失去一個以分裂相威脅的少數派團體。

實現分裂的方法,與分裂巧合的時機和它的悲慘的結果證明了這一行動是出於特殊的政治動機,是與基督教民主黨派系本身的工会利益不相符合的。不能用基督教民主黨人和統一工会運動在活動方法上的不同來解釋這一行動,因爲這些分歧在七月十四日以前早就存在,此外,而且它們並沒有如法西斯時期以前,當白色工会與站在階級鬥爭立場的工会對立的時候那樣的尖銳。那時,這二個工会互相獨立地興起和存在着,它們所團結的勞動人民的階層和團體,往往在思想方法上、發展水平上和所屬的職業都是各不相同的,他們的經濟利益也並不是一致的。

目前的形勢則已完全改觀：在羅馬協定基礎上自上而下所建立的工會統一在各地是能夠比較容易和比較迅速實現的，因它是符合在法西斯統治時期內受過鍛鍊和考驗的廣大勞動羣衆的願望的。分裂派的領袖清楚地懂得這一切，在工會的六月選舉以後，他們確信“工會的四月十八日”是一種妄想。問題在於，分裂是外來的、對基督教民主黨人最堅決施以壓力的直接結果，同時這個壓力不僅是來自梵蒂岡、政府和企業主方面，而主要是來自美國方面。

基督教民主黨人在意大利的分裂詭計，猶如法國右翼社會黨人所組織的分裂，以及後來共和黨人和右翼社會黨人在意大利又一次所製造的分裂一樣，都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國國務院所採取實行的遠大的、考慮週密的反對世界工會聯合會的分裂計劃的表現之一。這些詭計的目的是在一切西歐國家成立準備擁護馬歇爾計劃的工會聯盟，而馬歇爾計劃就是加強資本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不可調和的鬥爭的綱領。特別有意義的是：基督教民主黨人在意大利所完成的分裂是緊接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羅馬會議以後，在這個會議上，美國產聯的代表加萊和英國工聯的代表狄金破壞了工會統一，並建議通過擁護馬歇爾計劃的宣言。可是，分裂者的詭計在這個階段上遭受到完全的失敗，因為羅馬會議贊成這樣的觀點，即同意一切全國性的工會聯盟對馬歇爾計劃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以便他們能採取認為最符合本國勞動人民利益的立場。可是英國和美國的分離者不肯放棄其計劃，並執拗不悟地力圖在各國成立聽命於其指示的工會聯盟。意大利分離者辜負了他們主人的厚望：他們既沒有能在意大利總工會內部鞏固自己的地位，又未能妨礙它的活動。因此，要求他們立即實現分裂，於是他們十分匆匆忙忙地利用七月十四日事件作為藉口實現了分裂。順便提一下，在這些日子中，美國的工會問題“專家”安東尼尼和杜賓斯基正在羅馬。

一九四九年五月底，當共和黨人和意大利勞動人民社會黨人成立意大利勞動聯合會時，美國指使下所製造的分裂更為昭然若揭。這個分裂的效果比一九四八年的更為無足輕重。但是，幾個星期以後，羅米塔和卡爾孟奧拉小集團決定做效共和黨和意大利勞動人民社會黨的例子。在這方面應該提一提的是，美國產聯和英國工聯大會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退出了世界工會聯合會。與意大利總工會決裂的意大利右翼社會黨和共和黨的分裂者拙劣地和遲延地完成了直接從其大西洋彼岸主人處接受來的任務。但美國國務院仍然對他們的行動感到不滿，這可從美國工會活動家湯瑪斯寫給國務卿艾奇遜的著名的信件中得到證明，這封信的發表充分地揭露了意大利分裂者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的可恥的奴顏婢膝的行爲。在這封信中，對美國在意大利的代理人提出批評，正如湯瑪斯所確認的，他們力求迅速使意大利勞動同盟同全意大利勞動人民自由工會合併，結果會造成分裂者之間的分裂的危險。可是，一九五〇年二月在意大利勞動同盟大會上通過了和全意大利勞動人民自由工會合併的決議，結果是建立了意大利自由工會同盟^①。但有些共和黨的和右翼社會黨的工會沒有參加這個同盟，他們另外成立了意大利勞動同盟。顯然的，意大利勞動人民的利益是同這些職業叛徒的詭計毫無共同之處，這些叛徒恬不知恥地在解決他們的傾軋事件中公開請求其外國主子的幫助^②。當分裂者着手進行其徒勞無功的詭計時，意大利總工會繼續領導着為保護勞動人民、反對企業主的進攻而鬥爭。從一九四八年年底起，企業主所採取的進攻具有特殊猛烈的性質。

① 這個組織的正式名稱是意大利勞動人民工會同盟，可是它的縮寫（CISL）也能譯解成爲意大利自由工會同盟。這個組織參加親美的分裂派的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俄文版編者

② 關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期間美帝國主義在分裂工會運動方面的作用，參閱梅里：“工會的分裂是美國專家的勾當”，載“復興”雜誌，一九四九年六月號。

馬歇爾計劃和基督教民主黨政府的政策帶來了國內經濟的總蕭條，一方面它們使意大利資產階級壟斷集團有可能獲取巨額利潤，另一方面引起極廣大的勞動羣衆的破產和使得資產階級內部越來越廣泛的階層遭受到打擊。同時，產業家竭盡一切力量爲了摧毀勞動人民的反抗和奪去勞動人民在解放後最初幾年中所取得的成果。維多里奧在意大利總工會熱內亞大會上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有人曾經企圖廢除伸縮性工資比率，惡化勞動人民爭取到的勞動合同的條件，取消勞動婦女在經濟地位方面的一切成果，完全取消工廠內部委員會或是閹割它的內容和剝奪一切權利，解散管理企業的代表會議，禁止工會領導人和勞動者在工廠交往，和禁止收費人在工廠向工會會員收集會費。產業家和大地主力圖使勞動人民按照他們所授意的鬥爭方法，來保護自身利益、維持生計和改善生活水平。記住產業家爲反對‘不合作’、反對罷工、反對一切其他鬥爭形式和勞動人民採用的新的自衛方法而提出的抗議和進行的鬥爭，因爲這些手段是較爲有效，較爲有把握地走向勝利並且證明自己是壓迫僱主的手段。

企業主向勞動者進攻的現象之一是收縮工業和圖謀實行大批的解僱。這首先是針對着國家管理的那部分工業，例如：工業復興局^①所屬的企業，因爲意大利工業壟斷集團的計劃是瓦解一切即使在極小的程度上依屬於國家的企業。這個計劃的實施將使資本家掌握一種特殊保險證書來反對機構改組的威脅，這就是說反對一系列工業部門和康采恩爲國有化所威脅，而這些工業部門和康采恩目前都是私人資本家工業集團壟斷地統治着。”

政府公開地和以更大的嚴厲的行動支持着企業主的進攻：對罷工工人、羣衆大會和遊行示威採取警察鎮壓的次數增加

^① 工業復興局——國家機關，名義上佔有了國內一切生產部門中大工業企業的控制性的股權，可是事實上在其中支配一切的是大私人資本的壟斷組織的代表。——俄文版編者

了。僅在一九四九年，勞動人民有十七人被槍殺和成百個被打傷，此外，有一四、五七三人被逮捕（其中有七十七個勞動介紹所的書記和三百七十五個其他工會的領導人），有一三、七九三人被警察提起刑事案件的訴訟。這就激起了勞動人民的頑強反抗，他們表現了高度的戰鬥精神和團結性，而這是他們的敵人所未預料到的。勞動人民的鬥爭越來越大規模地具有為得到工作、為提高生產和反對國內經濟蕭條而鬥爭的性質。這個時期中勞動人民的大多數行動都超越為工資而鬥爭的範圍。

陶里亞蒂談到這個方面時說：“當勞動者拒絕承認解僱和迫使僱主放棄解僱或是減少解僱人數時，勞動者削減了資本家的利潤，因為他們的積極的行動強迫資本家進行新的投資和改進生產組織以便保持以前規模的工資基金或者甚至增加它。當工人階級一切鬥爭採取了這種性質，正如日前在意大利所發生的，顯而易見，涉及一切生產組織、國家整個經濟生活的一系列新問題都被提到首要地位來了。”^①

大家都記得意大利工人階級反對緊縮工業的持續的和艱苦的鬥爭時期。這個鬥爭不僅表現了那些直接受到解僱威脅的勞動人民隊伍的團結和英勇，而且也顯示了其他職業勞動人民的團結精神，他們給予了同志般的各方面的幫助和支持。勞動者的鬥爭制止了企業主的進攻和阻住了緊縮生產政策的實施。整個說來，工會組織領導的這個鬥爭是正確的；可是仍有缺點，這是由於基本上在參加鬥爭的各個不同組織之間缺乏明確的配合（這些不同組織有：工會、管理企業的代表會議、工廠內部委員會、行動委員會等等），和缺乏總的行動綱領。

然而，不應該認為意大利總工會在這個時期中的一切活動都祇帶有防禦的性質，認為勞動人民的狀況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實際上，意大利總工會不僅保持了伸縮性工資定率，而且还達成

^① 陶里亞蒂：“勞動的鬥爭”，載“復興”雜誌，一九四九年二月號。

修改這個制度使其有利於勞動人民。在其他方面也獲得了顯著的成就。例如：五金工人持續了一年的鬥爭，結果簽訂了新的勞動合同；瓦斯工業工人在艱苦的鬥爭中也取得了勝利；一九四九年七月，商船海員工人不管分裂者的詭計，經過頑強鬥爭以後也獲得不少的成功。海員工人的勝利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它加強了同意大利總工會的聯繫，而在過去，他們差不多常常處於孤立的地位，很少同其他範疇的勞動人民聯繫。農村的勞動人民取得了最重大的勝利。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開始的僱農和農業工人的羣衆性罷工一直延續到六月二十三日。這個罷工爆發於鬥爭的主要策源地——波河流域，它的確不是在同時，而是在不同時間內席捲了許多省份的地區，如拉齊奧、阿布里、西西里、羅卡尼、卡姆本尼、杜斯坎尼和薩爾迪尼。參加這次罷工的有一百萬以上的僱農和固定的農業工人；支持這些罷工者的至少有三百萬城鄉勞動人民，他們宣佈了同情罷工和舉行了抗議的示威遊行。同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樣，這次罷工不使分益佃農、小所有者和佃農遭受損失。因此，它是在建立農村勞動人民一切階層統一的事業方面向前跨了新的一步。這次罷工是意大利勞動人民爭取憲法自由鬥爭的重要階段。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一方面堅決鬥爭反對大地主藉助從其他地區募得勞動力來組織破壞罷工者，另一方面，反對警察的挑撥離間。鬥爭是殘酷的：參加罷工工人中，六人被打死，許多人受傷，成百的人遭到用木棍和槍柄的毆打，成千的被投入監獄。警察大量地毀壞自行車——波河流域農業工人唯一的財產和基本的交通工具。可是，不顧這一切，工人沒有讓步。六月二十三日，大地主被迫達成協議，按照這個協議大地主答應：增加殘廢津貼；實行根據物價上漲而定的工資附加；對一切僱農和固定農業工人給予失業津貼；在一切省份簽訂工資協議；並至遲不過十二月一日簽訂全國勞動合同和停止季節性的解僱固定農業工人。這個罷工不僅從工會觀點來看是一個巨大的勝利，而且從政治意義上看來尤

其如此。它表明了勞動人民組織起來以後的偉大的力量和大大地提高了僱農联合会、土地勞作者協會和意大利總工会的威信^①。

二 熱內亞大會

在這個緊張鬥爭的局勢下，在熱內亞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四日到九日舉行了意大利總工会第二次全國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代表一、二九五，代表了五、一一七、三〇〇勞動人民——截至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的總工会會員。

在大會進程中，獲悉了截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為止總工会的會員人數的資料，這時在它的隊伍中共有五、二一一、四二一人。如果考慮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在總工会中包括勞動人民五、二〇六、六三七人，而一九四七年六月（在佛羅倫薩大會時）是五、七三五、〇〇〇人，那末顯而易見，基督教民主黨人所組織的分裂對意大利總工会會員人數的影響是如何的微不足道，而意大利勞動人民社會黨人和共和黨人所製造的分裂的結果在實際上更是無足輕重。

根據這些資料和考慮到鬥爭的經驗（在鬥爭的過程中已經十分明顯地暴露了分裂者的工会的無能，維多里奧在其報告中聲稱：分裂者遭到了失敗，而意大利總工会代表着意大利唯一的真正統一的工会組織，因為參加它的有一切傾向的勞動人民：共和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天主教徒、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而擁有少數會員的分裂者的組織則具有狹隘的黨派性質和十足地依賴於意大利的政府，或者更正確地說，依賴於美國政府。從上述的資料可以看出：意大利總工会在其隊伍中團結了絕對大多數的參加生產的和組織在工会中的勞動人民。

意大利總工会秘書處向大會提出了五個總結報告：維多里

^① 關於這個規模宏大的罷工的詳情，參看羅馬烏里：“貧農和農業工人怎樣取得一個艱難的勝利”，載“復興”雜誌，一九四九年，七月號。

奧的關於意大利總工會為勞動人民的統一和為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而鬥爭的報告；薩吉^①的關於最必要的機構改組的報告；皮托西的關於為保衛工會自由和勞動人民宣佈罷工权利的報告；拉瑪和巴洛迪的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維多里奧在其報告中不僅對工會鬥爭而且對全國總的經濟狀況給予了全面的和深刻的分析，並指出能將意大利經濟從蕭條狀態中拉出來的所應遵循的道路。從報告中和以後隨着而來的它的廣泛的討論中十分明顯的可以看出：為了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首先是成功地和失業作鬥爭，僅只為工會的和經濟的要求而鬥爭已經是不夠了。意大利總工會活動中最薄弱的一環曾經被指出是向失業進行的鬥爭。另一方面，代表大會斷定，最近的二年來（主要是在工業中）基本的鬥爭與其說是為提高工資，不如說是保衛工業避免緊縮生產。為此，曾提出要求在全國範圍內配合這個鬥爭，並為這擬定復興國家經濟的計劃。由此可見，工會鬥爭最好是和更廣泛的經濟的以及政治的鬥爭聯繫在一起，工人階級最好是在同企業主和政府鬥爭中更緊密地團結其隊伍，並應更少地分散自己的力量在防禦性的零星行動上。實現機構改組的辦法也如此擬定，而改組的必要性由大會堅決地加以重申。

在維多里奧建議的基礎上和隨後的討論中，大會在最後的決議中擬定出一系列的迫切的要求，號召一切加入意大利總工會的工會為實現這些要求作鬥爭，並作出了建設性的經濟計劃，即一整套的措施使國家從目前的窘境中跳出來和走上改革國家經濟的第一步。大會提出刻不容緩的要求如下：

- “（一）按照每個生產部門的最大可能性提高工資，建立一切職業勞動人民的全國最低限度的工資，其中包括農業；
- （二）保持和改進伸縮性工資比率制度；
- （三）完全停止解僱；

^① 弗爾那道·薩吉（社會黨人）和列那多·皮托西（共產黨人）——意大利總工會的書記；拉瑪和巴洛迪——共產黨人，意大利總工會秘書處書記。

(四)爲了僱用一定數目的失業者,實行四十小時工作週,保持工資符合於四十八小時工作週的水平;

(五)增加失業補助金和津貼,並將伸縮性比率制度推廣到这方面來;

(六)提高國家的、半國家的和地方機關的僱員的薪金到私人機關相應等級的職員的薪金;

(七)完全承認工廠內部委員會的職權;

(八)實行憲法規定的關於勞動人民參加管理大企業,採取承認代表管理會議的方法,這個會議必須保證勞動人民方面對企業主的監督;

(九)授權工會有絕對的自由,不允許政府對其活動範圍進行任何干涉,一切職業的勞動人民也有絕對的自由,宣佈罷工,沒有任何限制;

(十)滿足農村中一切範疇勞動人民(僱農、固定的農業工人、分益佃農、小土地所有者、佃農等等)所提出的、統一的土地耕作者協會大會所擬定的要求;

(十一)對一切爲參加工會的和全民的鬥爭而遭受迫害的勞動人民實行大赦。”

這些要求反映了从那不勒斯大會以來意大利總工會不屈不撓地所實行的政策。此外,這些要求的提出還因爲必須在最重要的方面擊退企業主和政府進攻。最後,提出這些要求,意大利總工會是爲了要使那些至今爲止工會活動帶來最小成果的方面活躍起來,例如,在爲改善國家職員和領撫卹金者的狀況的鬥爭方面。可是,大會最後的決議明確指出:只是滿足這些首要的要求是不足以提高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因此,除了爲上述要求而鬥爭外,還要爲實現建設性的經濟計劃而鬥爭,這個由大會所擬定的計劃的總的要點如下:

“(一)國有化電力工業的壟斷企業和成立國家的電力機關,它的任務應該是進行管理國有化的企業和保證在短期內建設新

的電力站，這些電力站的規模必須滿足生產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

(二) 與開始實行土地改革的同時設立土壤改良、灌溉和開拓土地的國家機關，它的任務應是保證加緊發展農業，首先是在國家的南部；

(三) 成立人民住宅建築的國家機關，它的任務應是保證在意大利一切省份中建築住宅、學校、醫院等等，首先是在遭受戰爭最大的地區；

(四) 實現廣大公共工程計劃，必須滿足居民的基本需要(道路、自來水、排水設備、照明裝置、電話網、診療所)；

這個計劃的資金，按三年時期計算，應取自：

(甲) 依靠有產階級，首先是大壟斷集團和大股份有限公司的累進稅；

(乙) 有組織地利用國家儲金對本計劃規定的事業作生產性的投資；

(丙) 依靠外國的借款，但須不侵害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獨立。”

這個計劃的基本目的是使工人完全就業，其辦法是：擴大國內市場和實施艱鉅的公共工程計劃。可是，正如維多里奧所提到的和大會參加者所完全意識到的，這個計劃的實現首先須以國內統治集團的改變政策為前提。因此，大會的最後決議中強調指出：勞動人民準備為實現這個計劃作出貢獻和意大利總工會準備支持保證實行這個計劃的政府。決議同時指出：實行計劃的基本條件是保衛和平，並提出要求意大利退出大西洋集團。由此可見，熱內亞大會的決議證明了勞動人民的工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相互之間的密切聯繫。了解這種相互聯繫和向勞動人民闡明它，是意大利現代的統一工會運動的偉大功勳之一。大會還通過決議在最近期內召開全國經濟會議來討論和最後擬定所提出的計劃，這個決議的通過是更深刻地了解勞動問題及

它与總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間不可分割的聯繫的一個證明，在意大利对這個問題的了解还从未表示如此堅決和肯定。

如果不提一提根據皮托西報告而通过的關於工会自由和宣佈罷工权利的問題的決議，那末熱內亞大會的結果情形是不完滿的。熱內亞大會反对政府的工会立法的实施，這個立法顯著地限制了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九條和第四十條所規定的权利，大會堅決地確認勞動人民有权保衛工会絕對自由的原則（第三十九條）和有权不受任何歧視和限制的宣佈罷工（第四十條）。大會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反映勞動人民利益的工会立法應該依據的原則。

在拉瑪和巴洛迪報告的基礎上，大會批准了一些重要的組織性的原則，它們的目的是：第一，克服一系列的主要是下層組織所特有的缺點，而這些下層組織的工作更需要特別注意；第二，根除在工会組織中的官僚主義和改進幹部的狀況；第三，精確地規定各個不同類型組織間的相互關係。為此曾決定全國性联合会應該处理有關相應職業的勞動人民的一切問題，在取得意大利總工会的同意下，可以領導他們進行全國規模的鬥爭；而勞動介紹所應該“在政治上領導當地的一切勞動人民”和實現“不同職業勞動人民的真正團結”。大會还認為，如一九四九年九月勒佐—艾米利亞大會所決定的，土地耕作者聯盟的組織機構具有聯盟性質，因此認為它應該成為全國規模的固定組織，並在每個省份設立自己的支部。關於勞動介紹所領導機關的人員方面，承認有必要在每一個領導機關中应有相應數目的地方農民組織的代表，其目的在鞏固城鄉勞動人民的聯繫。

最後，大會通过了關於社會安全和保險的決議，批准了佛羅倫薩大會已經提出的对这方面的改革要求；通过了關於加強全國總工会勞動人民服務所^①和藉助於与工会會員建立更緊密的

^① 全國總工会勞動人民服務所——勞動人民社會保障的組織，屬於意大利總工会管轄。——俄文版編者

聯繫而擴大其活動的決議。大會還通過了另一個決議，這是關於勞動人民的文化設施，和組織休養、娛樂、體育和旅行。決議要求全國勞動人民服務局^①實行民主並讓勞動人民參加管理。

三 羅馬的全國經濟會議和米蘭的工會大會

一九四九年最後幾個月中，工會鬥爭越來越具有為勞動和自由的真正偉大的戰鬥的性質。一九四九年中從十月底到十二月中旬，意大利南部發生了強大的農民佔領地主的荒地運動。這是開始於一九四四年的和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獲得大規模的運動的新高漲，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政府起先頒佈關於轉讓給農民使用部分荒地的古略法案和以後頒佈的辛尼法案。在這一次（一九四九年），農民運動也帶有自發性；這個運動發生於卡拉勃里亞，首先是在克洛東地區，以後迅速蔓延到羅卡尼、西西里、阿布里、卡姆本尼和拉齊奧地區。這個廣大運動的參加者遭到警察的殘酷的迫害。而在米里薩、托萊瑪齊奧和蒙吉斯卡爾奧索，竟發生流血鎮壓。謝爾巴的警察組織了法西斯式的真正討伐隊反對手無寸鐵的勞動人民。可是，不論那種警察恐怖行為都不能壓制越來越擴大的運動，而工會組織的羣衆性的反對這些暴行的抗議罷工、民主黨派的行動以及民主報刊的聲明激動了國內的輿論。

與意大利南部農民同時進入運動的還有其他範疇的勞動人民，尤其是堅決地保衛自身利益的國家職員。工人反對緊縮工業的鬥爭在全意大利繼續着，教會的政府在這個鬥爭中對要求工作和麵包的勞動人民報以最野蠻和血腥的鎮壓——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在摩登納槍擊工人，在那一天，六個工人在警察的子彈下喪命。這個流血大激戰的一切細節及由此而激起的強大的抗議示威遊行記憶猶新^②。它不是普通的抗議示威遊行，而是

^① 全國勞動人民服務局——從事組織勞動人民休養和娛樂的政府機關。
俄文版編者

空前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它們是全國性的爲保衛憲法規定的
工会權利和反對警察干涉勞動糾紛的鬥爭的起端。過去的這個
鬥爭在意大利工会運動史上有着不少先例，而今天國內一切民
主力量正以最大精力進行着，而工会在這個鬥爭中起着主要的
作用。

當這個爲自由的偉大鬥爭擴展起來，一批一批各種職業的
勞動人民被吸引到鬥爭中來時，意大利總工会繼續進行擬定其
經濟計劃。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在羅馬，根據熱內
亞大會的決議，意大利總工会召開了全國經濟會議。參加會議
的有著名的專家、經濟學者和政治活動家，其中有一些政府的人
員，這些政府人員由此間接地承認了會議的重大意義。

會議基本上確認了熱內亞大會對國內經濟形勢的估價，並
指出，意大利的經濟要擺脫目前所處的蕭條狀態，只有改變經濟
政策路線才有可能。在審查對計劃撥款的可能性時，會議指出，
既然這裏指的是生產投資，那末只要有最初的推動就足以達到
使計劃“自給自養”。政府用以穩定意大利貨幣的成千億的里拉
和那些由於實施新的稅收和信用政策而得到的收入就足夠作爲
最初的推動。

全國經濟會議後立即召開的意大利總工会指導委員會會議
在二月二十二日公佈了一次決議，內中說：

“意大利總工会的計劃經過全國經濟會議更充分和更詳盡
研究和確定後，已爲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勞動者所同意，並成爲了
意大利人民的‘勞動計劃’。

全國經濟會議指出：考慮到技術上和經費上的可能性，在最
近期內可能給予七十萬屬於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失業工人以
工作，應補充一下的是，其中不包括許多可能參加輔助工作的其
他失業工人。由此可見，這就爲解決國內最尖銳的經濟和社會

② 關於警察迫害詳情，參看總工会所出版的文集“從梅黎沙到摩登納”，“勞
動”雜誌第三期附刊，一九五〇年，羅馬。

問題打下了基礎。在這些刻不容緩的問題中還包括：提高電力生產，迫切的住宅建築以及學校、醫院等建築，在農村中最大限度地進行改良土壤，灌溉和開墾新地。

會議又指出：在上述部門中，首先是在意大利的南部和島嶼上，全國規模地利用這些大批失業工人終將可以着手解決急待處理的‘南部問題’，還將促進全國的生產發展以及使比其他部門遭到更嚴重蕭條的許多工業部門獲得決定性高漲（這些部門是機器製造、紡織、玻璃、傢具和其他等）。

爲了克服阻撓計劃實現的經濟性的障礙（這些障礙是由於一些生產部門爲壟斷所控制），就要求將電力工業壟斷公司國有化，如果可能的話，採取措施建立對壟斷集團的監督和限制它們的權力。

這個國家投資的計劃刺激了總的經濟高漲後，也將吸引私人資本流入生產。同時，對於私人資本，必須實行有效的監督，使之能用於有利於社會的方面而避免浪費資金，避免它們被用於投機目的。

要求獲得經濟的高漲和穩定並使計劃獲得成功，其先決的和主要的條件是實行相應的經濟政策，提高國內市場的容量，這種經濟政策應該以下列原則爲基礎：勞動力全部就業，對一切勞動人民實行最低限度工資，以及改進領养老金者、失業工人和喪失勞動能力者的社會保險制度。

會議又指出動員現有的全部資源（資本市場，信貸和稅收制度）所必須的資金，應該按照新的方式來利用它們，爲的是提高它們的效能，藉以在尋求撥款資金中得到最大效果。

必須建立一個毫無官僚主義性質的專門機關，使其能成爲實現計劃的一切工作中的推動和協調的中心。

指導委員會完全贊同會議的結論和建議，並授權意大利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採取實行計劃的相應措施。

勞動計劃保證意大利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造成了改善勞

動人民生活的新的可能性，限制了壟斷組織的權力和鼓勵了中等企業主的個人主動性。它的實現不能藉助於分散的措施，而要求實施一套可以使國民經濟一切主要槓桿動作起來的措施。計劃的實現要求實行新的經濟政策和建立不受工業壟斷組織與大地主操縱的政府，這個政府要得到人民羣衆的信任，只有依賴它才有可能發揮集體力量，才能完成復興國家和保證意大利人民以勞動、幸福、和平和自由的偉大事業。”

羅馬的全國經濟會議在擬定和宣傳“勞動計劃”方面是一個決定性的步驟。從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四日在米蘭舉行的全國工會大會開始工作後才展開了為實現“勞動計劃”的直接鬥爭。由於廣泛討論主要工會領導人的報告的結果，大會擬定了為國民經濟高漲而鬥爭的一些首要任務。這些任務明確地表述在維多里奧的閉幕詞中，後來為六月五日在米蘭召開的意大利總工會指導委員會常會所確認，它的告意大利勞動人民書中說：

“意大利人！

我們國家有二百萬公民已完全失業，三百万——半失業。

黯淡的將來在等待着成千上萬的每年走上勞動生活道路的青年。

這一切將難以忍受的重担放在我們人民（有工作的工人，中等階層——商人、手工業者、小企業主和中等企業主、自由職業者，農民、小土地私有者和中等土地佔有者）的身上。

政府宣佈關閉新的工業企業、宣佈新的解僱，這就意味着進一步增加羣衆的貧困。可是勞動人民拒絕把這一切作為不可避免的命運加以接受。

剛才閉幕的米蘭工會大會根據精確的資料和事實指出有可能立即向前推進國家的工業和農業，減少生產成本，提高人民需求，擴大國內和對外貿易，保證更多地給予目前沒有工作的勞動力以工作。只有為政府所支持的許多壟斷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利己主義阻礙了國家的經濟發展。

米蘭的大會提出下列十點作為爭取國家經濟高漲的最迫切的任務：

(一)使我國冶金工業擺脫舒曼計劃所造成的險境，並使鋼的年產量達到四百万噸；

(二)使農業機械化，把拖拉機的生產量增為四倍並組織拖拉機的推銷使得耕作者容易得到它們；

(三)與英國和美國機床製造工業部門相比較，我們的機床製造業處在不利條件下。必須消滅這種不利的條件；

(四)開始建造總噸數達一百万噸的商船，立即開始在造船廠中製造總排水量三十七万噸的船隻；

(五)擴大現有的住宅建築計劃，加速完成范范尼計劃和把杜畢尼計劃擴大為兩倍，採取措施來收買土地以利住宅的建築，並對建築用材料的壟斷價格建立監督；

(六)增加國家的動力來源；生產電力，開採石油、甲烷、煤和褐煤；

(七)供應農業大量的化學肥料，降低這些歐洲價錢最高的產品的價格百分之三十，並取消“蒙吉卡奇尼”托辣斯所要求實施的一切關於生產肥料的限制；

(八)完成重建和擴大國家的和康采恩的鐵路網，整理和擴大電話網與電報網；

(九)以低價出售給最貧困階層的居民日用必需物品：布疋、皮鞋、衣服、自行車等等；

(十)放棄對外貿易領域中的歧視政策和實行與一切國家經濟合作和友好的政策。

意大利人！

只有一小撮有特權的人才會反對這個計劃。

絕大多數的意大利人在這個計劃中看到了生路。

意大利總工會號召一切有工作的和失業的勞動人民——工人、職員、專家、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中小工商業家、中小土地

私有者——因結起來爲實現這個偉大的有益勞動和經濟高漲的國家計劃而共同鬥爭，爲了明天和爲了一切人們的更合乎人類的生活水平而鬥爭。

爲反對解僱和反對緊縮工業而鬥爭，爲充分利用意大利一切潛力和資源而鬥爭，爲提供工作給失業者而鬥爭，也就是說，爲實行‘勞動計劃’而鬥爭。

前進，因結自己的隊伍爲拯救我們國家這一偉大的和合乎人道的事業的勝利而鬥爭。”

意大利總工會在全國展開的爲實現這些任務的堅決鬥爭得到了工人階級的政党和一切民主力量方面的真正的支持。在現代的意大利有着建立廣大的民主力量陣綫的巨大可能性；無產階級已經能確實領導過去敵視和不信任這個鬥爭的廣大階層的居民爲勞動、自由與和平而鬥爭。工會組織今天不僅成爲了勞動人民爲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而反抗企業主的鬥爭的工具，而且同時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它領導規模巨大的爲復興和加強國民經濟、爲保衛自由和民主的鬥爭。

關於党和工會的相互關係、關於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之間的聯繫的老爭論，它們之間的分歧意見曾是：有人將罷工僅只看作是經濟鬥爭的工具，而有人要將它變成爲政治鬥爭的工具。這個老爭論已經一去不復返和最後被克服了。認爲工會活動純粹是經濟鬥爭和爲工資及勞動條件方面的某種要求而進行鬥爭這些觀點克服了。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認爲工會是革命改造社會的工具的觀點也克服了。自組織第一批抵抗協會一百多年以來和建立第一批勞動介紹所差不多六十年以來，現在意大利工會運動也許有資格說真正成熟了和因結一致了。它經歷了長期的和極有教育意義的道路，經受了改良主義者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之間與天主教工會和站在階級鬥爭立場的工會之間的紛爭，經受了公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和民族主義傾向的影響，也經受了多年的法西斯主義墮落的和腐敗的影響，渡過了地下

鬥爭的時期。在這些嚴重的考驗中成長了和鍛鍊了現代的工會運動，它也許有資格稱為統一的工會運動，因為它的隊伍團結了意大利一切職業和一切地區的勞動人民，不問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政見，也因為在它的內部取得了一致的意見，認為工會鬥爭是為復興國家經濟和為民主的全民鬥爭的一部分。在這個意大利總工會領導的偉大的勞動人民運動之前，外國帝國主義所策動的分裂詭計顯得多末的可憐。分裂者的工會面臨着抉擇：或者是和意大利總工會締結聯盟，並改變其分裂派的本性；或者是繼續以工賊的角色出現，因而在勞動人民的眼前自取羞辱。

意大利工會運動史有着丰富的和有教育意義的範例，同時也是一部英勇奮鬥的歷史。意大利工人和農民的道路曾是，今天仍然是困難的和嚴酷的：一開始，它就被勞動人民的鮮血染紅了。不久以前的槍擊只是殘酷的迫害勞動人民的長鏈條上新的一環。他們不應得出如加斯貝利所作的結論，加斯貝利在一次演說中作出結論說，好像槍擊是不可避免的，是沒有辦法的。相反的，他們應該在其中看到意大利社會制度的腐朽和不適宜，以及有必要在根本上改革它。同時，共和國的憲法規定有可能按民主和進步的道路和平地發展意大利。為勞動、自由與和平，為實現憲法所載明的任務的鬥爭能否成功和勝利，決定於勞動人民本身，正如過去意大利勞動人民不止一次地在艱難和流血鬥爭中獲得勝利一樣。只有當意大利人民在這個工會起着巨大作用的偉大鬥爭中取得勝利時，才能在將來說：在過去和今天的階級鬥爭中為人民的事業而犧牲的人們，他們的犧牲不是徒勞無功的。